

炎黄春秋



柯华：我有幸目睹了
香港回归谈判全过程

在朱老总面前我们是一群孩子
伯父彭德怀的八万言书
是怎样写出并保存下来的

一代遗传学宗师
李景均何故去国

“四人帮”被审期间丑态图
驻华使馆的中国卫士
我香港驻军诞生记

1997 7
总第64期

纪念“七·七”事变暨全民抗战60周年座谈会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黄埔军校同学会、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革命老区专著编委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七·七”事变暨全民抗战60周年座谈会和侵华日军暴行图片展览，6月18日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出席座谈会的有老将军、老战士及各界人士一百余人。



题图：座谈会主席台

1.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萧克出席
2.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会长李德生出席
3. 黄埔同学会会长李默庵出席
4. 会场一角

李思侠 殷家怡 摄影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镗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 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编: 100802

电话: 66170955

印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8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00 元 零售价: 5.00 元

专 稿

②我有幸目睹香港回归谈判全过程 柯 华

⑤香港驻军诞生记 张 波

春秋笔

⑪罗瑞卿与大比武 舒 云

⑬伯父彭德怀的八万言书

是怎么写出并保存下来的 彭梅魁

②②当年《真理报》记录的八一枪声 阿 寿

②④张国焘奉命阻止南昌起义 阿 寿

②⑦回忆南昌起义后受挫经过 黄 霖

殒星篇

③⑩在朱老总面前我们是一群孩子 喻权域

③③李立三、陈毅 40 年围棋情 李思慎

赤子心

③⑤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 叶笃庄

遗闻录

④②“四人帮”被审期间丑态图 李耐因

④⑦“九·一三”前林彪和江青 470 次通话 李耐因

时代风

⑤⑩献青春舍爱子绿了山岭的孙俊福 宝 鑫

⑤②为老人营造“金色乐园”

——上海敬老院纪实 世 耕

⑤⑥驻华使馆的中国卫士 陈淀国

人海浪

⑥⑩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 满素洁

⑥⑥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任 曹玉玲

⑥⑧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顾维钧 劳允兴

同心结

⑦②海伦·斯诺的中国情结 武际良

⑦⑤陈依范一生在宣传中国 张 彦

古今谈

⑦⑥郑和十九世孙说郑和 吴跃农

⑦⑦说君师合一 新树鹏

我有幸目睹

香港回归谈判全过程

● 柯 华

1978年，柯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英国女王派遣羽饰金盔武士，驾着宝马雕鞍迎接他到白金汉宫。从此，中英关系出现了新的篇章。1982年柯华卸任回到北京，香港报纸曾有一段评论：柯华是北京外交界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他已被任命为廖承志的助手。香港前途可以断言已经出现曙光，因为柯华和尤德（当时香港的总督）不但熟识英国和中共的事务，并且特别了解香港和东南亚现时的国际情势……如今香港就要回归，我们特请柯老写出本篇回顾文章。

香港回归，普天同庆，我向香港的同胞们道喜、祝贺！在此时刻，我更记起中国政府为谋求香港问题的政治解决所作的种种努力，特别是中、英之间最初的接触，历历在目。

1978年，我受命出任驻英国大使。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紧中国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统一祖国定为当前和今后的三件大事。提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只要台湾取消“国号”、“国旗”，可以保持台湾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甚至还可以保留其军队。相应地，收回香港和澳门也摆到了工作日程上。作为驻英使节，我有责任了解英国朝野对于香港问题的动向，提供国内决策参考。

香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强占，香港给英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新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对

香港采取“长期利用，维持现状”的方针，才得以维系至今。英国认作“合法”依据的《江宁条约》、《中英续增条约》，特别是《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到1997年期满，英国不得不为英国利益忧虑了。英国有人写过一本关于香港的书：《借来的地方与时间》，意识到“借来”的总要在限定时间里予以归还。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要求允许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30日的土地契约，实质上是想长期维持英国的管治。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严辞拒绝。不过，邓小平也告诉他说：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利益。



柯华与英国女
王在一起交谈

我们注意到英国下院于6月13日就麦理浩访问中国进行的辩论。英国外交大臣的发言表示着当时英国政府的态度：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麦理浩北京之行并不意味着英国想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

7月5日，英国向中国递交了《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的备忘录》，并说中国可以不作答复。想让中国默认英国取消“新界”管治权的期限。中国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言辞作出答复：“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

1982年，我奉命回国述职，返英后，我和大使馆的同事们遵照中共中央港澳小组领导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的嘱咐，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像前首相麦克米伦、希思、卡拉汉，前津巴布韦总督索姆士勋爵（邱吉尔的女婿）、怡和洋行董事长亨利·凯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长斯威尔兄弟、英之杰公司董事坦劳勋爵，和一些政府部长、议员，以及颇有影响的《卫报周报》、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等，都表示英国不应该坚持三项条约，应该无条件把香港归还中国，也没有理由要求继续参加香港的管理；但也还有人主张在归还主权后，中国和英国共管一段时间，或“托管”一个时期；

还有人怀疑中国能否管好香港，尤其担心将在香港推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在各种场合，阐明中国政府将收回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等邓小平同志的构想和基本国策。赢得了许多友好人士的理解和赞成。

但是，解决香港问题，远非易事。

1982年7月24日，我在伦敦同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和前任总督麦理浩进行讨论。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我则据理强调：主权和管理权不可分，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双方争执不下。

尤德和麦理浩问道：“争论下去达不到一致怎么办？”

我回答道：“这也好办嘛。你们不是刚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九千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八千多海里，沿途有许多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又非常好，你们也不妨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嘛！”

尤德和麦理浩沉默了一会儿，异口同声说：“那是不可能的。用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

法对付中国是不行的。”

两个月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终于来到中国北京访问。

撒切尔以“铁娘子”著称于世。我初到英国时，英国通货膨胀率曾经高达22%，撒切尔执政后，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4%。她坚持把许多国营企业改为私营，失业人数高达300万，有些人认为撒切尔的政策有误。1981年10月，我应邀参加保守党第98届年会，会上有人情绪激昂地在发言时喊道：“撒切尔夫人应该拐弯了！”面对那么多的反对者，撒切尔坚定地回答：“要拐弯你们拐，‘铁娘子’是不会拐弯的！”针对失业问题，她说：“我宁肯养活上百万失业者，也决不养活一个懒汉！”这成了她的一句名言。

撒切尔在处理欧洲问题时，也以固执己见而闻名，有人甚至说她把欧洲议会吵乱了。

我在和撒切尔夫人接触中，感到她是一位有主见，有魄力，很果断，个性很刚强的政治家。

9月24日，撒切尔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相晤。我目睹他们为解开两个国家间百多年来的“死扣”，围绕中国固有领土香港的前途展开讨论。撒切尔夫人对中英友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在香港问题上，坚持英国政府立场，不肯让步。她在会谈中，强调“三项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撒切尔断言：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坚定地说：“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撒切尔听后表示：“恳请你不要把今天想的和说的传出去。”“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谈是坦

率的、友好的。”

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磋商香港问题。

邓小平的谈话为以后谈判奠定了基础。经过两年零三个月的艰苦谈判，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再次来到北京，同中国政府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我记得在此之前，9月26日草签《联合声明》的当天，英国政府曾发表白皮书说：“要更改这份协议是没有可能的。如不接受这份协议，就会没有任何协议。”话虽如此，以后还是发生了不少麻烦。当然两国谈判有不同意见，这是不足为怪的。但许多麻烦的发生，是出于英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难从历史上找到其根由。记得1957年我陪同聂荣臻副总理参加加纳独立庆典时，亲耳听到英国驻加纳总督克拉克曾大言不惭地说：“我自以能身为一个大不列颠王国的殖民主义者而感到骄傲。”在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人民听来，简直荒唐至极！但在克拉克看来却是天经地义。英国政府设有殖民部，管理四十多个殖民地。1966年合并于联邦部，1968年又合并于外交部。我们不难想象，现在英国某些人士的思想观念还承袭着两个世纪来的殖民思想，这就自然而然会产生麻烦了。

香港今天的繁荣，得“天时、地利、人和”，主要是香港同胞勤劳创造的结果。无需否认，英国人实行的管理方法、经验以及一定的投入，起了促进作用，但英国获取了更高的利益。在过去一百多年里，香港人创造的财富，成千上亿地源源不断流入了英国。从今以后，香港同胞所创造的财富真正属于自己，香港同胞真正成了堂堂正正的主人，再也不是昔日的“二等公民”。

为了香港更加繁荣，我以为香港基本法一定要严格遵守和实行，尊重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独立地位，一切工作从香港实际出发，尊重香港同胞的意愿。内地人要多想想“两制”，香港同胞要多想想“一国”。摒弃任何“左”的影响，不照搬内地通行的工作方法，吸取多年来香港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

（责任编辑 杨肇林）

香港驻军诞生记

● 张 波

香港传媒：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是大陆军队精英中的精英

1996年元月29日，香港各界名流、特区筹委、港事顾问和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云集在深圳某营地。他们将率先一睹驻香港部队的风采。

上午9时30分，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钱其琛，在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中将和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少将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接着，军事科目表演开始。

一座4层13米高的楼房下出现了一群侦察兵。只见他们个个矫似灵狼，沿着楼房的水管、阳台、窗台、避雷针等物体，以7种不同的方法攀登而上，如履平地。

紧接着，4挺重机枪对前方150米处的40个半身充气靶，进行了正面散布射击。片刻之间，全部目标一扫而空……接下来，是21名士兵动人心魄的刺杀表演，那钢铁与肉体的频频接触所产生出来的沉闷撞击声，以及由于人枪一体反复撕裂空气而发出的啸叫声，表现出了军人的质量和灵魂。

如果说刺杀表现出的是一种群威群胆的集体素质的话，8名士兵的多能射击则更注重士兵的个人素质。这个项目要求他们熟练使用7种武器，对不同距离上的6种39个

目标实施射击。这8名士兵不但圆满完成了多种武器对多个目标的射击，而且，他们在使用82迫击炮的时候，是在不用炮架、座钣和瞄准具的情况下进行的，技艺之精湛令人叫绝。当进行到狙击手对特种目标射击时，全场再度掀起了高潮。射手在距离目标150米卧倒瞄准后，播音员向观众介绍说，经过特殊制作的4个人体靶均分为头部、心脏、大臂、小臂、大腿、小腿等10个部位，请现场观众指示目标……于是，主席台上首长和观礼台上的来宾，纷纷兴致勃勃地用手提麦克风向射手发出“命令”：“×号射手，打头部”，“×号射手，打右小腿”……但见令下枪响，目标无漏。

第二天，香港所有的传媒全部以最主要的时间和版面，集中报道有关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公开亮相的消息：

——《驻军汇报表演展示军容，港共筹委等赞素质一流》；

——《严格挑选严格训练，相信军队不辱使命》……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报道。

有三份香港报纸进行了民意测验。第一份报纸提出的问题是：解放军进驻，怕不怕？

78.7%的人回答是“唔怕（不怕）”；

第二份报纸提出的问题是：97后解放军进驻香港你是否担心？

76%的人回答是“不担心”；

第三份报纸提出的问题是：你看完有关将来1997年7月来港驻军的解放军新闻报道后，有否改变他们的印象？

56%的人回答是“转好”。

无需更多地举例。历史将会记住这一天——1996年元月29日。

邓小平说：派一支“小”部队去

邓小平在1984年5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招待会之后，又给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人讲了如下的话：“为什么要在香港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象征？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1997年后还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了驻军，有了稳定的力量，他们就谨慎了，就不敢胡作非为。这条一定要坚持。从稳定香港出发，驻军人数并不在多，现在英国有七千，以后我们派三五千也就够了……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香港之后有权驻军，但又说驻军会引起波动。我说不会。我当时的语气是肯定的，就是要驻军……十三年里肯定有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现……不要到那时中央再派军队去，与其那样，不如现在就确定驻军。事情看大一点，远一点好。”

这是在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

题进行外交谈判以来,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代表中国政府表述了对于驻军香港问题的坚定立场。

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钟士元等人时说:“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说:“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随着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中国政府在1997年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已成定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总参谋部某部成立了“香港驻军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着手这支驻军的组建工作。

根据香港未来的防务需要,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将在我军历史上首次采用陆、海、空三军合成编制,其军官和士兵入选条件均高于我军现有的部队。

庞大的军事机器即刻高速度、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了。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被挑选的部队从各个省区迅速集结到深圳,以某集团军的“红一团”为主体,组建成驻香港部队的步兵旅。

这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后方基地组建完毕。

紧接着,3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在广西某地组建完毕;

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在广东某基地组

建完毕……

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广东东莞某营区隆重举行成立大会。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解放军整体说来,驻香港部队不过是其中的一支小小队伍,但由于它所担负的特殊使命,我们的军队究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的军官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是从总部到基层部队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为此,领率机关组织专人到部队搞调查,赴香港考察,然后根据驻香港部队的任务和需要,对干部的调配、管理、选拔、任免、工资、福利、家属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可行性研究。

“形象重于生命”是人民解放军的巨大法宝

面对这支部队日益国际化,他将向世界昭示——一支有文化、有道德的军队,应该是对人类文明的创造。领率机关认为:驻香港部队干部配备的首要原则是政治合格、道德纯洁。决定从全军范围内择优配备。

这一年的7月1日,驻香港部队筹备组临时党委召开了第一次党委全会。

会议决定在部队展开了“使命和形象教育”,“地位和作用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下气力狠抓部队的作风训练和养成,以此来带动部队全面的精神文明建设。

而对于驻香港部队来说,自豪感同样是一种战斗力。

军人,应当是最具有独立形式美的职业,一个连队在一声“放凳子”的口令下,会把一百多个小马扎“摔”得惊天动地,为的是表现出一种阳刚之气;整理内务,每个士兵都会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形状,尽管这样肯定会影响到被子的保温功

能,但得到的却是整齐划一的美感和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还有饭前唱歌,从医学角度上讲,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卫生习惯,就是在其内容与形式的分离甚至是相悖,但它却是一个好的作风证明……我在这里和他们生活了五个多月,所看到的全是军姿优秀的军人,无人塌腰、袖手、插手、背手以及军容不整,显然他们对“形象重于生命”观念已经物化。

当年轻的驻香港部队初具规模的时候,江泽民主席多次向军委刘华清、张震副主席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不同于全国解放时大军南下,不同于“好八连”进驻南京路,历史背景不一样,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按“一国两制”的原则办事,香港是港人治港,对此,驻香港部队在思想上要有充分认识。

江主席还亲临驻香港部队视察,并与“大渡河连”官兵亲切交谈。他告诫官兵们:你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作出好样子,在香港市民中树立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面对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作为驻香港部队的政治委员熊自仁少将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说,“形象重于生命”,不是空的,要具体化,要有知识、有教养,懂礼貌,守纪律。此外,还要研究许多新问题,比如学点外交本领,还比如对于我军“拥政爱民”这一光荣传统如何在香港发扬,就要考虑到不是要你上大街做好事,而首先是遵守法律和纪律,不扰民就是爱民,遵守法律就是做好事……

这使我想起在香港采访时,香港作家协会会长朱莲芬女士告诉我:香港同胞对解放军的期待,不是要解放军来帮助清扫街道,修理单车、手表,乃至看病行医。而是要解放军不干扰香港同胞的日常生活,这就是解放军最好的爱民方式。解放军如果做到了这种爱民,相信香港同胞也会拥军的。



朱莲芬女士这一番坦率而又实在的话，显然同熊自仁将军的见解不谋而合。

“踏浪而来” 的舰艇部队

1996年的6月，一艘登陆艇奉命将我送往下川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为了适应进驻香港这一特殊使命的需要，特地选择了这个地况与海况上均与未来在香港的驻地相似的海岛进行封闭式训练。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海军部队，它的前身是海军某部的一个大队，始建于50年代初。在人民海军所经历的6次主要海战，其中的4次都有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著

名的“海上先锋艇”、“海上英雄艇”和战斗英雄麦贤得均出自于这支部队。

刚踏上这个小岛，我便在大队的黑板报上看到了水兵所写的一首诗——

我们来了，带着光荣、勇气和使命，

我们踏浪而来，是一群年轻的海鹰……

立时，我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冲动。“踏浪而来”，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句子，一个多么美丽的意象。

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从接艇离厂、归建部队到完成编队科目训练，直至实际使用武器，前后仅用了125天，比正常训练程序提前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奇迹的背后，是驻香港部

队舰艇大队全体官兵所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某艇在接收过程中，官兵们请来了二十多名专家授课，5个月下来，竟完成了2700个课时，记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

面对整个大队的装备所带来的新问题，大队长朱益飞、副参谋长潘树坤、艇长马满鹤等人以一条艇为“麻雀”，苦战数月，编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舰艇部署表和设备使用、维护规程。装修处长许小平，在德国“MTU亚洲培训中心”学习期间，他是学员中上课提问最多、加班最多、学习结束时带回来资料最多的一个，深受外籍教授的赞扬。

入夜，下川岛安静极了。明月高挂海空，涛声盈耳，勾人阵阵遐想，我遥望军港，下川岛上的老百姓大都是当年大清王朝戍边军人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曾在此目睹帝国主义的兵舰如何在我们的领海上耀武扬威，亲身感受过由于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所遭受的屈辱。他们哪里知道，这支停泊在他们身边的舰队，将代表祖国，也代表他们，去洗刷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告慰历代中国军人的在天之灵……

海天上的鹰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是以人民空军某飞行师一个大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这是一个屡建战功的英雄集体，在救助国内外自然灾害的战斗中，他们先后出现在邢台、唐山、云南等大地震的现场，出现在大兴安岭火灾、内蒙古雪灾和孟加拉国水灾的第一线；他们还多次执行过卫星回收、导弹发射等重大科研保障任务。此外，作为被行内人所称誉的中国“皇家空军”，他们曾多次担任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们闪光的航迹。

航空兵团的梁纪铭政委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市民关心驻香港部队空军的程度要高于兄弟部队。因为,在香港,除了驻港英军的空军之外,还有一支香港政府航空服务队。这个航空服务队装备精良,素质优秀,长期以来担负着香港地区陆地、海洋和空中的抢险救灾任务,在香港市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们进驻香港以后,香港市民也自然会把我们同他们进行某种比较。

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的朴俊安参谋长,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防务专家考察香港时,正遇到某山顶出现火灾,将一些春游的学生困在了山上,香港政府航空服务队闻讯紧急出动,在火灾现场实行悬停吊救,整个救援工作进行得很成功,但是,在最后一刻却出现了疏漏——有两个学生在上直升机时掉了下来。结果,由于香港电视记者的现场直播,这一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香港市民纷纷对此发表意见,航空服务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也被请到电视台,对记者和市民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回答。这件事,给朴俊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我军进驻香港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旦也出现如此的事,那么,不但会给香港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损失,也势必会直接影响到我军的形象。

为了组建一支优秀的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人民空军把自己的一批直升机飞行尖子都调集到了这支特殊的部队。现任航空兵团副团长、空军特级飞行员丁文义上校,就是其中的一位。丁文义飞直升机飞了28年,飞行时间长达3600小时。在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驾驶着战机,北到北极村,南到西沙群岛,东到舟山群岛,西到嘉峪关,唐山大地震后在震后的唐山机场上,各类型号的飞机频繁起落,其密度最高时达到26秒起落一架飞机。那其

中,就有以丁文义为机长的机组。在孟加拉国发生严重水灾时,丁文义等3个直升机组受祖国的重托前往该国参加救灾。在46个飞行日当中,他们空送救灾物资300余吨,接送200余人次,安全飞行400多小时,航程达64000公里……

1994年和1995年的夏天,广东、广西等地连续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哪里有灾情,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出现航空兵团的直升机。湛江是

有名的多雷雨区域,飞行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凭着过硬的飞行技能,赶到灾区并连续飞行三十多个架次,为抢救被洪水围困的人民群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水灾过后,一位农村青年骑了二十多公里路的自行车,好不容易才找到航空兵团的驻地,将一个用红纸包着的菠萝蜜执意送给飞行员,那红纸上写着“感谢救命恩人”。一回才知道,在水灾发生的时候,这位青年的一家一连数日都被大水困在一座楼房上,在万般无奈之时,是航空兵团飞行员刘建军驾驶的飞机发现了这一家人,并准确地向他们投了救命的食品。大水过后,这家的果树上只剩下了这一个菠萝蜜,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提议,将这个菠萝蜜送给开飞机的解放军……

1996年5月的一天,我登上了一架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直9”,



在广州上空进行了长达数十分钟的巡航训练。透过淡淡的云雾,城市安详,宁静,我几乎感觉就是在香港的上空飞行着,下面的这座城市,便是美丽的东方之珠。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之歌在我的耳畔轻轻响起——“海天上有一群年轻的鹰,我们是驻港航空兵……”

世人评估解放军进驻香港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香港,成为了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一个最具体的象征。有关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乃至有关整个解放军的所有消息,正在香港地区乃至更大的范围内,被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广泛关注着。

例如在1996年4月,香港的各报纸纷纷发表了以《解放军提前“进

驻”石岗军营》、《解放军、英军并肩作战》为题的文章，一时引起了市民的惊诧。其实，仔细再看文章的内容，才明白这是介绍解放军广州体育学院的一支球队访问香港，并与驻香港英军的球队进行比赛的报道。

香港同胞对驻香港解放军的关注并非是最近的事情。早在1993年，一位居住香港多年的老人，就曾经写信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提醒少数港人对于解放军怀有恐惧的心理，希望解放军要搞好“防腐”教育，成为能文能武的一流战士，能够抵御“糖衣炮弹”和“黄、赌、毒弹”的袭击。

应该承认，这位老人的话道出了香港的另一种真实。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于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的误导，部分港人对于解放军确有闻之色变之感。

毕竟，血浓于水，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骨肉亲情。在一篇《未来特区之福》的文章中，香港同胞是这样看待解放军进驻香港这个问题的——“姑且不论主权象征，也抛开社会治安因素，单是救助灾害这一点，解放军驻港的意义也不可低估……当年唐山大地震，前些年华东大水灾等巨大自然灾害，都是因为解放军的及时抢救，才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令人欣慰的是，未来驻港部队是一支完全能胜任抗灾抢险突发事件的部队。香港的经济成功是举世瞩目的。但也毋庸讳言，香港作为一个地区，其自身抵御大型自然或人为灾害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有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且吃的是‘皇粮’的解放军部队驻扎其间，以应急需，正好能弥补上述不足。如此，岂非未来特区之福？”

由于对解放军进驻香港的问题已经成为香港公众关注的新闻焦点之一，有关驻香港英军的一些内幕也被“捎带”着的新闻传媒上频频曝

光。比如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后军人犯法如何处置的问题，曾经一度在香港舆论界引起种种议论。1996年7月，香港某报纸特地披露了“本地法律赋予驻港英军的权限”——

A、权力

1、有合理怀疑可捕非法入境者；2、协助政府时可有警方的权力、保护和豁免；3、可未经船东等准许而登上船舶；

B、补偿

1、按公安条例真诚行事时，毋须负法律责任；2、当值使英军死亡或受伤免受民事责任；

C、豁免通行管制

1、豁免进入某地区的限制；2、豁免受某些泊车及交通有关的限制；

D、豁免火器及武器的管制

1、免一般藏有、处理火器、弹药领牌规定；2、豁免对违禁武器的限制；3、不适用在公众集会藏有攻击性武器规定；

E、射击练习、规定可作射击地区，须遵循程序，安全措施；

F、投票及陪审官服务

1、无登记成选民或投票资格；2、豁免出任陪审官；

G、课税、差饷、隧道费

1、军人薪金及退休金毋须缴香港薪俸税；2、军事用地免差饷；3、隧道内执勤不用缴隧道费；

H、军事用地

1、收回官地、征用土地中，军事目的可作为所必须的公共目的；2、可能影响军方权益的各种行政保障；

I、资历

1、军中医生、牙医可视作合注册要求；2、委任法律服务人员可在刑事诉讼代表英军；

J、人民入境管制

1、未经入境处人员许可进入香港；2、非本地居籍军事人员可豁免登记香港身分证；

K、杂项、豁免权及特术

1、执法机关不能截停、登上、搜查军舰、军机；2、军方食堂不受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管制；3、可豁免某些建筑物及公用事业的管制；4、诊所、医院、护养院、留产院免注册及视察。

这26款驻港英军的权限一经披露，在港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在港生活多年的港人也大为吃惊地说，这么多年也从不知道驻港英军竟拥有这么多的特权。

1996年12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其所谓的“特权”也远远少于驻港英军。对于香港驻军人员的司法管辖问题作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从而在法律的角度上给了香港同胞一颗“定心丸”。

无可奈何的悲凉 和理解的智慧

1996年10月16日下午2时30分，我作为一名“公众人士”持“U728”号旁听证，来到了立法局会议现场。按照立法局的惯例，每年要召开两次重要会议，这次为对港督的施政报告进行辩论。

立法局会场，空间宽阔，屋顶呈拱形。除主席位和议员位外，还在会场两侧的楼座上设有旁听席，并附有英语和粤语的同步翻译耳机。墙上有计时钟，每当与会者发言达到13分钟时，便会响铃提醒发言者注意已经超时。

2时30分整，立法会主席黄宏发准时在主席位上就座，全体起立，气氛庄严。随后，议员们开始发言。毕竟这已是临近“97”的时刻，议员们的发言明显地紧扣着这个主题。其间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某议员在发言中，将香港大会堂脱口说成了“人民大会堂”，引起全场出现了一阵会意的笑声。这未免令感到即使是在这个也许最有资格代表香港

现存社会体制的会场上,那种被称之为“97情结”的感觉也依然无处不在。

当然,在这次立法局的辩论会上,我也看到了右派的表演——表演者是某党主席。这位先生以回忆自己到港几十年的经历开始,然后“饮水思源”,为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认为这个期间的香港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安定,发展”,说到激动之处,这位先生还当场以英语和粤语朗诵了一首“诗”——

民主斗争是转移还是坚持的时候?

基本法是焚烧还是维护的时候?

联合声明是放弃还是捍卫的时候?

说实话,我在“聆听”了他的这番话后,除了对于他的“诗”在艺术上实在不敢恭维外,只能联想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

香港《镜报》社长徐四民先生告诉我,当年陈毅带领大军进驻上海秋毫无犯,由于宣传工作做好了,就曾在香港市民中引起很好的反响。其实不只是对解放军的宣传,还有像在香港工作的共产党员干部们,他们是拿着内地的工资,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是很低的收入。就这一点,英方的哪个官员能与之相比?还有驻港英军每年要由港人担负二十多亿的军费,而解放军进驻香港后军费全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这一条,英军又怎么和解放军相比?

徐四民先生说到的中方在港人员的收入问题,确是一个港人所关心的问题。我听说过一个“笑话”——我国国防部防务专家在港考察英军三军会所时,有几名负责打扫卫生的老年妇女向我们一位官员叫苦说,我们的薪水很低啦,每个月才8000元。旁边的保安一听也跟着叫,我们也低呀,才10000元。叫完了就问我方官员,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方官员只好对他们笑笑,无可奉告。

香港的一家报纸曾报道过一则消息,驻港英军的普通军士月薪达2万港元。驻港英军司令的月薪大约是12万港元,至于港督的月薪则更是高达17.8万港元,如果再加上每年46.3万元的交际费等收入,其收入总额要高于美国总统。

对于香港的未来,徐四民先生充满了信心。他非常赞同和欣赏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主席安子介先生的一段话:一国两制就像中国古代的太极图,一个浑圆形,一边黑,一边白,中间不是一条笔直的“对抗”的直线,而是一条S形的曲线,白中有黑,黑中有白。互容并存,两者又不是绝对一成不变,而不同的时序方位,正是造成变化的因素。变来变去,但两者仍能适应。既然有黑有白,不是清一色,

就会有差异,有不同的看法,不对抗,有商有量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实在可以说是对“一国两制”的一种智慧的理解。

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到来了,在五星红旗和紫荆花交相辉映下,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中环的写字楼还是熙熙攘攘,百货公司还是顾客盈门,联交所的电脑还是那么紧张地运作,启德机场的飞机还是穿梭般地起降。伶仃洋上,海风轻拂,阳光灿烂。我隔着蔚蓝色的大海向远方凝望,远方,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城市,然而又是一个梦幻般的真实……

(张波:广州军区创作室主任,一级作家,著有《平常人家》、《广州城外城》、《太阳方队》等)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罗瑞卿与大比武

·舒云



—

1964年初，新中国军事史上出了个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大比武。

在人们印象中，大比武是罗瑞卿一手搞的，实际上，大比武之前，郭兴福教学法就被分管训练的叶剑英元帅认可。

1961年初，郭兴福教学法从基层冒出来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一开始并没有看好。他找了八个将军组成一个班，交给郭兴福，看看他用什么办法教练。没想到几个小时下来，汗流满面的将军们连连说，不服不行，不服不行。许世友也服了。他大擂三通鼓，让郭兴福在杭州给由各部队组成的19个分队作教学法汇报表演，随后又召开了数百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战术现场会，和各兵种43个分队参加的战术、技术课目汇报会。从此，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军区遍地开花了。

叶剑英听说南京军区出现了这

么个尖子人物，他找来《军训简报》、《军训通讯》上所有关于郭兴福教学法的文章读了一遍，还特别仔细读了郭兴福关于单兵进攻战术的作业笔记，他感到这是件新生事物，立即决定派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到南京看看。

1963年底，在张宗逊主持下，总参在镇江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分管训练的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叶剑英也专程赶来观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的作业表演。

叶剑英看到郭兴福生动活泼的教学和战士们生龙活虎般的技能训练，心里高兴极了。他在镇江整整看了三天，越看越细，边看边问战士对战术、技术的理解，负荷有多重？戴上防毒面具对射击和战术动作有多大影响？还问到战士的姓名、年龄、入伍时间、文化程度等等。大会结束时，他对与会干部说，……现在全军公认郭兴福教学法是个好办法，不管哪个军种、兵种的基层连队，全国的民兵，都认真按郭兴福教学法来

训练部队，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叶剑英回到北京，提笔给党中央写了报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和自己所见所闻的观感，建议全军推广。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读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当即用红铅笔在下面重重画了一道杠，读到“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练兵方法”一句话后，对叶帅说，这不仅是继承，而且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发扬。还说，总参镇江现场会，到会的多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必须让“前排议员”到会，一把手亲自抓。

毛泽东把总参谋长罗瑞卿找来告诉他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的练兵方法。

为了使它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剑英把郭兴福教学法归纳为五个突出的特点：

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

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兵练得个个像小老虎一样；

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等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

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

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

叶剑英认为这些方法不仅适于部队，也适用于军事院校。不仅适于步兵，也适于别的兵种、军种。于是，他向军委写了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二

罗瑞卿看了叶帅的报告，以极大的热情，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和研究。为了尽快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决定组织一个大型的现场会。罗瑞卿向林彪报告后，通知各大军兵种的领导都参加，由



1964年叶剑英观看郭兴福教学表演

他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现场会。

1964年1月下旬，罗瑞卿第一次看了郭兴福的表演。郭兴福紧张，出了不少漏子，罗瑞卿怀疑了，又看了一次。这次就不同了，他看到郭兴福确实是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在训练战士，他的示范动作准确规范，而且大都是来自战场的亲身体验；教学语言也形象、生动，不时引起观看者阵阵笑声。战士们的动作质朴无华，刻苦认真，还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罗瑞卿真感动了，从怀疑到肯定再到坚决支持。

这次现场会与与会者都是军以上干部，他们都欣赏郭兴福高水平的教学，确实是个好方法，但几十年铸就的阶级斗争观念，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中心议题，就是郭兴福这个典型值不值得推广？他是旧军人，还是国民党吴化文那支汉奸部队过来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经过几十

年的整治筛箩，已够纯的了，眼下又大讲突出政治，把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树成典型，能行吗？

在各大区的小组长会议上，罗瑞卿为这事表态了：

“你，粟裕同志，你当过总长，你说说对这事怎么看？”

大将粟裕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没说什么。那时粟裕因“教条主义”已经受到批判，没有什么职务了。

罗瑞卿继续点名：“还有你，韦杰！”

“你，赵章成，你不是国民党过来的吗？”

“还有你……不是也是从国民党举手过来的吗？”

罗瑞卿坚定地说，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多了，连我也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嘛。郭兴福怎么不能当典型？

“政治总长”有如此说法，将领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了。

这次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领导，海军舰队司令员，陆军和空军所有的军长，以及总部有关部门的领导127人。会议开了六天，还看了11个教学单位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精彩表演，边看边议，赞不绝口。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说自己过去也当过基层干部，也教过战士，但没有郭兴福搞得那么好，他教得严教得细教得活，他训练出来的战士，能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动作，我们的部队如果能训成这样子，那就什么敌人都不怕。

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说，今后打过仗的老干部越来越少，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做才能使新干部把我军优良的战斗传统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接下去呢？现在郭兴福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采用多流汗、多用脑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多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宝贵经验传下去，并且大大发扬起来。

看过几次郭兴福表演的人认为

一次比一次有进步，真是把兵练活了。最后众口一声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推广。

那天晚上，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招待演出《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建国以来像这样军以上干部集中在一起的情况不多，开演前，高级干部们都很高兴，好久不见了，你打我一拳，我刮你一下鼻子，他们正用“游击习气”热热闹闹时，有人喊了一声，罗总长来了。

全场马上鸦雀无声。

演出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主持，杜平说，今天欢迎全军各大区领导同志，特别是欢迎罗总长，下面由许司令员致辞。

许世友说话向来三言两语，那天喝了点酒，话更是简单：同志们，你们来南京军区没什么好招待大家的，鸡巴毛炒韭菜……台下哄堂大笑。

罗瑞卿还是即兴讲了十几分钟。

罗瑞卿说，过去主要靠打仗来训练，现在主要靠训练来打仗。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战备。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军事训

练的方针和原则，是编写条令教材的指针。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和原则，还必须要有成熟的教学方法，而郭兴福教学法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它着重在一个“练”字，只有下苦工夫练，才能真正练出硬工夫。

最后，罗瑞卿号召学习赶上超过郭兴福，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把我军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

“文化大革命”中，受大比武牵连最厉害的是罗瑞卿。在人们习惯中，一说大比武，就很容易联想到罗瑞卿。

大比武时，罗瑞卿已经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风风火火干了五年了，说大比武与他息息相关一点没错，但大比武最初的郭兴福教学法，和最先发现郭兴福的是当时十二军军长李德生。

和平时期，提高部队战斗力只能靠军事训练，50年代初一直是照搬苏军的训练方法，军区有专门的苏军顾问指导训练。中苏关系恶化后，部队批判“教条主义”。以前是不走样地学苏联，一举一动都搬苏联那一套；现在不学了，必须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期间，叶剑英先后在上海、无锡、南京连续参加了海军、空军、陆军召开的训练会议，从理论上作了一系列的指示，强调和平时期，部队要靠训练来学会打仗，靠训练来提高战斗力。要探索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符合现代战争要求和我军特点的训练方法，并提出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典型。这些话给了李德生很大的启示。作为一个军事干部，不能等靠现成的经验，而应该深入部队去寻找军事训练的新办法。1961年初训练开始，李德生带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抗美援朝的英雄连队某团二连蹲点。



李德生与郭兴福在训练场上

这个连队是军里的训练先行连队，李德生发现战士的训练热情很高，问题是在干部的教学中，缺乏灵活性，搞模式化，或者马马虎虎走过场。辛辛苦苦练了半天，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应付个好成绩。于是，李德生进行了一次检验性的实弹射击考核。事先没有通知，而且带战术背景，还把全师的连以上干部全都集中起来等着观摩。整个连队全副武装跑了十几里后，李德生又命令改变方向追击敌人。等连队一到预定位置，李德生就命令对准36个靶子射击，要求8分钟内射击完毕。结果，一向训练好的先行连队才打了个及格。

带领这个连的就是副连长郭兴福。

郭兴福一脸委屈，他对这次突然袭击的考核方式思想不通，觉得军首长有意把全师连以上干部集合起来看他们的缺点。

于是，李德生和郭兴福进行了一次长谈。

郭兴福打过仗，他明白了军长的良苦用心。训练不是为了摆花架子，而是为了打仗，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过硬的真本领。

郭兴福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了好多年，闹得多了，脑子又转得快，一个小土包能让他讲出好多有关战斗中隐蔽的学问，所以他对士兵的训练不再是那么死板，而是根据战士的技能、体力、有文化没文化等特点，从难从严调教，逼着战士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他对一个战士说，敌人的半自动枪手，向你打了八九发子弹后突然停止射击，你该怎么办？战士想了几种可能：或是被我消灭，或是枪发生故障，或是有意欺骗……半自动步枪一次只能装10发子弹，最大可能是敌人在装子弹，所以他飞身跃起，向敌人冲去。另一次郭兴福做示范，一脚将飞来的手榴弹踢飞，战士也照做。郭兴福说，刚才手



罗瑞卿在现场看郭兴福表演

榴弹离我近，应该踢，现在这颗手榴弹离你四五尺远，就应该赶快避开，争取时间快速冲过去。郭兴福的好多语言和动作都已经戏剧化，甚至有点“小品”的味道，常常能逗得人哈哈大笑，他那抑扬顿挫的语音和纠正错误的诙谐语言，使枯燥的训练场有了生气。再加上一批经历过战争的干部不断地出点子，就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套教学方法。

十二军是个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解放战争初期，曾出过闻名全军的带兵模范、战斗英雄王克勤。1947年他在鲁西南战役中牺牲。他是1945年平汉战役后参军的解放战士，机枪打得好，以后当了班长。在张凤集与敌人五大主力之一的一支部队作战，打了一天，打退了敌人四十多次进攻，部队伤亡很大，而在最前沿的王克勤班却无一伤亡。王克勤创造的带兵方法，曾在整个人民解放军中推广。李德生知道，只有抓典型，才能更好地推动全局工作。他决心抓一个新时期的训练典型。三十四师师长武效贤，当年曾是王克勤所在营的营长，就派他带工作组

亲自抓郭兴福和示范班的训练改革。军里也专门抽了四个参谋组成“智囊团”，对训练教学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进行推敲，集中全力对军事训练中最基本的单兵战术训练进行改革。

最后在众多人的参预下，郭兴福经过几年努力，终于把兵练活了：笨兵变聪明了，怕苦的勤奋了，爱哭的坚强了，骄傲的谦虚了。“智囊团”把郭兴福教学中的方法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在军、师、团推广。

郭兴福教学从此起步。

四

全军现场会后，罗瑞卿回到北京，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了报告，认为郭兴福教学法对于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得很好。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因人施教。表扬多于批评，善于启发诱导。把工作做活了，把兵练活了，把自己的头脑也使活了。

南京现场会后，总参还召开了

由副总长张宗逊主持的信阳比武会，组织八一厂拍摄了专题片，并进行了连续的新闻报道。全军出现了学赶超郭兴福的高潮。

南京现场会结束后，广州军区就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评比现场会，还把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几个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都请到现场。紧接着，南京军区举办了营以上干部集训队，司令员许世友亲自任队长。

许司令拿出了少林精神，他给军师干部当了教练班长。一次，在镇江小农庄的一座山上，他做单兵进攻示范冲击时，把一颗手榴弹实弹投向前方的坡地上，已过六十的人了，体力不支，手榴弹只投了十五六米远，那冒烟的手榴弹还往下滚。正在这危急的关头，一个干部飞身将许世友压在地上，手榴弹滚到十米处轰然炸开了，这位曾在红四方面军用大刀片子冲杀了78仗的大区司令，爬起来还瞪着眼训人：这有什么怕的，打仗就得抓住这工夫冲上去！

领导纷纷上阵，全军的大练兵大比武进入了高潮。涌现出了许多技术能手和技术尖子，有的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仅北京军区就涌现出不少五大技术过硬的连队，夜老虎连、飞毛腿连、铁脚板连……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就更多了，有左右开弓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有空手攀附绝壁的侦察员，有开着汽车从悬空钢轨上进退自如的驾驶员……南京现场会后，罗瑞卿向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建议国庆节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和在广州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都表示同意，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

那一段时间，罗瑞卿多次陪同周恩来、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观看军事表演。5月20日，周恩来在杨村看完表演后，高兴地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你们表演得

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陈毅也说，打得这样准，有很高的成绩，这在世界训练史上也是破天荒的。贺龙要求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好好总结一下，一方面推广郭兴福，一方面找出自己的郭兴福。

6月15日和16日两天，天气好极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西郊射击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

表演项目排得满满的，就像过节一样，掌声一阵接一阵，笑声也一阵接一阵。场上最活跃的就是罗瑞卿和东道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及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罗瑞卿回答着领导同志的提问，如数家珍一样向他们介绍那些特别优秀的选手。当优秀射手宋世哲射击完后，罗瑞卿把他的半自动步枪，拿给毛泽东和刘少奇看，并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半自动步枪，打得快，打得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

一位摄影师拍下了这个镜头。

毛泽东对每一项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泽东还对画着蒋介石头像的沙袋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边说边打了三拳。大家都笑了起来。

在观看表演时，毛泽东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要很快布置，抓紧这项工作。毛泽东还说，部队要练近战、夜战。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这样打起来，

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毛泽东还说，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连着两天的军事表演，毛泽东一直看得兴高采烈。

就在毛泽东观看北京、济南军区的军事表演前后，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都先后发表了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以及赞扬比武的讲话。

消息传开，各大军区都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汇报。可是，北京一时难以找到同时容纳陆海空三军比武的场地。分工抓训练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急得去找刘伯承元帅讨主意。

刘帅身体不好，虽然没有到现场观看，但他一直关注着比武，他建议说，既然要比一比，那就对手条件一样，按兵种分开赛，按地域分片进行。

紧接着，7月8月9月全军分北京怀柔、河南信阳、甘肃天水等18个地区进行了陆海空比武。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的共有3318个单位的数万人，在3766个项目上进行了角逐。

正当一个大练兵的热潮滚滚而来的时候。毛泽东此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项条件。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不久，毛泽东就叫贺龙和罗瑞卿一起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以此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

毛泽东说警惕赫鲁晓夫这个话的时候，罗瑞卿做梦也没有想到，不久自己就成了第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五

据总参军训部统计,1964年射击训练优秀的步兵师比上一年增加了四倍,投弹40米以上的人数增加了九倍。

大比武达到了高潮,可就在这年年底,练兵热潮被打了下去。

罗瑞卿在延安写作《抗日战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时,因为住在毛泽东隔壁的窑洞里,经常与毛泽东见面,有一天,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而无鱼,人至察而无徒。

实际上,含着对罗瑞卿的意味深长的责备。

罗瑞卿有自己非常突出的个性,一直到他去世,他的至清至察也几乎没有改变。他不懂怎么还能不至清不至察,不懂得避开锋芒去选择一种权宜之计。只要认为不对,他就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管你是谁。

1965年1月3日至5日,连续召开了三次军委办公会。之后,又召开了第八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一样的,即传达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在某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讨论1965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草案)。

与会者一个接一个发言,那么多高级干部都肯定了大比武,罗瑞卿只做了一个明确表达自己意见的发言。

罗瑞卿不同意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坚持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1964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大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不能泼冷水。罗瑞卿还说,政治不是乱冲击一切,不能搞空头政治。要保证完成训练和生产任务,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

不好,提不高,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空头政治家。罗瑞卿说,我同意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突出政治就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大庆不出油,大寨不出粮,叫什么突出政治?这样的突出政治就没有说服力。

这些意见都是他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经林彪同意后,以军委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

就是在全力抓大比武期间,罗瑞卿也没有光强调军事,而不管政治。

1965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了个“神仙会”,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大比武冲击政治,就是其中一条罪状。后来,把罗瑞卿弄回北京,“三军升帐”,又批了三个月。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几乎将罗瑞卿置于死地。

罗瑞卿复出后,他最关心的是戴有“资产阶级军事权威”帽子的郭兴福的平反。

罗瑞卿说,他在福州住了半年多,说服人家给郭兴福平反,只有一个接受他的意见,别人都不同意。罗瑞卿说,我说不上话,说了人家也不爱听。在罗瑞卿不断地关心下,被判死缓的郭兴福终于平反了,重新回到南京步校,当了战术教研室副主任。

1985年,郭兴福外出看地形,因车祸去世。

1991年4月,南京军区隆重举行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解放军三总部联合发文,号召全军指战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为部队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教练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使部队训练生动、深入浅出,不断发展,开创新局面。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伯父彭德怀的八万言书 是怎么写出并保存下来的

● 彭梅魁

整理者按：彭梅魁，彭总二弟彭金华的大女儿，1929年生。1949年湖南解放前夕，彭总托地下党的同志将她与弟妹多人接至北京，从此他们一直生活在彭总身边，1959年彭总落难迁居京郊吴家花园，梅魁不断去探望。下面是梅魁回忆伯父写作“八万言书”的情况，和她不畏艰险使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完好保存的经过。本文是照她几年前对我的长篇口述原文摘抄下来的。

——整理者：丁隆炎

伯伯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后，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从中南海迁出，住到了市郊的吴家花园。在这里，好长时间他总是很苦闷，站不是，坐不是，有时屋里院里走来走去，有时呆呆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我们姊妹兄弟去看他，走的时候，他总要说：以后不要来了，再不要来了。但下一个星期日我去晚了点，一进门他就问：“你怎么这时才来？”其实我是一早就动了身的，路上换车耽误了，但我不能这样说，怕老头知道换车不易又有了不要我来的理由，只说：“你老说不要来了，我半天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来。”他说：“不来好，不来好……”景参谋当面堵他的嘴：“还不来好哩，一早就到公共汽车站等去了，等了两个小时。”景参谋在一旁嘱咐我：“以后你可别耽误了，早点来，没什么拿不定主意的。”我说：“拿不定主意，是来一次要吃你这里两顿饭。”这个原因，在当时我是不能不考虑的。我知道，伯伯常在我们走后在饭锅里加野菜来填补我们吃去的定量。伯伯却以为我不知道，笑着说：“你这个调皮鬼，原来是在挖苦我呀，可我，唯一的顾虑是怕牵连了你们。”

我们兄妹有约，去了都不给伯伯讲外面的事，讲也讲好的，怕影响他的心情和“进步”。

1960年青黄不接时，他摘了满满一篮子野菜，说：“这都是能吃得的，煮在饭里，一两米能顶二两的量，你带回去吧。”

我明知道在这个院子之外，哪儿也难找这样的野菜了，但连看也不看：“哪个要？我不缺粮！”

“你呀，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我知道你一月21斤粮，还要交2斤节约粮。”伯伯说。

“哪个告诉你的？”

“它！”伯伯指着院墙外一棵榆树。我早看到了，那树上刚长出的叶子被捋得光光的，只

好说：“农民是苦一点……”伯伯说：“我有眼睛看，有嘴巴问，捋树叶可不只是农民呵……”

我不想和他说这些，便叉开话去：“伯伯，你就不要再说再管这些了，只求心安理得吧！”

他大声斥责我：“一抬头就是到处光秃秃的树杈，我能心安得了么，它们呀，就像老百姓举在我头上的条子，要抽我的筋！”

这年刚开冻，伯伯就在院子里开出了一块又一块荒地。到初夏，地里的蔬菜瓜果都长出来了。此后我每次去，伯伯都摘下满篮子让我带回来，我不敢再在他面前说大话，谢绝了他更要生气，每每手提肩背，自己吃不了还送了些给别人，并且老实承认了，我每次带回去的东西自己吃了多少，还救了哪些哪些人的急，消了哪家哪家人的肿病，我都告诉了伯伯。伯伯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有你这句话，伯伯方觉得自己还是个活人，还有点用场。”

不久，伯伯在劳动时倒栽进一口枯井里，头破了，一条胳膊断了，差点送了老命。我既心疼，又气恼地对他说：“我再不要你的菜了，我咽不下去，你也不要再搞这些了！”我把他屋里屋外堆放的乱七八糟的农具扔得远远的，还扔了他屋里接屎尿的破痰盂。伯伯吊着受伤的胳膊说：“梅魁，你这才是要了我一条老命哩！老百姓叫我农科所老头，我是凭这冒充牌子才有脸闲住这儿，有脸见他们的呀！”他把我扔了的破痰盂捡回来时，还举起来对着光照了照，说：“幸好幸好，没破。”转头对我嘿嘿笑着，“我不是买不起化肥，是要用老百姓用的同样肥料，这才算名副其实的农科所老头嘛！”他笑得好开心，我却捂住脸哭起来。

伯伯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用劳动和读书打发日子，总算是找到了一份精神寄托。

1961年，他看了中央一个关于农村经济政



1958年彭德怀在
株洲麻纺厂调查

策的文件，高兴地说：“我们党里高明人很多，不只我彭德怀一个人才看得到问题，才敢说话，你看，这不是有了个文件，给农村规定了新政策，这下好了，总算拐过弯来了。”从此，他再不发怨言，不议论时政，似乎是真的开始心安理得埋头过自己的日子了，我心里也暗暗高兴他有这番清闲自在的心境。

但过了不久，我又发现他在写什么，写了一摞又一摞。参谋秘书都说，老头近来很烦躁，常常整夜整夜不睡，在屋里写作或推磨似的打转。我去了，他盯着我半天回不过神，我还没说话他便朝外挥手。终于我找着机会问：“你写什么呀？”他告诉我，他新近又背了一条罪名：和外国人搞阴谋颠覆有联系。“我原先想，只要我们国家慢慢好起来，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毁灭了又有什么，无非是生不求功，死不留名嘛。但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你不求功，不留名，但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再安它一个。这就不是毁灭了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会毁灭了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终有一日会乱成一坨！”他越说越激忿，以致大声吼叫开来。

他这一说使我着实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子呀，怎么能这样子呀！我一面念叨，一面打起寒颤，止不住哭了起来。

“梅魁，你害怕了吧？是呀，当初写了一封信，就落得这个样，再写出我一肚子火，后果是更难想象的。不过，我想好了，写不写人家都得叫你遗臭万年，横顺是这个下场。”伯伯见我哭得更凄惶，坐下来放低声音说，“前些时，朱老总也来劝过我：‘彭德怀，闭着你的嘴，我不信别人敢把你怎样，人间自有公道，到时候会有人站出来为你打抱不平的！’老人家是好心。可我心里想，我的事不能牵连别人，我的话自己说，刀山火海我一人上。如只为自己图清静安乐，就这么当个任人践踏的软鬼，我当初不参加革命，就干国民党多好，二十几岁的团长，不也是能安享一份荣华富贵么？我是为求一个人间公道才豁出这条命来，今天已是这把年纪了，反倒对人家扣在头上的屎盆子气都不敢出，岂不让人笑话？”伯伯见我还在止不住哭，生气了，跳起来说：“梅魁，谁也挡不住我，你要是害怕了，以后不来就是，还可以申明脱离我们的伯侄关系嘛！”

我也跳起来对他吼：“伯伯，你不要这样看我。你这人有个大毛病，总以为自己才有胆子，别人都是饭桶。我哭，是因为人家给你安的罪名太狠，是因为不解别人为什么这样对待你，是因为你太可怜你太悲惨呀……”我放声大哭，伯伯仰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伤心的时候就这样，没有泪，只有



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与亲属合影（右1为彭梅魁）

心里流血。

从这以后，伯伯不再拒绝我读他写下的材料。刚好有几天假，我把一大厚本材料一字字地细读完了。最后我要求，“伯伯，把这些材料抄给我一份吧。”

“你要它干什么？”

“好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也从不对我们说。我留下一份，将来我可以给弟妹儿女们讲呀。”

“我有话向党说，我不能把你们牵连进来，把你们害了，我说过，我一人作事一人当。”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的要求。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弟弟彭启超从武汉来。启超的模样和性格都有点像伯伯，加上当时他年青，刚火正旺，风风火火冲进吴家花园大门，指着满脸笑迎他的伯伯就是一通质问：“你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你给我说！你过去怎么教育我们的？你给我说！”

伯伯叫他进门他不进，叫他坐他不坐，一个劲只听他吼：“你说你说，你老实交待！”

伯伯说：“我没有，我没有反呀，我只是提意见呀……”

“呵？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错误，不认罪，不老实！你不反，中央怎不说别人反，单说你反？”

伯伯在这个侄儿面前有口难辩，委屈得像个孩子，忍止不住迸出一行泪来。

“你还哭？你哭也不行，你得给我说清楚！”

启超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王震部队从湖南带去延安的。建国后，入空军学院。前年因伯伯出了问题，由空军转业到了武汉一个肉食品工厂工作。

有一年，启超当战士时借了人家一块表给丢了，来找伯伯要钱赔表，伯伯也曾这样火爆地对待他：“你说，你一个兵带表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思想！我看你是撒谎，想要钱，你的钱是怎么花掉的，你老实说！”

毛头小伙子被惹火了，跳起来和伯伯对着干：“你不帮我赔钱算了，为什么要诬我撒谎骗钱？我不要你的钱啦！”

伯伯气极了，要动手打他，他边跑边骂：“你当你的国防部长，我当我的小兵，我再不来找你了！”

果然，他不再回中南海的家。屈指算来，如今他与伯伯在吴家花园相见，已是分别好几年

之后的重逢，竟然无一字寒暄抚慰，而是这样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

我过后听说弟弟为此伤害了伯伯，气得咬牙。伯伯却笑容满面说：‘我很高兴，这个侄子是个好党员，一条硬汉子！一个党员怎么能不相信党的文件，怎么能对我不理呢？虽说他不进我的门，不吃我的饭，我却觉得他离我近了。过去我就听人说，这个侄子最像我，可我真没看出来……’

就在这不久，伯伯交给了我一份他抄写的材料，还有几个笔记本，郑重地说：“给你们吧，现在保存着，将来慢慢看。不是我要留名，也不是要你们为我辩解，但我总不想叫我的亲人长期误解我，就算我给你们作的一点解释吧……”

彭启超后来不等看到这份材料，便醒悟过来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他吊起，打得他死去活来，还用香火烧烂了他的下身，逼他交出伯伯藏在他那里的“反革命兵变计划”、“武器”、“钱财”……说：“你是彭德怀的大侄儿，又是学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反革命的一切行动计划你当然是第一个合谋人与知情者呀！”启超在自认为他再活不出来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老人家，我对不起他，冤枉了他……我现在才知道，不是所有被指为罪

犯的人都真的有罪……你，替我多去看望他老人家，为我代尽我未能尽到的孝心吧……”（彭启超后来还是活出来了。只是当伯父得到平反昭雪，他又回到北京来时，姊妹兄弟们都一时未能认出他，因他已是弓腰驼背，比他实际年龄老多了。——整理者注）

再说伯伯把材料交给我后不几天，他就后悔了：“你还是把它拿回来吧，我总觉得不妥，你们脚下的路还长，不要让它绊了你们的腿。”我说：“放在我那里不是一样么？”以后他又说过多次，我干脆气他：“你是不放心我吧？”他只好说：“好好，我再不问了，可你千万小心呀！”

伯伯后来去西南三线工作，我去看望他时，全国批《海瑞罢官》正闹得乌天黑地，连小学生也知道海瑞就是彭德怀，批的就是他。伯伯没说几句话就提到那些材料：“我没什么怕的了，担心的是你拿去的那些东西。”为免了他的牵挂，我痛快地说：“早已烧了！”他长吁一口气：“这就好，这就好！”

其实，我带回的这些材料保存得完好好的。我谁也没说，连对我爱人也一字未漏，不是我不信任他，而是不想多一个人为它担惊受怕。（梅魁说这话时，她爱人张春一在一旁插话说：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材料，还真冒出一头汗，没想到我这个细小老伴，长了



1964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宅前
（右为弟媳龙国英）

一个牯牛大的胆子！——整理者注）在发现伯伯忧虑这些材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时，我就越觉得它的宝贵。不久，我就把它带到了老家湘潭乌石乡下。当然，我给我母亲说了。当晚我们母女将一个腌菜坛子洗净，烤干，坛底垫上石灰，把材料包了几层油纸放好后，再在坛盖四周浇上腊，深深地埋在厨房地下。这办法是我母亲想出来的。她说，二十多年前父亲从延安偷偷带回了一大包毛主席的书，为逃避国民党的搜查，就是用这办法保存的。（抗日战争初期，梅魁的父亲彭金华和叔父彭荣华曾去延安看望过他们的大哥彭德怀，旋即回到故乡。1940年，旧历9月初兄弟二人同时遭国民党杀害。——整理者注）

为了能经常得知这些材料的保存情况，并常常检查有无水浸虫蛀，我把孩子送了一个到老母身边，为的是时常回去而不叫别人生疑。

每次回去，我和母亲都要在夜深人静时把坛子起出，重新包装掩埋过。

有一回，我接到一封家信，愁得我寝食不安，像得了大病似的。爱人见我半夜也掏出信来反复细读，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便抢过信看，看后他更加不解地说：“这上明明写着，一切都很好，孩子没病没疼，妈妈心口痛病也不发了，乡里四邻也对他们没别样看法，有的人反倒多亲热照顾的，你愁的什么呀？”他不知道，我愁的是正是信的末尾有一句话，言及同屋里我的一个堂弟最近和他老婆闹毛了，打得冤冤不解，正闹离婚。我前次回去，妈妈曾告诉过我，她把埋材料的事告诉过我的那位堂弟。原因是她怕自己心口疼病让她有一天一口气上不来，更知北京如今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凶，我曾被人揪去批斗拷问过好几回了，妈妈怕我万一也有个好歹，我母女俩都存活不住，那坛子材料岂不要永远烂在地下了。为此，她想来想去，才决定把这事告知第三个人，自然那位堂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同样是写材料人的亲侄，住在一个屋，人也忠厚。听妈妈说了原因，我也认为她考虑周全，多托付一个人保险些。为试探这堂弟的心思，我曾问过他：“你看，是不是把它起出毁了？”他断然回答：“你怕了，起

出来给我，我另埋，杀我十回头我也认了！”现在叫我忧心的，不是这堂弟会变卦，而是闹不清他是否对妻子说过这事。我可是见过的，有的两口子一闹崩了，打红了眼，什么事都会不管不顾了！

我决定连夜往家里赶。正是烽火遍地的全国性武斗，火车时走时停，离湘潭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又停了下来，前面枪炮声不断，看来一时半时不会停息，我等不及了，冒险自个赶路。通过好些个战地哨卡，受到各种盘查。幸好我有北京的工作证，还有火车票证明我不属于交战者任何一方。我的焦灼而疲惫不堪的神态使盘查者相信：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我急着赶回去是为了救活孩子。一个造反派甚至同情地对我说：“大姐，你太冒险了！”

深夜到家，母亲连连责怪我不要命了！我只记得问：“东西还在么？”当夜，我和母亲把那个坛子起出，埋到屋后山坡上我父亲和叔父的坟旁。

后来伯伯病危，专案组不得不允许去医院探视，我得到机会告诉了伯伯：“东西还在！……”伯伯睁大眼看了我好久，露出很欣慰的神色。

1978年黄克诚同志恢复工作后，夏季的一天，我到301医院看望黄伯伯，呈交了这一包保存完好的材料。

不久，我收到一封珍贵的信，上写着：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这批手稿，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彭德怀八万言书》的文献。

（丁隆炎：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彭德怀在四川》、《彭总的最后岁月》、《悠悠故人情》，电影《布衣元帅》等）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当年《真理报》 记录的八一枪声

● 王阿寿

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好革命局面遭受极大的破坏，中国革命步入险境。一直关注中国革命的苏联《真理报》对蒋介石的背叛进行了谴责，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客观报道。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国共分裂，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并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起义军打响了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八一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世界。帝国主义报刊和通讯社群起攻击，进行大量的歪曲报道。此时此刻，《真理报》高举正义的旗帜，十分及时地向

全世界报道了南昌八一起义的真相，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起义的伟大壮举。

8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领导人H·布哈林在联共（布）党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题目是《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他在报告中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成功地团结了近两万人的部队，他们占领了南昌，他们的计划是离开被敌对势力包围的南昌，开往广东……他们是真正革命的战斗拳头。”

9月3日至15日，《真理报》连续发表了A·洛佐夫斯基题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长篇报告，其中《叶挺和贺龙的起义》一节，饱含激情地介绍了南昌八一起义：“自从武汉（指汪精卫）投向反革命一边之后，整个中国都落

入了反革命之手，一时间从北到南，从上海、南京到广州，以及武汉，到处是一片‘打倒共产党！’‘打倒工农运动！’的叫喊声。可是，不论整个中国被涂上了反革命的颜色也好，或是共产党员和其他工农运动领导人遭到屠杀也好，我们却看到南昌爆发了革命。南昌位于长期以来一直是武汉所谓著名革命将领之一的朱培德将军统治的省份……就在这样一个独立王国里发生了叶挺师长领导的军队起义。”“这位共产党将军和另一位将军——贺龙拥有一万六千——一万八千名士兵，而且起义军队的目的不是留驻南昌，而是向广州进发。”“起义者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他们的力量就在于这支军队向广东省前进途中，一路上建立起农民武装队伍和发动了农民起义。”他

指出：“叶挺部队是在内战形势极为紧张、和广大工农群众寄予同情的条件下举行起义的。这次起义意义重大，远远超过近年来中国经常发生的一般军事将领起义事件。这批部队在向广州进发途中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汹涌澎湃、滚滚向南的怒涛。”作者对南昌起义部队的性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次新的起义已经是工农性质的起义，起义后产生的军队，除兵员补充与我国红军不同外，在目标、任务及其实现广大群众的社会经济要求而采取的方法上均接近于俄国的红军”。作者已预言到南昌起义产生了新型的人民军队。

南昌八一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这是十分艰难的征程。于是，《真理报》对此作了追踪报道。

9月27日，《真理报》发表了N·马马耶夫写的《南下大进军》一文，说，“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寻找根据地发展革命运动……叶挺、贺龙的部队成为这场起义中武装力量的核心。他们的部队中中共党员很多，这就是8月1日夜间在南昌起义十分顺利的原因。”作者报道了南昌起义部队的行踪：“在人烟稀少、山峦重叠的江西东部进行了两个月行军之后，叶挺、贺龙指挥的革命军在农民武装起义的积极支援下，占领了粤东的两个最大据点潮州和汕头。积聚革命力量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占领了一些地区，这就使革命军能

够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这篇报道由于时效原因，还没有记述起义部队到达潮汕以后的事，但文章有一段关于改造这支部队的言论，却是十分有意义的。他说：“叶挺、贺龙的军队是旧式军队，它由流氓无产者组成。因此，要使军队中工人成分占优势，由工人和农民取代旧的指挥人员，向部队输送工农群众，从而将一切雇佣军队旧的棍棒惩戒制度改为新的革命纪律，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如果领导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不愿自己受到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威胁，那就必须完成改造军队的任务。”

1927年冬，大概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的消息已传到了莫斯科。

11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П·沙茨金的《中国革命目前的首要问题》的时事述评。指出：“中国革命，如同所有其他的革命一样，并不是始终都是直线上升的。它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既有胜利，也有失败。”他认为：“叶挺和贺龙军队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军队确实处境困难，而且还在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犯了一系列重大的错误，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提出的温和口号不可能成为发动农民起义和采取平民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旗帜。他们依然对国民党左派和‘左派’将领抱有幻想，指望通过上层交易，联合张发奎打倒李济深，想靠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角逐的办法，从实际上取代群众运

动。”“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和军阀一联合起来进行镇压，便很快地击溃了人数不多的革命军队。”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之后，到哪儿去了？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关注着他们的命运。

1929年12月26日，《真理报》发表特派记者A·伊文的《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文章专写了《贺龙》一节，详细介绍了南昌起义部队的行踪：“1927年9月末至10月初（贺、叶）挺进广东，遭到失败，这已是众所周知之事。从南昌出发时，军队人数两万有余，抵达广东时只剩下了一半。经过潮、梅（潮州、梅县）地区多次战斗，实际上仅存千余人（六百条枪），后转至海、陆丰地区活动，成为举世闻名的海陆丰共和国的主要支柱之一……不久，远征广东的参加者之一，第二十五师师长朱德（注：朱德实任第九军副军长）因在河坝地区作战受挫，转入福建。朱德再次进入潮梅地区，收集旧部，组织了一支新队伍。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最大的一支游击队伍——著名的红四军的基础。”文章还介绍贺龙回到家乡，在湘西鄂南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勇事迹。“在中国另一地区福建、广东，一场更为激烈的战争正在展开。我们指的是由朱德（挺进广东的参加者）率领的红四军进行的非凡的斗争。”

（责任编辑 刘文）

张国焘奉命阻止南昌起义

● 彭江流

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记载：“不知道是初几（1927年7月12日——引者）老鲍（罗廷）提议独秀和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第三国际）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常委，自此独秀不视事。”五个常委张国焘、李维汉是中共“五大”时当选的，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是新增加的。由他们担负了这个非常时期的重任。

汪精卫反共后，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廷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张国焘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张沉痛地说：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该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张的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转移到武昌办公。

7月15日，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嘯楼巷内的一间房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四名常委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出席，会议根据李立三的建议，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四人又在会上作了分工，由李立三火速赶往庐山，向正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和鲍罗廷报告起义事宜。会后，蔡和森病了，李立三去了南昌。实际主持工作的只有张国焘、周恩来两人。他们两人以中常委的名义，决定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叶挺、周逸群等为委员。

7月23日，罗明那滋来到汉口，与张国焘、瞿秋白晤谈。罗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罗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应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们两人如

能反对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任那些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工人在中共中央占多数。张国焘认为他太轻视知识分子，对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央。张顶撞了这位共产国际钦差，谈话陷于僵局。

接着，张国焘和周恩来与罗明那滋晤谈。张向他俩报告从九江来的密报，周恩来认为张和他（周）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朱德的教导团等。周还谈了中央指示暴动的方针，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提出急需苏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以及一笔大数目的款项和物资的支援。罗明那滋（那时是29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瞿秋白对这次会晤也颇感失望。瞿对张国焘说：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

罗明那滋又与瞿秋白单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似乎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将张的意向告诉他，并劝告他不要与张国焘闹翻。第二天会晤，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共中央。张国焘则主张先解决目前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的问题。至于反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张的主张，莫可如何，不再作声了。

中央常委会于26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张国焘、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究军事问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然后渐次返回

广东。加仑认为这在军事上极为有利。他将陪同张发奎一起回广东。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阻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他讲了共产国际的回电内容：倘若这次暴动无成功之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去工作。罗明那滋认为：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张国焘，并问是否可以派张去。

张国焘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罗明那滋着急地说：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即使找到王一飞，并要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此时，瞿秋白、李维汉都向张说：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张国焘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他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而且不肯暗中有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

为弄清去的任务，张国焘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希望。罗明那滋有点丧气地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语锋一转，板起面孔说：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

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有将第四军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去工作。会议当即决定一切由张国焘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张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张才答应当晚赶赴前线。

张于7月26日晚匆促搭上长江轮，离开了武汉。为了等候火车，张国焘在九江停留两天，直到29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恽代英表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你张国焘来动摇人心，我们就打倒你。恽的愤怒使张为之变色。

30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张详细报告了26日中央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张说话的要点是：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周恩来首先愤怒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像骑在虎背上，抱有无义无反顾的气概，一个个怒火中烧。张国焘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的辞职表示外，会议旋即讨论一些紧急事项。

张国焘在与个别同志谈话中了解到：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的图谋已无法保持秘密，知道这秘密的人已经很多，超过一百人。认为联络张发奎已不可能，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那有不反脸对付我们的道理。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张国焘只好宣布暴动计划不能改变，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原有的决定。叶挺也说：现在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了。南昌暴动原定在31日晨举行，由于张的要求而改期，重新确定在8月1日晨举

行，这一天终于发生了中共斗争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张本应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因交通阻塞，无法成行，只能随军前进。张虽然一再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但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他，认为张对张发奎存有幻想。起义军南下潮汕，张国焘一路跟着。最后，他怏怏不快地去了香港。

不久，罗明那滋被调回莫斯科，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鉴于中共党内危机严重，因而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罗章龙五人去莫斯科出席“六大”。在“六大”预备会上，布哈林指定张国焘发言，张对“假传圣旨”阻止南昌暴动一事耿耿于怀，直接明白地向布哈林提出：南昌暴动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后来，因南昌暴动事实上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杀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了。我要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没有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在场的瞿秋白同志，为什么在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布哈林说：共产国际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确有发出。但他没有进而批评这个举动是否正确，和为什么发出这份阻止的电报。他只宣称南昌暴动是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基本是对的。大会闭幕后，张国焘又被选为七人的中央政治局，依次为：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瞿秋白、张国焘留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还担任过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候补委员。

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回忆南昌起义后 受挫经过

● 黄霖

南昌起义的当天，为了摆脱宁汉敌人的联合反扑，前委决定立即南下夺取广东东江，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当即规定了行军路线：经抚州、广昌、瑞金、寻邬，直取梅县。

我们连是贺龙的警卫连，第二天上午，我们召开了支部会，支书是南觉昆。当时，党还是秘密的，开会的地点是在连部附近抚河里的船上。党员只有我和南觉昆、二排长吴溉之，我们决定立刻教育全连官兵从思想上、政治上建立拥护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连的领导要在各方面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和战士心连心，到同甘共苦。起义军于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贺总指挥于五日下午最后出发，我连跟随贺老总行动。

在南下途中，起义军第十师到进贤后叛变逃跑了。蒋介石派来“特使”送委任状给贺老总，妄想进行收买，贺老总当即命令起义的第八军军部把“特使”枪决了。

在炎热季节长途行军，一路上中暑死亡者日益增多，我连在行军途中，一个大个子战士，倒下去就死了！战士们背的是驳壳枪，还要背一百发子弹，此外，还要背被服装具和粮食，所以很容易中暑。步枪连的战士就背得更重了，更苦了。再加上反动派的宣传，减员问题就更严重。

从临川到广昌北面约二十多里的甘竹（墟名），沿途都看不见什么人。我军到达黄宜城时，留下来的只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这样，我军连给养都供不上了，同时医药越来越少，病员日益增多，沿途病死者随处可见。

在临川、广昌休整时，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郭沫若等都在军官会议上讲了话，亲自做思想工作。这次休整以后，改为夜行军。每个班买了盏马灯。还给官兵每人发了两个银元，作为零用。

为了维护军民关系，总指挥部曾三令五申，严禁鸣枪抓夫，但仍有不少违抗者。有一次，到抚州的途中，发现前后都有人随便鸣枪，贺老总命令我派人去抓，我抓住了一个鸣枪抓夫的战士，为了严肃军纪，贺老总命令参谋写了一张布告，宣布其罪状，并要我连押到交通要道桥头旁边执行枪决。执行后，我们用几个小石头把布告压在被处决的尸体上。

部队到达三河坝南面的隍隍镇时，发生一起抢劫粮店的事件。贺老总命令我连立刻去抓，当场抓到两个抢米的战士：一个是二十军的，一个是十一军的。贺老总命令在场头场尾各枪决一个。

壬田之战是我军南征途中的第一个大战斗。在贺龙的指挥下浴血奋战的我第二十军第三团团长沙场壮烈牺牲，第四团团长沙文选重

伤，到上杭后光荣牺牲；另伤亡连排长十余人，士兵百余人。第九军朱德的参谋长冉国平，随朱老总到前线，也壮烈牺牲。

8月30日，我军胜利地攻占了会昌城。据打扫战场的统计，毙伤了很多敌人，俘敌官兵九百余，缴枪一千多支。我方伤亡也不少，十一军伤亡最多，光伤员就有四百余人。二十军第三师军需主任蒋作舟，师的经理处处长郭德昭，都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二十军第三师参谋处长袁仲贤负伤，陈赓也在此战役中负重伤。

9月12日到上杭后，休息约三天，然后乘船向广东进发。这里是多险滩又多“之”字弯。我们船到一个急转直下的“之”字弯前碰到一个暗礁，船底碰了个大洞，战士不顾一切跳到了水中。我不会水，一个战士把我救上了岸。

上岸点名，六位战士不见了，对这一不幸事件，我心里很难受。

贺老总的船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根船篙站在船头，看见我们赤身裸体正在晒衣裤，便命令我迅速想办法赶到峰市。

我遵照命令，一面搞饭吃，一面找船。终于找到一只载货的上水船要他返航。沿途我们就看见好几只运载起义军的船被打烂了。我们还一只破船上拣了好些装满步枪子弹的子弹袋，当天黄昏前，平安到达峰市。贺老总见我们拣了好些子弹回来，他十分高兴。

9月19日，我连又乘船到三河坝。一上岸就碰见朱德军长，他命令我迅速占领三河坝侧面的山头。晚上，我担心贺老总急待我回去，提出要走。朱老总要继续留我在山上防卫。他说，他马上会通知贺老总。次日拂晓，朱老总才让我回到贺老总那里去。我下山时，朱老总的特务营才去山上接防。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敌军兵力集中于丰顺县属的汤坑一带，人数约一万四五千。地势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我军此时主力还在揭阳一带，担任攻击汤坑的部队，总共不到六千人。27日，我主力即向汤坑攻击前进。总指挥所设在潭岭山山上，刘伯承、叶挺、彭湃都和贺老总在一起。



黄霖

9月28日拂晓，贺老总就命令司号长吹冲锋号。这时满山遍野的号声响彻云霄。

经过28、29两天两夜的鏖战，部队伤亡很大，在前线的前委们商议决定：将部队迅速转移到潮州与第三师及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汇合。并要贺老总立刻到汕头向周恩来汇报请示。汤坑战役三团团长负伤，四团团长光荣阵亡，代理营长陈震华也光荣阵亡。贺、叶两军共计伤亡在三千人以上，剩下的指战员只有两千多人了。

贺老总一到汕头，周恩来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听取贺老总汇报。前委根据前线失利情况，又根据张太雷所传达的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要丢掉国民党革委会的旗帜，要打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旗帜。还根据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十艘军舰正炮击汕头的情况，前委立即决定：放弃汕头，机关、部队立刻向海陆丰转移。

我们连又随贺老总乘上汽船，向炮台转移。

10月3日午饭后，在流沙的一座小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我连守候在会场外，一步未离。我们的任务，一是保卫会场的安全，二是等会议结束后护卫贺老总到宿营地云落。流沙会议决定：把武装队伍编成两个师：一、汤

坑、潮汕撤下来的武装合编成一个师，师长由刘伯承担任；二、三河坝方面的队伍编成一个师，师长由朱德担任。贺龙、叶挺立刻离开部队，到香港、上海去，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务。至于非武装人员，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分别由农会会员担任向导，送出海口，再转香港、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前委会才散会。会后贺老总就带着我们警卫部队离开流沙，回云落。他走在前面，营长和我紧紧跟在他后面。到距多年山约一里多路的地方，敌人在山上突然向我连射击，贺老总就带着马弁从右侧沟里向后方转移，我立刻组织火力还击敌人。

天黑下来了，营长率我连一、三排转移。在转移中，被敌人冲散，我和刘营长也失掉联系，这时，我身边只有六人。到第五日晨，我找到叶挺军长，他正在吃红米稀饭，我问他贺总指挥的去向。他说，不知道。我又问他今后怎么办？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当晚，我只好随叶部宿营甲子港。10月7日晚，我又随叶部到了博美镇。我打听到起义军还在陆丰城，我连夜赶去。我估计贺总指挥会带着马弁翻山越岭赶到陆丰。

我只见到贺锦斋师长，他听了我的汇报，他也不知道贺总指挥的下落，又听说叶军长已去香港，感到很失望。于是他说，夜已深了，你自己去找个地方休息吧！

我离开贺师长的住房，就去找三团代理团长罗统一。罗是贺龙的老部下，是最先参加共产党的。

我和罗统一是在南昌“八一”起义前夕认识的，我去找他时，他已经睡觉。听说我找他，他立即起床和我谈到天亮。我把我见贺锦斋的情况向他讲了一遍后，他说：敌人现在加强了谣言攻势，说贺老总、叶军长被俘了，要求贺、秦两师无条件投降。同时，一、二两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包括方维夏、陈恭两位政治部主任，和派到一、二两师的党员已全部跑光了。部队又和地方党联系不上，最严重的是失掉了前委和贺总指挥的领导，因此，贺锦斋不知所措。

6日晚，敌军派来代表，要求贺、秦两师长派出代表谈判。

7日，贺锦斋推派秦学远师长为谈判代表。8日，秦师长派人回陆丰报告，说敌人的条件是：只要放下武器，把士兵编到他们的队伍里去，就保证所有军官、军佐的安全，并给资遣散回家。秦师长本人却不知去向。贺锦斋仍在犹豫，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罗统一认为贺锦斋师长很难拿出办法来，恐怕就在一、两天内，我们就会被敌人解决。

倒霉时刻果然来了，完全和罗统一的估计一样。10月9日，我到陆丰城内大街小巷去转，想去见特务营副营长、二连连长（他俩是党员），都找不到了。

10月10日中午，罗统一告诉我，今天下午，敌人很可能就要进城来，他要我到马路上去，不要在团部呆着。下午三、四点钟，我在街上看见贺锦斋带着约三、四十名手枪队，正急匆匆地向汕尾方向快步转移。他到汕尾后，把他带去的人、枪交给敌人，他自己搭船到香港转上海。这就是贺锦斋以后转移到洪湖去创造革命根据地的转折点。其后约半个小时，敌十三师（师长陈济棠）约两营人冲进陆丰城，并向广场冲去。原来二十军的部队集合在广场，所有枪支也都架在广场上。就这样，二十军全部被敌人解决：士兵全部被敌人改编；军官、军佐各为一个俘虏队。我事先和罗统一商量好，我作为三团团部的文书，编在罗统一的队里。从陆丰城到汕头遣散时，我都和罗统一以及三团干部一起。

汤坑战役失利后，朱德把起义军包括第三师的一部和沿途收容的一些零散人员，共约二千余人，巩固起来，从饶平转经大埔、焦岭，进到福建峰市、武平，然后转移到江西境内。到1928年阴历年关，朱德、陈毅、王尔琢组织和领导湖南宜章县暴动；其后，朱德又领导了湘南各县暴动，又战胜过许多困难，1928年4月底胜利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会师。

（责任编辑 仲文）



在朱老总面前 我们是 一群孩子

● 喻权域

1957年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邵挺军推门进来，要我夜里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去参加一个会。

到了那里才知道，由威廉·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表团即将访华，并将到成都访问。他们之所以要到成都访问，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正在成都。去年，朱老总曾去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给他们留下很美好很深刻的印象。此次访华，捷方要求会见朱德元帅。我国外交部说：“朱委员长到四川去了，我们请他回北京来见你们。捷方西罗基总理说：朱德元帅是中国也是亚洲的大英雄，怎能劳动他？我们去成都见他吧，也看看他的家乡是个什么样。

主持会议的明朗同志（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外办主任）说：这是四川解放以来，不，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总理，一定要把接待工作做好。

明朗同志看了我几眼，字斟句酌地说：“你回去告诉邵挺军，这次外事活动的文字报道由新华社负责，你们新华社要派一名得力的党员记者来采访报道。”我听出了他的意思，嫌我太年轻，太嫩（我当时只有21岁半）。

我回去向邵挺军汇报。他说：“由你去采访

吧。其他的党员记者都下乡了，在家的党员记者只有你一个。”我说：“我还在停职反省呀！”老邵爽快地说：“你的停职反省期今天就算结束了。”那时，我一直在检讨我上年采写的一篇反冒进文章的“错误”。

省外办再次开会那天晚上，明朗同志看到又是我出席，便打趣道：“哈，你就是新华社的得力记者啊？”我笑着回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嘛！”

这次会议有外交部派来“打前站”的一位副部长参加。他说，昨天去向朱德委员长作了汇报，请朱老总出面接待。朱老总说，他是请假来四川休息的，从事这样的国务活动，他得向中央请示。朱老总的纪律性真强，他当即给周总理挂了电话。周总理：“贵宾们专程去成都看望您，您当然应该热情接待。如果他们要商谈具体问题，那是政府之间的事，您请他们回北京找我好了。”这样，朱老总才欣然同意出面接待。

明朗同志说，朱老总交代，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参观访问时，我们要如实介绍，不许弄虚作假糊弄外国同志。朱老总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一个村子，那里每户农民都住一幢小洋楼，厅里还有钢琴。朱老总疑心是故意摆给

他看的，要求多看几家。主人陪他一连看了十几家，家家如此。朱老总请女主人弹一曲来听听，女主人当场演奏，果然是她家自备自弹的钢琴。朱老总在参观途中经常临时叫停车，进工人农民家中参观，家家差不多。朱老总说，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别怕在外国同志面前露穷相。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艰苦奋斗几十年，争取富裕起来。

3月14日上午，我早早乘车去成都凤凰山机场。那年头的凤凰山机场没什么建筑物，临时搭了个彩棚，放些桌椅、茶杯，就算是候机室。省里的党政军首长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捷方代表团里也有民主党派）很快到齐了。

过了一会，远处来了辆小车，到了欢迎人群前便自动停下。车门开处，下来的正是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大家先是一愣，接着就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朱老总慈祥地向人群挥手致意，一步一步地向彩棚这边走来，与省里的要员们握手后，跨进棚里，很有礼貌地与小服务员们逐一握手。我也大着胆子走上前，把手伸向朱德元帅。

朱老总用两只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右手，慈眉善目地看着我，微微鞠躬。他那目光是诚恳的、亲切的、同志对同志的，根本就没有尊卑、上下的区别。40年来，我每一想起那情景就要自责：为什么我当时不伸出两只手呢？朱老总是用两只手来握的啊！

此时，胸前挂满勋章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像小青年似的遛过来，拉着朱老总衣襟，向朱老总脸上左看右瞧。他故意惊诧地说：“总司令，您好像瘦了些，比我上次见到您时瘦了些。”

朱老总只是嘿嘿地笑，没有说话。贺炳炎回过头大声嚷道：“康大姐！你没有照顾好我们的总司令。总司令瘦了，你要负责任，你要向大家作检讨！”

康克清正在与人闲谈，听到贺司令叫嚷，她回过头来，以大嫂子对调皮的小叔子说话的那种语气笑骂道：“就你个贺炳炎的闲话多。看我

回头告诉××（指贺炳炎的夫人，可惜我没听清），让她管管你。”

全场哄然大笑。一瞬间，在场的“要员”都变成了“小孩子”。大家围着朱老总看，有的说“果然瘦了些”，有的说“没有瘦”。朱老总嘿嘿地笑，不表态。平时不苟言笑的邓锡侯副省长笑道：“贺司令员，你冤枉我们的康大姐了。朱总司令红光满面，哪来的瘦？”

康克清得意地拍手道：“贺司令员，贺上将，你输了！”贺炳炎说：“你们妇联好威风啊，哪个敢惹你们妇联的人？你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他们当然要偏向你。”众人又是大笑。

朱老总慈祥地问：“炳炎同志，听说你经常乘车到大山里去打猎，是吧？”康大姐打趣道：“你当司令员，不坐司令部，往深山老林里钻什么？”贺炳炎做了个苦笑的样子：“司令部里闷得慌。长久不打枪，还算兵吗？成都坝子人口这么稠密，打靶要惊动老百姓，我只好钻进深山老林放几枪，练练手艺。”康大姐笑道：“你打猎可要小心点啊，你若把剩下的这支手臂摔断了，那就当不成司令员，也当不成兵了。”

众人笑得更欢。

李大章省长笑着对大家说：“我就知道有两位独臂将军。贺炳炎司令员在战场上打断了右臂，中将余秋里同志在战场上打断了左臂。他们俩如果并排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看不出他们各自只有一只手。”

贺炳炎继续与康克清开玩笑，斗嘴。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换了话题。

廖井丹说：“总司令，你是四川人，你说说，我们四川文学界是怎么回事？作家协会两个主席，一个沙汀，个头那么高，专写短篇小说，不写长篇；一个李劫人，个子这么矮，专写长篇小说，不写短篇。”

朱老总望了望高高的沙汀，看了看矮矮的李劫人，抿嘴而笑。

沙汀幽默地说：“写长篇，我写不过李劫老，写不过巴金，只好写点短篇小说充数。”

李劫人性格开朗，一向活跃。他是成都市副市长，市里开会，有他必然有笑声。在朱老总面前，他更欢畅，更来劲了。

“总司令，你把我调出四川吧，我最不喜欢和沙汀在一起共事了。他写小说的水平比我高，他的个子又比我高出两个头。我和他谈话，要仰面朝天，好费劲哟！谈上半个钟点，我的颈项发酸，腰也发痛。”

朱老总说：“你多来和我摆摆龙门阵嘛！我和你差不多高，能平等说话，两不费劲。”

李劫人上前与朱老总比量一下，连声说：“不行不行，你还是比我高出一个头。”

李劫人眉飞色舞，连比带划地说：“我只喜欢和沈钧儒沈老在一起。他比我矮一个头，我与他谈话居高临下，那简直是一种享受……”

天上响起马达轰鸣之声，贵宾的专机到了。一群“老孩子”收敛笑容，整理衣冠。朱老总的秘书走过来，掏出一把小梳子为朱老总梳头，用手巾掸掉朱老总肩上的头皮屑和皮鞋上的灰尘，整理好衣服。康克清上下看了一遍，点头认可。大家依次向停机坪走去，一切按外交礼仪行事。

朱德委员长陪西罗基总理与欢迎人群见面，挥手致意。我看数千群众虽然喊着欢迎外宾的口号，但目光全对着朱老总。我悄悄问外交部一位官员：“这会不会给外宾留下个不礼貌的印象？”他摊开手说：“有什么办法呢？”

两天后，贵宾离开成都去北京，我方原班人马到凤凰山机场送行。朱老总陪西罗基乘车到机场，握手如仪。亲切告别。

专机起飞后，李井泉、李大章请朱老总去青羊宫看花会。朱老总请省里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一起去。朱老总交待廖井丹：花会要照常开放，不能阻挡其他游客；大家分成几组行动，免得惊扰群众。

一行人来到青羊宫，约好碰头时间、地点，就分散去看花会。秘书给朱老总戴上一个大口罩，游人还是认出来了，大家不看花会看朱老总。警卫人员费了很大劲劝说，才使游人安静下来，不拥挤，大家分散到各场馆等候朱老总前去。

参观结束，朱老总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来到青羊宫管理处那个院子。他们进里面那个不大的会议室休息。我们几位记者，以及秘书们、警

卫们、驾驶员们聚在院子里等候。大家七嘴八舌，讲的是一个心愿：想与朱老总合照一张相。

不知怎么的，院子里的人一致推举我进去请示。我说：“我可不敢去。我们想与朱老总合影，只有请李政委（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出面。要向李政委汇报，又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他那秘书凶得很，好训人，肯定会碰钉子。”

在场的人嘀咕道：朱老总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能到四川来几次？错过了今天，遗憾终生啦！

我十足孩子气的想出了个主意，请大家动手，把周围办公室的藤椅搬出来，在院里摆成月牙形。请《四川日报》摄影记者李煊架好照像机，布置出个合影场面。我说：“待会儿朱老总出来，如果他往椅子上一坐，我们就大大方方地站到藤椅后面去，参加合影，什么话也别说。”大家一致同意。

过了一阵，朱老总一行从休息室里出来了。一看院子里摆的藤椅，架的照相机，朱老总笑嘻嘻地走过去，在藤椅上坐下。李井泉、李大章与各民主党派领导同志互相谦让一阵，依次坐了下去。

我们大胆地走到藤椅后面去站好。李煊按动快门，照了两张照片。

照完，朱老总和各位领导互相告别，分头登车而去。我们留在院子里的这些人齐声欢呼：“成功了！”

李煊和我，欢喜得像孩子似的。

（责任编辑 仲文）

作者更正

我写的《胡仁奎传奇》，刊于贵刊今年第5期。第56页“国家林业总局副局长苟昌武致悼词”，应为“农林部部长罗玉川致悼词”。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何奇

李立三、陈毅

四十年围棋情

● 李思慎

1961年7月，李立三把夫人李莎及二女儿雅兰送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后，随即带着大女儿李英娜来到北戴河西山中直疗养区，中央分派给他固定使用的别墅。面积虽小，李立三每年夏天都带着全家到这里住上一个多月。这次他到北戴河，还要参加由薄一波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为了参加这项工作，李立三在半年前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深入到工矿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起草小组集中了孙冶方、马洪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8月底由邓小平专程到北戴河主持定稿。

8月的一天上午，我到中央办公厅在北戴河的办公所在地送修改稿去了。返回时，看见陈毅正在与李立三下围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与陈毅下棋，有幸在一旁观战。只见他俩谈笑风生，有时也会为一粒棋子的定位，争得不可开交。到吃午饭时，李立三挽留陈毅。陈老总推辞说，他那里已有准备，就不给李立三添麻烦了，并约李立三午休后到他那边继续战斗。下午三时，我随李立三去陈毅的住处，他俩又对弈了半天。晚饭后，我陪李立三在海滩散步，我问李立三：不是中央在庐山开会吗？怎么陈老总到北戴河来了？李立三解释说，他今

天从庐山坐专机来北戴河，是为了明天接待外宾，今天休息，所以一下飞机就到我这里来下棋。同时，饶有兴趣地讲了他与陈毅的下棋历史。

李立三说，他与陈毅是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认识的。1921年夏秋之间共同参加和领导了“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

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在国风募得大批捐款，还用了当时法国退还中国的一部分“庚子赔款”修建的。1921年秋大学建成后，不准已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专门从国内招收有钱有势人物的子弟来入学。李立三与赵世炎商量，发动一个群众运动，争回“里大”的入学权，使之成为在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学习园地。于是，他们以克鲁梭工厂的勤工俭学学生名义，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继之，由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带领120多人的先发队，于9月21日抢在国内学生抵达之前，占领了“里大”。惊恐的北京政府当即勾结法国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里大”，把学生的护照强行收走，并押解到芒特吕克炮台军营关押起来，准备押送回中国。

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李立三同赵世炎

商量，回国也是好事，可以在国内参加革命斗争。但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大批华工也需要有人留下来加以领导。两人商量的结果是，由赵世炎留下来。办法是让前来探视的其他留学人员顶替，使赵世炎得以混出兵营。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法国当局冠以“过激党”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一艘邮船底舱，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绒衣裤，过着犯人一般的生活，有法国军官和8名士兵随船押送。邮船驶过苏伊士河以后，才放松了对学生的控制；过了新加坡，才允许学生下船；过了西贡，法国军人才撤走了。

李立三在船上把大家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他们千方百计设法同沿途的华侨接触，宣传被迫害情况，接受侨胞的捐赠。他们还想法在船上开展文体活动。

还在兵营被关押期间，他们在院内捡来黑白两色的石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围棋盘，对弈攻杀，一下子改变了大家沉郁的气氛。他们把这副“土围棋”带到邮船上，一次川湘两方的同学赌下围棋，四川人说湖南人下得臭，湖南人说四川人下得也不香，最后由李立三与陈毅分别代表湘、川两方的主帅进行比赛。李立三的形势越走越被动，遭到围观者的哄笑，他生气了，把棋子和棋盘一齐抓了起来，跑到船边，扔进大海。气得众人都想揍他一顿，但陈毅并未因此和他大伤和气，反而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工余暇时，两人你来我往，相逢在一起，总得对弈起来。

就连1929年8月，在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刚选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陈毅由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任职的大哥陈孟熙和在上海兵工厂工作的堂兄陈修和接到英租界三马路新苏旅馆住下，李立三代表党中央到旅馆听取陈毅汇报工作时，就是以下围棋作掩护，一边下棋，一边谈工作。

陈毅在上海期间，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红四军内部存在的意

见分歧问题，以及作为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参与有关红四军问题的讨论并代中央起草对红四军党委的指示信——著名的中央对红四军的“九月指示”。就是这个“九月指示”，成为后来红四军古田会议指导思想的基础；就是这个“九月指示”，四军党组织才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继续担任党的前委书记。

在两人对弈当中，陈毅最讲究“落子生根，举子无悔”。他说：“同志哥也，这是棋品问题。”“棋品嘛，其实就是人品。没有人品，何得棋品呢？”李立三很是尊崇陈毅的棋道。

围棋使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的亲密无间的友情不断，李立三遇有不解之事，总是要向陈毅请教、求援。

（责任编辑 刘文）



李立三一家

一代遗传学宗师 李景均何故去国

——记 50 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
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一

● 叶笃庄

一、前 记

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生物学、农业”一栏内,共选录了从 1868 年到 1912 年间降生的 15 位这一界别的代表人物,研究遗传学的只列入二人,一为谈家桢,一为李景均。李景均在遗传学方面造诣极深、贡献颇大,享有世界声誉,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当之无愧的带头人之一。像这样一个学术界的权威人物,为何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就于 1950 年 3 月初伤心地离开他所钟爱的祖国,离开他立志为之献身的事业,挈妇携雏别离北京,出走国外呢?这要从 50 年代初在国内轰动整个学术界的生物学大倒退——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打压摩尔根遗传学谈起。

米丘林(1855—1935),是前苏联果树栽培育种家,一生育成了 300 多个果树新品种。在米丘林生前,并没有所谓“米丘林学说”。“米丘林学说”是在他死后,由李森科所

“创造”的,其内容大多是根据一些哲学概念演绎出来的,很少有实验事实的根据。及至 1948 年 7 月 31 日,苏联召开了将近千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会议持续到 8 月 7 日。在这次会议上,院长李森科作了长篇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事前给会议定了调子。他在报告中称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为“现代反动实验遗传学鼻祖”,给他们的学说扣上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三顶帽子。同时宣称“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科学的生物学的基础”,“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学方向”。

李森科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声称,“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和批准了我们的报告”,这就定下了他的报告的权威性。

由于斯大林的直接过问和对李森科的全面支持,会议通过了李森科的报告,并作出了决议,决议写道:“在生物学中已划出两条正面对立的路线,一条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米丘林路线,另一条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

路线”,这就否定了众所公认的科学统一性。李森科还兴高采烈地说,“这次会议”是“苏维埃生物学”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会议”,是“最后粉碎资产阶级形式遗传学的会议”,是“生物科学的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样,强行把农业科学和遗传学划为政治上和哲学上的两条对立的路线,就为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科学事务、从而否定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律性,建立了合法根据。

1949 年,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实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既然 1948 年在苏联的“苏维埃生物学”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么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念李森科的“米丘林学说”那本经,进行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改造。

1952 年 10 月至 1953 年 2 月,中央农业部在北京举办了由全国各地选派的农业科技人员一千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和杜伯罗维娜讲课,传授

“米丘林学说”的真经,同时“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伪科学观点在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中间遗留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可笑而可悲的是,1953年,年仅25岁的沃森(J. D. Watson)和37岁的克里克(F. Crick)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双螺旋分子结构(DNA),而我们还在学习李森科的否定基因存在的观点。“米丘林学说”这场风波在我国一直持续到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虽说从那时起,实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但由于不正确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方针在农业科学界和遗传学界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而是经历了多次反复和曲折,给我国农业科学和遗传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难怪1986年谈家桢教授颇有感慨地指出,“由于受李森科的影响,30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一些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无数学人抵挡不住横逆之来的时候,唯有二人能够顶住政治批判的压力,敢于公开地、明确地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拒不接受“米丘林学说”,那就是南谈(家桢)北李(景均)。李景均因此被迫去国,他的出走,引起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的严重关切,而使我国的一些遗传学家和农学家免遭苏联同行们那样的厄运——丢掉饭碗,放逐西伯利亚,投入监狱,甚至像瓦维洛夫那样举世闻名的大学者也病死狱中。因此,评述这段历史,就不能不谈李景均,即从一个人看一段历史,从微观到宏观,这就是我要写的上篇。在下篇我将写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以及应该从其中汲取哪些教训,即从这段历史看我国一些遗传学家和农学家的遭遇,从宏观到微观,其目的即在于“温故知新,以史



李景均

为鉴”。正当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的时候,李景均于1951年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之后,30年来一直活跃在遗传学领域内,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卓越贡献。一此一彼,两相对照,能不让我们反省和深思吗?

回首往事,我曾在这场风波中充当了一名不光彩的摇旗呐喊的小卒。当时我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编译委员会主任,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米丘林学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尽心尽力,日夜加班。除去主持翻译了《米丘林选集》、《生物科学现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逐字纪录》、《米丘林全集》等大部头的著作外,我还主编了《苏联农业科学丛书》数十种,此外还创办了一个翻译期刊——《苏联农业科学》,并担任主编达六年之久。令我啼笑皆非的是,70年代我曾在安徽白湖农场(安徽省第一劳改总队)附设的“试验站”劳改,竟然在那里的一本书

柜中也看到了一套《苏联农业科学》,就连劳改单位都订有这份期刊,其流毒之广可想而知。

1994年一个刊物的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曾说过这样的话:“自问平生,可以说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人民、朋友和亲人的事。”果真如此吗?及至最近我再读巴金老人的《真话集》和《随想录》之后,我的心灵震颤了。在那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的风波中,我如此卖命地提供宣传“米丘林学说”的炮弹,难道不应自愧、自悔、自责吗?解放之后,从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到交代“反革命罪行”,我写过无数次材料,可盈数尺。坦白地说,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如此;为了老婆孩子,更不得不如此。挖空心思,在自己头上泼狗屎,以便“蒙混过关”,求得“宽大”。唯独这次,虽然只有上述短短的六个字的自我批评,却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本应颐养天年,何必如此絮絮叨叨,自苦乃耳,岂非“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乎?!

二、李景均一生简介

李景均在建国之初,因为坚持“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学说”,而成为被批判的“反面教员”。那么李景均到底是何许人呢?

李景均 1912 年 10 月 27 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他的父亲李锐经营出口贸易,以桐油为主。李锐采用了一些现代经营管理方法,颇获成功,有“桐油大王”之称。

李景均从小在家庭中受到了良好教育,勤奋、忠诚、勇敢。由于天津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桥头堡,驻有大量日本侵略军,欺压人民,多次制造动乱。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亡国危机迫在眼前,学生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形势下培养了李景均的爱国思想。

李景均 13 岁时考入天津“新学书院”,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该校创立人和校长哈特博士(Dr. Hart)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所以他想把“新学书院”办成一座“剑桥”那样的学校。李景均的父亲也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所以他父子二人都在那里接受了“剑桥”式严格的基础教育。在高中时,李景均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1932 年,李景均 20 岁时,改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当时办得最好、最驰名,早期的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多出自这所教会学校。那时中学毕业生所追逐的是理工科,那么李景均为什么要读农科呢?正如他自己说的,“是深受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的影响”,那正是当时有志之士所探索的一条救国道路,不论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他主修农艺,辅修森林,并开始读了遗传学、作物育种学和田间试验设计及其统计分析等课

程。1936 年获得理科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燕京大学试验农场工作一年,农场设施是简陋的,还得自己起火做饭,李景均在那里不仅接触了农业生产实际,而且也接触了农村生活实际。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于日寇之手。李景均于 8 月间离开农场,逃往天津,由塘沽乘海轮去上海。然后由上海乘海轮去美国,进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在作物育种系导师洛夫(H. H. Love)教授的指导下,攻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他在康奈尔第一年选读一门“高等遗传学”课程,在参考书中有一本新出版的《遗传学和物种起源》,作者为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书中所论述的“群体遗传学”、特别是赖特(Sewall Wright)在这方面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以致此后一生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1940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利用暑假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读解析几何和概率论,1940—1941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统计学,所以取得了深厚的数学基础。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不久,在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于 1941 年 10 月携新婚妻子美籍华人 Clara A. Lem 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1942—1946 年,先后在广西农学院和迁至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 年应聘至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并任该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当时他 34 岁,是北京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这时,他已显露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出众的才华。

1950 年 3 月,在北京农业大学掀起的前苏联李森科“创造”的所谓“米丘林学说”的风波中,李景均愤然离去,先到香港,然后去美国,受聘于匹兹堡大学,在此后 30 年中,他一直在生物统计系任教。随着教学和工作的开展,李景均声誉鹊起。他担任过匹兹堡大学生物统

计系主任(1969—1975),美国人类遗传学会(ASHG)主席,华人在美国学术团体先后担任主席职务的,除李景均外,据我所知,只有赵元任担任过语言学会主席,吴健雄担任过物理学会主席。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国会议员。1962 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威不屈所志

解放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但实行的国策却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那时,经济、政治都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首要任务是“思想改造”,而且对于他们科学技术的本领也不完全信任,于是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指导一切,我国的知识分子则噤若寒蝉,只有唯命是从。那年头谁敢不听从苏联专家的话!不听苏联专家的话,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革命”,那还了得。解放后,按照苏联模式实行教育改革,建立了许多专业性的大专院校。于是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成北京农业大学。北农大的第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乐天宇担任。乐氏是我国最早传播与崇尚“米丘林学说”的人,早在 1941 年就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 3 期上发表了《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一文,这是在我国宣传“米丘林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第一篇重要文章。1946 年他在筹建北方大学农学院时,首先建立以研究“米丘林学说”为重点的“农业生物科学研究室”。1948 年,创办通俗刊

物《农讯》，作为宣传“米丘林学说”的阵地。1949年春他发起组织“米丘林学会”，把宣传“米丘林学说”向全国扩展，并组织 and 扩大队伍。

乐天宇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兼党总支书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虽说还有两位副主委（俞大维、汤佩松），但他们都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属于被改造之列，说不上话，也不敢多嘴。再者，乐天宇是1924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全国解放，进入北平大城市后，对那里“留用的”旧人员，难免“骄傲和以胜利者自居”（钱俊瑞语），他对不顺服他的“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完全抱着敌视的态度。当时生物学界老前辈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景钺先生曾书面要求参加“米丘林学会”，他不批准，甚至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李景均在学术问题上，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三校合并之前，1949年上半年，乐天宇曾到北大农学院讲演，介绍“米丘林学说”，并把旧的遗传学和育种骂了一通。会后，李景均在农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乐的讲演“不科学”与“错误”，自然就触怒了乐天宇。不久华大农学院月刊《农讯》载文批判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为荒谬。后来，李景均所著《数理遗传学》在送审过程中，有关单位将书稿送华大农学院生物科学教研室审核，农研室对此书发表了批评意见，有关单位又将批评意见函转李景均本人。这样，在三校合并之前，乐、李就短兵相接了。

并校后第一个学期，学校增开了“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为各系学生的必修课，“旧遗传学”（摩尔根遗传学贬称）列为选修课。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被扣上“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帽子压力之下，旧遗传学被迫停开；接着于1950年初，又决定停开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设计两门课，这三门课都是

由李景均主讲的，于是他没有课可教，被晾在那里了。李景均最初对“米丘林学说”并没有持批评态度，早在1949年6月7日，他就作过一次“李森科遗传学说的介绍”演讲，完全以科学家的态度，客观地介绍了“米丘林遗传学说”的基本观点。之后，他又翻译了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这是根据美国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的英译本再译的。他翻译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有人造谣说，“李景均根本不懂得米丘林学说”。这本书曾交北大出版社出版，乐天宇认为这是根据“反动分子”的英译本再译的，有意歪曲，予以阻挠。最后经胡乔木审阅后，才公开出售。

李景均的日子一天一天地不好过了，有人散布谣言说，“李景均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当时这是置人于死地的指责。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领事馆（那时还未撤走），“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显然要给李景均扣亲美反苏的政治帽子了。

在皈依“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热潮中，好心的畜牧兽医系副教授张鹤宇一天晚上来到李景均家中，善意地劝说他公开认错和批判摩尔根学说，倘不如此，后果严重。张说，孟德尔的遗传学说显然有许多漏洞，“你怎么会如此相信孟德尔定律”？李反问道：“你是否承认牛马和骆驼的血型呢？”李提到骆驼，是因为张是研究骆驼的。他这样反问是因为张是一位兽医学者，当然懂得这一点。接着李说，“人类也有血型，这是常识。血型可以证明某人是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可以证明他的妻子是否有外遇”，“这个结论就是根据孟德尔定律可以做出的。李森科的观点对此能作出决定吗？”谈到这里，张无言以对，便结束了当晚已入深夜的谈话。这足以说明李景均不计个人的安危，对真理的执著。

李景均是一位正人君子，是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汉子，不可能口是心非，更不可能“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醢”，又何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在政治上受到高压，在学术上不允许独立思考，在无可奈何中李景均被迫去国。李到香港后，给北农大同事陈延熙写过如下一首打油诗：

国结兮，他无意国结，
工作兮，我无法工作。
卷行李，挥泪拜别，
到家里，省身悔过。
“如斯而已，岂有他哉”

从这首诗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当时故土难离的悲愤心情！

四、一代宗师愤然去国

1950年3月初，李景均愤然离开北京农业大学，由上海转赴香港。

临行的那个晚上，他和妻子一直未睡，午夜之后，他悄悄敲开一位邻居好友林传光教授的门，惊醒了睡在床上的主人，他站在那里，神情沮丧地作最后的告别。当这二位夫妇听到这一消息后，吓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李景均只呆了两三分钟，就匆匆回到自己的宿舍。他走之后，这二位老友夫妇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赶忙穿好衣服，来到他的宿舍，表示万一他因逃往国外不成而被捕，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劝他要三思而行。但他已下定决心，为了坚持真理，不得不出此下策，冒险而行。

离开家门后，他一家三口由北农大宿舍乘坐两辆三轮车直奔前门火车站。北平三月，春寒料峭，阵阵凉风，迎面扑来，更加增添了故国难离的愁绪。他在走出学校大门时，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维留下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看门人转交，信中写道：“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不料到达火车站

站台后,发现俞大维、陈延熙、王焕如、陈道诸教授已在那里等候。但他们并不知道李景均此一去将不复返。互相道别之后,从此便人各一方,再没有晤面。

李景均由北平乘火车到达上海后,便匆匆忙忙去广州,转赴香港。到达那里不久,台湾大学就给他发来一份聘书,欢迎他去该校任教,并附有一封校长的信,言明他到台湾后,如不合意,可以随时提供方便去美国。李景均明明知道,虽然这样可以很容易获得去美国的入境签证,但他还是婉言拒绝了台湾大学的招聘。他在香港滞留了14个月,通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马勒(Hermann J. Muller)教授的推荐,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新成立的公共卫生研究院。马勒教授对他评价很高,在一封推荐信中写道:“李博士所著的有关群体遗传学一书,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内是一部最好的著作。”又说“他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的遗传学界的权威。”

有人说,李景均出走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有仇恨,原因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他在北平围城以前,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可以走而不走。北平解放后,共产党有“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他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而不走,为什么偏偏在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和强制而无理地乱批“摩尔根学说”的时候,冒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而“挥泪拜别”?如果当时大家可以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争论遗传学的问题,而不是乱抡大棒,乱扣帽子,以势压人,何至于把一位爱国的、正直的、优秀的遗传学家逼往国外?直到1996年9月3日他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还提到,“北平解放以前,我们在良乡住了一段时间(大约40天左右),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钱俊瑞先生(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1996年10月21日来信,又

写道,“钱先生待人诚恳,一贯谦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等。如果共产党人都能像他那样,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这里的“我们”当然指的是知识分子。再如1946年冬,李景均在遇到徐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政治顾问,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当时内战已经开始,国民党在大城市加紧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而他竟敢当面请徐冰到北大农学院给教授们讲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后来在良乡他又和徐冰见过面。李景均在1996年3月那封信中还提到,“徐冰未能过‘文革’这一关,殊为可惜”。可见李景均对共产党人并没有任何成见。

从学生时代起,李景均就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1935年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南京金陵大学的学生们起来响应。正在礼堂开会时,国民党的便衣特务潜入学校,学生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便冲出礼堂追赶那家伙,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就是穿着中式长袍的李景均!他在北大农学院讲生物统计学时,经常以当时美国大兵在中国各大城市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撞死中国老百姓作例子,来说明统计学中的概率,借以表达自己对这种暴行的愤怒,并增强学生们的爱国心。

李景均出走后,北农大全校师生连续几天开大会批判他的“反动”言行,有一天的题目是“李景均出走,是不是叛国”,结论当然是“叛国”。他1996年8月12日来信中仍顾虑“这个结论是否收入我的档案,迄今一无所知”。他接着写道,“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得到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终有一日要平反的,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位身居国外已46年而且功成名就的耄耋老人仍如此强烈地发出要祖国给他“平反”的呼声,岂不正是表达了他眷恋和信赖祖国的热情吗?

再说李景均的家族,他们虽然

是资产阶级,也看不出有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迹象;他的父亲李锐在解放前本可携其巨资移住国外,但他留在上海,继续在家潜心研究各国文字的《圣经》,希图安度晚年。李景均有两个妹妹,小妹李芳兰1937年参加了共产党。上海善终路的李家为四层楼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芳兰多次把处于危险状况下的地下党员藏匿在她的家中。他的大哥李景文在刚解放时,有人劝他把财产弄到香港,李景文毅然拒绝了。

五、冒死犯难,奔回抗战的祖国

1950年,南国三月,春光明媚。李景均挈妇携雏,跨过了罗湖桥,到达英帝国管辖的香港,回首眺望祖国大地,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八年以前,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不顾生死,跋山涉水,奔回战火纷飞、正遭日寇蹂躏的祖国,也是经由香港。今天,日寇战败,河山光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学无所用,逼上梁山”(李景均到香港后致函北农大同事陈延熙语),被迫出国,还是经由香港。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报国无门,能不痛心疾首乎!这一来一去,经历了八个春秋,其间一幕一幕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

1941年10月,李景均携新婚妻子由美国圣地亚哥乘一条荷兰商船回国。当时,德国军队正向苏联大举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展开。在海上几经周折,于12月5日到达香港,住在九龙一家旅馆内。这次航程本来预定为两周,却走了51天之久!12月8日晨,日军进攻香港。12月25日,英军宣告投降,香港遂被日军占领。

李景均困在九龙之后,终日盘算的是,如何逃出那里,奔回祖国。1942年5月李景均夫妇换上农民

的服装,在向导带路之下,从九龙随着一群奔回祖国的人,步行绕过日寇驻地,终于到达广东惠阳,这里已是自由中国的地方了。从那里,乘船、坐汽车,到达桂林,这一路整整走了38天!从离开美国圣地亚哥到达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整整走了半年之久!其行程之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冒死犯难?是伟大的祖国在召唤!是抗击敌寇的祖国在召唤!到达桂林后,李景均先后在广西农学院、成都金陵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讲授遗传学、细胞学、生物统计学、田间设计,乃至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自己严格要求一样。北大农学院农学系1948级共有学生20人,其中有四人因高级遗传学不及格而留级。这一班学生现在多已成为农业科研或教学的骨干,如小麦专家、原北京农业学院院长宋秉彝,玉米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曹镇北,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杨作民、米景九、王敏华、李丕明,还有梅楠、王洪春等。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专家一提到“李老师”,莫不怀有感激不已的心情。宋秉彝说,“李老师为人正直诚笃,学识渊博,才华焕发,对学生要求严格,讲课条理清楚。如果说我对农业科研事业有些贡献的话,应归功于李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功”。1948级的16名毕业生只是“李老师”在八年间所培养的诸多农业科学专家学者们的一个缩影,他们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无不包含李景均的劳绩和心血。

六、献身科学, 硕果累累

李景均之所以能在遗传学领域内成就其名山大业,靠的决不仅仅是天赋,更主要的在于他的勤奋。他在上课时,对学生讲,“我是难而知

之”。“天才就是勤奋”这句至理名言在李景均身上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他靠毕生之精力在遗传学这门深邃理论中上下求索,终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坚持真理的那种生死不渝的精神。在50年代初以政治力量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狂潮中,举国上下不敢置一辞的情况下,他甚至不屑于做策略性的闪避,而是以他的坚毅精神,鲜明地坚持由实验事实证明了的所谓反动的“摩尔根遗传学说”。这种力量的根源,就在于在学术问题上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他一生科学事业赖以胜利完成的关键所在。正如历史学大师陈寅恪所云,“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陆定一也曾指出:“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的讨论,那么学术发展就会停滞。反之,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李景均回国后,从1942年至1950年,一直在大学教书,由于教的课程多,备课忙,而且科研条件缺乏,所以这一段时间,除了教书育人以外,著作不多。1948年,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群体遗传学》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首次在我国介绍这门学问的论著。他以全面、简洁而深入浅出的文笔,系统地介绍了群体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1955年,李景均到达美国匹兹堡大学之后的第四个年头,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修订版,成为这一领域的名著。正如斯皮斯(E. B. Spiess)教授所评论的,“这本书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可以说至少统治了20年”。他又说,“事实上,要是没有这本书,由费希尔(R.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和赖特(S. Wright)等科学巨匠创立的基本原理,直到1970年

还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其中获得了教益”。就是这部举世瞩目的大作,却被宣传“米丘林学说”的《农讯》斥为“荒谬”!该书的增订版《群体遗传学第一教程》(1975年,Boxwood出版社)又前进了一大步,著名评论家舒尔(W. J. Schull)说,“该书作者有令人惊叹的教学编排技巧,该书应为所有希望熟悉群体遗传学概念的人们所拥有和学习”。苏联科学院曾动员四位专家把此书尽快译成俄文,并于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此外,他的专著还有《人类遗传学原理及其研究方法》(1961年,McGraw-Hill出版社),该书曾被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李景均不仅是一位遗传学家,而且是一位统计学家。他对试验统计理论及其教学有着极深的造诣,所以在统计学方面,也有影响很大的专著,例如,《试验统计学导论》(1964年,McGraw-Hill出版社),内容丰富、系统、结构谨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此书已译成中文,于1995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它也被译成西班牙文,畅销南美各国。李景均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短的“序言”,其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感情:“1949年秋,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新遗传学’盛行全国,我所教的群体遗传学当即被取消了。那门生物统计学呢?因被认为是给资本主义服务的,也被取消了。无可奈何,我于1950年初,离开了北京大学农学院,迄今已四十四年矣。所以国内学子和我竟成了陌生人!这对我来说,诚是一件憾事。我在国内教学时和同学们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使他感到高兴的是,这本书“帮助我恢复了与国内同学在学术上的一部分关系”。

但是,主要代表他的学术成就的,乃是他的170多篇专题论文,限于篇幅和读者对象,在这里只能作简略的介绍。

他在人类遗传学领域内所作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例如他和出生在中国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格拉斯(B. Glass)合写的论文——《人种混杂的动态——根据美国白人、黑人所作的分析》(1953年),首次科学地估计了历史上白人和黑人的混合率。这篇论文不仅学术价值高,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有两千多人向他们索要论文的复印本。1954年他提出的 ITO 方法,用以概括交配群体的所有近缘系类型间的关系,已在人类遗传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他的另一突出的贡献是对人类性状的孟德尔式分离研究,他创造的“不计独子或独女的方法”,或简称“单法”的分离分析方法,被认为是分离分析领域内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是简单分离分析中应予使用的“唯一方法”。他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他的许多重要概念和结果,已成为实验群体遗传学的基础,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科。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富有哲理的有关人类遗传学的著名论文,如《文明人的下巴在缩小吗?》、《从两个热水瓶说起:人类智力遗传模型的若干特性》等。

如上所述,李景均之所以能够在遗传学上取得如此赫赫业绩,除了他的天赋、勤奋以外,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从李景均一生治学的轨迹来看,或可用十二个字加以概括,即:立志、坚持、积累、发展、创新、献身。而献身精神正是他的事业的支柱。

但是,庸庸讳言,李景均有稳定的治学环境,可以自由驰骋;有完善的治学设施,可以任意使用;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的支持,可以无虑地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客观条件,李景均虽然有更高的天赋,更大的勤奋,更强的献身精神,恐怕也难能完成他今天这样辉煌的学术成就。我想,李景均的出走,以及他走后在科学事业上的成功,应该使我

们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想起了邓小平同志 1978 年在科学大会上说的一句有名的话:“我作大家的后勤部长”。为什么邓小平说“当后勤部长”,而不是说当“政治委员”或“司令员”?我体会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党和政府要给科学家们提供上述可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强迫命令他们必须遵循什么学说,给他们划框框,决不干扰科学的自律性。

七、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1983 年元月一日,李景均在匹兹堡大学正式退休。1982 年 10 月,为了庆祝他的 70 岁寿辰,在匹兹堡大学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人类遗传学研讨会。会后,匹兹堡大学授予他一枚勋章,以表彰他 31 年来在人类遗传学领域内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表示,作为名誉教授,他将对一些科学上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从 1983 年至 1988 年,又增添了 17 篇专题论文。他最近来信说:“我已八十又五,每天还能去学校工作几小时,每年还有一篇论文发表。”1996 年,李景均在《人类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群体遗传学中 DNA 的巧相配》,该刊宣布这篇论文为 1996 年的最佳论文,并获得全国性的“加布里埃尔—拉斯克奖”。一位患有严重白内障、高血压的耄耋老人尚如此辛勤地工作,其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精神,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吗?

李景均除了专心读书和做学问外,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不过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计算,他认为目前通用的日历已经过去时,他的计算方法是,把一年的 365 天,拿出一天作为全世界的共同节日,下余的 364 天分为四季,每一季则为相等的 13 个星期。这样,就不必分为大月(31 天)或小月(30 天),

更没有必要把二月定为 28 天或 29 天了。1956 年联合国讨论过这种历法,许多世界领导人认为可以接受,不过美国和英国行使否决权,把这一议案否定了。但李景均对将来实行这种历法非常有信心。他说,实行这种历法一年以后,人们就会憎恶再回过头去用老历法;实行二年以后,人们就会对往日为什么要用老历法感到奇怪;实行三年以后,人们就会忘记世界上还有其他历法。

李景均去国已 47 年矣,但想起当年的情景,犹意气难平。他在 1996 年 8 月 12 日给我的一封长信中写道:“往事已矣,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又说:我在农业大学和以后出走的情形,可缩为以下几句无韵无节的话:

科学政治井河水,何必血口扣帽子。

新说旧说慢慢谈,真理论证自然来。

党委书记大皇帝^①,金口玉言搞教育。^②

骆驼庄^③上风云急,布衣小民去无归。

“去无归”!痛哉景均!

1997 年 3 月 19 日他在一封回忆往事的长达 17 页的信中写道:“这封信我写了两天,落了两次热泪!”品尝那去国遗恨的滋味,热泪盈眶,老翁心境,可想而知。伤哉景均!

(本文蒙方粹农、庄巧生、黄季芳、宋秉彝、齐兆生、胡济生等有关专家审阅,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特此致谢)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方实)

① 此处专指乐天字,并非泛指。

② “一言堂”搞教育,鲜有不失败者。

③ 骆驼庄为北农大所在地,旧名骆驼庄,地处门头沟与北京之间,由门头沟载运煤块骆驼皆在此处打尖休息,故名。

“四人帮”被审期间 丑态图

● 李耐因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决定。随后,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宣告成立并开始工作。

我当时作为新华社审判两案报道组组长,参加两案的报道工作,接触到“四人帮”十年横行危害人民的大量罪行。这期间,曾三次住进拘押江青等10名主犯的秦城监狱(这里在“文革”中也曾是关押迫害大批革命干部的地方。我们记者进驻时,住的也是单间监房),收集和整理材料。除大部分材料已公开发表消息、通讯、报告、评论外,尚有一些当时未及面世的材料,留在笔记、日记本里,埋没了可惜,整理出来发表,或有益于人们,特别是今天的青年们认识“四人帮”的阴险面目和了解当年那场怵目惊心的斗争。

递送起诉书前后

198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后,原来由公安

部拘押的江青、张春桥等10名被告人,即于当日移交法警看管。现在听听他们当时的反映,倒是满有意思。

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打官司呀,我没钱请律师。我现在这个情况,谁还给我当律师。我也不迷信律师。

张春桥梗着脖子,一言不发。

姚文元有些惊慌了,说:要提到法院去判决呀!——没想到,没想到(据看管人员说,这天姚文元很紧张,午觉睡不着,饭吃不下,坐在床上发呆)。

王洪文倒坦然,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愿意接受政府的法律制裁。

陈伯达是在医院里监管,听了,一个劲地嘟囔:坏了,坏了,完了……。

江青向看管员说她头晕、头疼、浑身难受。问:可不可以缺席审判?又提出:希望给我找个法律顾问。

他(她)们要去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大约是要“研究研究”吧。

10月6日,分别为他(她)们照了免冠像。江青还特意梳理打扮了一下,端端正正坐到凳子上。

按照法律程序,起诉后5天要向被告人递交起诉书。因此,10月10日上午,特别法庭书记员向10

名被告分别递交了起诉书。这是在监狱的二楼大厅进行的。

这时王洪文被押进来。他戴着蓝色帽子,嘴巴上下有短短的胡须。当年是46岁。这个靠打砸抢起家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眼睛眨巴着,听书记员宣读起诉书和法庭规则,样子很认真。最后他还签收了起诉书。

书记员问:除了你自己可以在法庭申辩外,可以请律师辩护。你可以写个简单的委托书,法庭可以代转。

王洪文答:不要,不要律师。说完就下去了。

姚文元被押进来。他满腮胡子,似乎较前更胖了,金鱼眼睛更突出了。

问:要不要律师辩护?

他鼓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了半天,说:我这些天在想自己的问题,没想到这个问题。

问:你要不要律师?

他又翻着眼睛想了半天,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没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该怎么办。

书记员:那你回去想想再回答吧。

张春桥进来。

书记员:传送员,把起诉书交被告人张春桥签收。

张春桥仰起头：我不承认你，不要。

书记员：要不要律师辩护？

张春桥：我不承认你们，还要什么律师，胡闹！（歪着脖子下去。）

江青给押进来。她穿一身黑衣黑裤，布鞋。头发也是黑的。似乎还长胖了一些。接过起诉书签字的时候，还笑了一下。似乎问了一句几日，马上说：“噢，10日。”

问：要不要律师？

答：检察员问了一些问题，有些还没问完怎么就起诉？

问：要不要律师？

答：我还需要跟检察员谈一次。

问：要不要律师？你可以写委托书，法庭代转。

答：我看了《刑事诉讼法》，有这样一个规定。我想是需要个律师，有时我说不出话来，需要律师替我说……但是我不知是谁，是不是谈一谈。（自言自语地说）谁还给我当律师呢？

问：那就想一想再说。

书记员念法庭规则时，她一只手握在耳朵后面，仔细地听。说：“停一停，我听不清。”又说：“我大部分听不清，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份？”可以。她把法庭规则、起诉书卷到一起退下。

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四人按顺序进来签收起诉书，他们都表示不要律师。

陈伯达、李作鹏当时生病，在医院监押。陈伯达戴着深度眼镜，在监护人员扶持下颤颤抖抖地迈着小碎步来到书记员前面，签收了起诉书。

问：要不要辩护律师？

答：我没想过，我不知道。

问：要不要律师？

答：我没经验过，我想一想。

问：要律师的话，可写个简单的委托书，法庭代转。

答：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一想，不能马上……

陈伯达被押回病房的路上，还

一个劲儿地嘟囔：我没想过，我不知道，我得想想……

拘留所传来消息：10名被告人收到起诉书后，神经紧张。姚文元午觉不睡了，放风也不去了，半夜睡不着，向看守员要了安眠药，仍睡不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动。他要了纸、笔，在写着什么，一张又一张。张春桥一言不发，在监房里来回走。陈伯达看了起诉书。起诉书上有一条，1967年12月在唐山大会上，他一句中共冀东党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牵连了上万人，上千人遭批斗，许多党员干部被迫害致死。他吓坏了，嘟囔着：死了那么多人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想到，没想到……他给中纪委写信，要求“恳谈一次”，说：“这要求虽然狂妄，我恳切地请求。他还写了：‘我要求律师辩护。’”

花样最多的是江青。拿到起诉书，午觉不睡，在看，在记、在写，还常常冷笑。她几次提出要求同检察员谈话，说要谈几个问题。检察员江文会见了她。谈话要点如下：

江青：法庭开庭，我要讲话。你起诉书前面有个序言、帽子，我也要讲个序言、帽子。

江文：这由特别法庭决定。你要遵守法庭的裁决和规则。

江青：我可不可以带起诉书出庭？

江文：可以。

江青：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

江文驳斥了江青的胡说。江青历来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办坏事，这是她一贯的伎俩。毛主席就讲过：“她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江青：还有几个问题，我要说。

江文：起诉书没有认定的，法庭不予审理。

江青：那我就不说。我还有几个

问题，要找审判长个别谈，因为涉及国家机密。

江文：可以转达。（据后来了解，江青并没谈什么国家机密，只不过找机会胡搅蛮缠，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她干的说成别人干的。）

江青：律师问题。是事实服从审判，还是审判服从事实？

江文指出，特别法庭要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你可以陈述自己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法庭根据充分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作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据此判定每个人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

据说，江青会见了律师。她向律师提出：我有时说不出话来，你替我说。律师说，那不行，事是你干的，你最清楚，事实必须你自己说。也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江青火了，她说，你这个律师不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要律师。

我看过预审江青的录像，两个小时，她没正经回答一个问题。她坐在那里，一脸凶像，指手划脚，东扯西拉，蛮不讲理，无赖诡辩，胡搅蛮缠。“文革”期间，她还在台上时，她自己的讲话录音、她的手批文件，样样证据摆在她面前，她硬说不知道，硬说你诬陷、你造谣。我们看录像的人也气得满腔怒火，这是个泼妇、无赖。

从11月10日向被告人递送起诉书，到11月20日正式开庭，这期间被告人的种种丑恶表演，预示着审判将是艰巨的。

“小小老百姓”陈伯达的“发疯时刻”

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在文革中确曾显赫了几年，直到1970年庐山会议才有些失势。这个貌似迂腐，话也讲不清爽，到处讲话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其实大奸似忠，是个大大的投

机家、阴谋家。他在文革中办了大量坏事，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他控制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致使广大干部群众遭受迫害；他伙同江青、康生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直至冤死河南；他无中生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现行反革命，进行人身摧残，可谓疯狂之极。

此人又投机成性，原来是追随江青，扶摇直上；后来见林彪集团权势庞大，就改换门庭，投到林彪麾下大受重用。叶群说他们“文有文臣武有武将”，那文臣就是指陈伯达。可惜庐山会议林彪集团发难，陈伯达第一个被捉。江青集团对陈伯达的“变节”，那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江青在被审前及受审中，都多次声明：“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她是另一个集团，包括康生，念念不忘划清界线。甚至在法庭调查中，她看见这老头子就怒火冲天，不只一次地骂陈伯达“窝囊废”、“无耻”，是“老反革命”。

陈伯达在受审前及受审期间，都是在医院病房监管的，没有关押秦城监狱。

陈伯达拿到起诉书后，最害怕的是他对冀东人民犯下的罪行，那

真是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一个劲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12月26日，这个陈伯达窜到唐山去，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时期）“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冀东地区在我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又是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出一幕又一幕气壮河山的抗敌场景。这一地区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陈伯达的这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在陈伯达1967年那次讲话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上万人遭批斗，几千干部群众被迫害致伤致残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

陈伯达的罪恶还不只这些，他

还制造了个“非常委员会事件”，竟然株连到朱德、陈毅、刘伯承等几位元帅身上，那更荒唐得没边际。

这个糟老头子造谣的目的是什么？伙同林彪、江青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栽赃，向革命人民头上泼污水，以遂他们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时，审判员就这两件事提出质问，要他回答。

审判员问：你根据什么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

陈伯达回答：那天……我是凭空想的，不完全是事实。好像是根据某个人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凭空想，就把几万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有的他还指名道姓，说唐山市委书记是叛徒，唐山市长是大庄园主。造成那么大冤案、惨案，他竟然不记得！法庭出示他在唐山讲话录音、讲话原始记录。

问：听清楚吗，是你讲的吗？

答：我听到了，是我的声音……我自己不能理解自己的声音，像个外国人讲的话。这是事实。这说明我是个糊涂蛋！到了那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不经调查，即席乱说一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通。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完全是混蛋。——看起来,我是准备过的,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信口胡说,加油添醋,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造成两万人冤案,二千多人死亡。我当时那个名义(指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现在听了也惊天动地。可我说错话,出这大事,我不知道,我记不得。当然罪过很大,我不是减轻罪责。

问:你只是说错话,后果不知道,就没责任?

答:我,我没推卸责任。

法庭出示证词,宣读了对市委书记、市长复查结论。他们都是好同志,已平反昭雪。有两位受害人当庭控诉,震动全场。

问:陈伯达,你听清楚没有?

答:这,这控告对。我一到唐山就点名,就这样讲,是可行的……没调查就说那么多荒唐话……

问:只是可笑、荒唐?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答:是,是反革命,是犯罪,……

陈伯达忽然又起来为他自己的罪行辩护了,且听他说的是什么呢——

陈:但——但在文革中,群众起来了,有各式各样的群众,他们利用

我的话做坏事。当然,我不说这些话,干不出这些坏事;我说了,他们就能利用。……只有一点遗憾,我(后来)记不得(这件事)。

这个林彪集团的高级谋士,不承认冀东惨案是他一手造成的,反咬一口,说是他被“群众利用”了,可谓狡猾之至。

陈伯达制造的“非常委员会事件”,更其荒唐了。1967年,天津出现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后来“破案”,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特别的背景。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的头上。法庭审理过程中,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听,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

答:34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34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罢,34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师们身上!这岂非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

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发疯的时刻”,利令智昏,已经不顾一切了!

江青的狱中“诗作”

江青在拘押待审期间,表现最为无耻。她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势,颐指气使,要这要那。看守员说,她一天要呼叫看守员一二十次,一会叫开窗,说空气不好;一会叫关窗,说她要着凉;一会说头晕了,要医生来;一会又说,这药她不吃……。有一次,她还对看守员“下令”:把你们看守员都找来,在这里缝棉被,我给你们指导。看守员训斥她一顿。

她还有“著作”哩。

这就是一篇,题目叫《我的一点看法(二)》。没有(一),她是从(二)写起的。似乎是模仿毛泽东庐山会议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字也是模仿毛体,气势、神韵是谈不上,但是形似。可见江青在仿毛体上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〇年元月十四日”,共19页,注明“未完”。据查,后来也未续写。

她写了些什么呀?满篇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语言,歪曲、漫骂和捏造。

世界在她看来是颠倒的。她从报上看到的(在关押期间,他们可以听广播,有一份人民日报,也允许他们看书),却是“地富反坏右翻天”、“资本主义复辟”、“开倒车”……。她把她(他)们那一帮封为“好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好学生”,却关进监狱;她咒骂革命人民、复出的干部,“邓、叶之流”,是“坏人”、“阴谋家”、“修正主义分子”,却坐天下,她说她“不理解”。

她在文中破口大骂“三驾马车”、“邓、叶之流久蓄阴谋”,把她和



姚文元



陈伯达

她那个“四人帮”赶下台，是“反革命政变”。她还以嘲笑的、讽刺的口吻，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说“你们亲自抓的‘四个现代化’（她给打上引号），当成救命的档箭牌，大吹大擂，‘四个现代化’成了唯一的任务，这适（是）只有‘三驾马车’才有的这样的‘宏图’，新长征也是“骗人的舆论”。

她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正确政策，从自留地、自主权、干部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负盈亏、鼓励竞争等统统骂了一遍，说这统统都是“修正主义”，只有她们“抓住阶级斗争不放”，“大批促大干”，才是“正确的”。

看江青写的语无伦次的文章，是一种乐趣，也是一个警号，她是从反面给我们当教员哩。

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有个有趣的尾巴。江青写道：她“余下的时光，将遵照毛主席教导：努力改造世界观。”她还改造世界观哩，真是恬不知耻。

又一篇，是胡诌的四言诗，题目叫《我的回答》。她回答谁？回答10亿人民。她撒谎，编造，咒骂，一副泼妇骂街的凶相。我们还是照抄吧，加一点小小的批注。

《我的回答》

清君之侧，目的是“君”。

注：第一句就不通。以她为首的“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时候，毛主席已去世，对华国锋，她“四人帮”又不承认，急欲去之而后快，谁是“君”？江青其人历来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尽坏事。毛主席就曾尖锐指出：“她（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注：江青居然敢说这话，岂不令人喷饭。

在十年浩劫中，她点了几百人的名，随便给人家戴上叛徒、特务、

反革命、坏人的帽子，多少人家破人亡，致死致残，人民心中都有一本帐的。

利用脑病，搞逼供信。

注：江青的脑病确实有，这就是迫害狂病，中国人已经领教了十年。逼供信恰恰是江青为达目的使用最多的手段。张重一、杨承祚两位教授，身患肺癌已经扩散的王世英，都是在她直接指挥的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下惨死的。这样的事何只千百。她甚至连厨师、保姆也不放过。一份记录稿上就记着她给专案组的讲话：“要狠狠地斗，死就死”。“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你看她何等的凶残恶煞。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注：在“文革”期间许许多多革命干部，被“四人帮”投入秦城监狱，有的人被关押八九年之久，有人致残，有人致死，侥幸活下来的老干部们，将会证实他们在秦城监狱受到的折磨，那才真是一言难尽。秦城监狱烧水的老师傅告诉我们，在“文革”中监房里常传出被刑讯的惨叫声，有人忍受不住跳楼自杀了。刘仁、傅连璋都是在关押间惨死的。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也被关押在这里，他们的待遇如何？还是用1980年9月14日江青自己写的话——这可是白纸黑字——来回答她自己吧。江青写道：“我在这里的物质生活尚好，监狱组织和工作人员们，总的说是尽他们的力所能及的解决问题。我感谢他（她）们对我付出的劳动。就是新鲜空气有时差些”。这不正好打了她自己一记耳光吗。最后一句，她还是说了瞎话。她一个人住了一层楼，走廊可以散步，每天还有“放风”。这院内钻天杨一排排，高墙外又是树林环绕，最多的就是新鲜空气。

破坏政策，凶悍残恶。

注：把“四人帮”这帮血债累累的害人魔鬼抓起来、关起来，叫“破

坏政策，凶悍残恶”？！如果她（他）们不在监狱里，任其横行，那么中国大地就成了人民的监狱，那才真叫凶悍残恶。江青在预审期间多次“抗议”，说抓起他们来是“非法的”，是“突然袭击”。她居然还讲什么“合法”、“非法”，她不是一句话就要了多少人的命吗？对待这帮人，可不能书生气十足，否则我们都成了东郭先生，早就被蛇咬死了。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注：这话要加以注解。江青嘴上的造反，就是可以任意镇压人民、残害干部，江青的革命就是颠覆我们党和国家。他们上台专政，她认为这有理，这无罪。这是她的逻辑。中国人民却认为，“四人帮”的霸道，天理不容，“四人帮”的罪行，十恶不赦。这是人民的逻辑。

杀我天口，光荣之甚。

注：“四人帮”罪大恶极，用他们曾是同伙的林彪爱说的话“人人得而诛之”。她终于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是罪有应得。什么“光荣之甚”，是遗臭万年。

最后是江青的签名，“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六日晨，于秦城监狱”。后面另起一行，又写了一句：“廿四日我又郑重声明：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这真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好一篇难得的自白诗。

1980年9月14日，江青还向检察员写过一封信。那信上有一段“有趣”的话：

“为此，我已经正式声明我说的话都不算数，包括我的申述”。

江青从来就是个两面派。在预审期间，她过去的讲话录音、亲笔批件摊在面前，她都能耍赖胡说不知道、不算数。“我说的话都不算数”，对江青说来是小事一件。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原《瞭望》周刊总编辑）

（责任编辑 方实）

九

三

前

林彪

江青

次通话

李耐因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时候，从江青住处查获部分电话记录。这是一份颇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单只林（彪）办公室、江（青）办公室之间的通话，1969年到1971年9月8日（即9月13日林彪外逃前5天）止，两年零八个月，他们之间有记录的电话即达470多次，差不多两三天就有一次通话，有时甚至一日数次通话，真可谓密切之极。这还只是经书记录、转达的电话，他们之间直接通话是没有记录的。

翻看这些电话记录，不了解内情的人是会忍俊不禁哑然失笑的。都记录了些什么？

江青致林彪：“江青同志向林彪同志和叶群同志问好，请林彪同志和叶群同志保重。”

林彪复江青：“谢谢江青同志的关注。请江青同志多保重。”

叶群致江青：“我代表林彪同志向江青同志问好，请江青百忙中多保重。”

江青复叶群：“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对我的关心。希望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多多保重。”

……

一页一页翻下去，净是些你“保重”、我“保重”，你“注意身体”、我“注意身体”，你问我好、我问你好。一个是堂堂元帅、党中央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炙手可热的“旗手”，竟然如此地唠唠叨叨，这是怎么回事？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江青集团羽毛未丰，还需要林彪这座“尊神”的保护和照顾；江青的特殊地位，林彪也需要利用。这就是进入1969年，江青、林彪之间通话骤然增多起来的原因，那些婆婆妈妈的问候，正是他们相互承认对方的地位、利益的一种暗示。“九大”以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人物都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势力扩张；林彪奠

定副统帅、接班人的显赫地位，其权势仍然超过江青集团，这就有了两个集团新一轮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和相互争夺，但在与党和人民为敌这个问题上，他们始终是一致的。那些婆婆妈妈的问候，似乎一方不适，就不得了，另一方就活不下去了，其实哪里是什么“关切”，而是相互关照，相互鼓劲，是在心照不宣地互送秋波。

一页一页翻下去，文章果然出来了，他们之间互通情报，共谋对策，既勾结又斗争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了。

且看1970年9月江青、林彪间的几次通话吧。这正是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遭受沉重打击之际。

九届二中全会（即著名的“庐山会议”）之前，林彪集团露骨地抢夺最高权力的活动，使他们同本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多次演出公开对抗，原属江青集团的陈伯达倒向林彪集团一边，更是火上浇油。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集团借所谓“天才论”发难，谋求夺取最高权力，被毛泽东识破，点名批判陈伯达，敲山震虎，引起林彪集团的惊恐。江青集团既有些扬眉吐气，又有点兔死狐悲；他们还看不清林彪集团是否失势，所以还在拉拢。林彪集团则是另有打算。

1970年9月1日下午2时

叶群致江青：“我从江青同志那里回来以后，给林彪同志谈了，林彪同志很高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

毛泽东在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说他（其实包括林彪集团的其他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之势”。9月1日叶群就到江青住处拜访，这是一个试探，一个希求和解的行动。谈了什么？有什么交易？不知道。似乎有“成绩”，因为林彪“很高兴”。

1970年9月5日晚12时

江青致叶群：“谢谢林副主席、叶群同志对我的关心。希望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多多保重。”

9月1日叶群去“探路”或者发现现有和解的可能，9月5日晚林彪率叶群亲自登门拜访江青，表示道歉和和解，表演一场面和心恨的闹剧。夜深至12点了，林彪已经回到住所，江青又打电话表示感谢。

1970年9月6日晨1时30分

江青致林彪：“一组特别高兴，说副统帅好，培养不易，是亲密战友，有脾气。夫子（注：指陈伯达）同张、姚有矛盾，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注：指林彪、江青）。稿上没有。汪、吴没事，不调工作。要求军队干部谦虚，一军团。特别是军队要团结，一组（警卫局对毛泽东在中南海驻地的警卫编号，这里指毛泽东本人——编者）提拥政爱民。批11（“文革”中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工作人员以此代称江——编者）很严，同叶对比，懂事。”

12时通了一次话，隔了一个半小时，又通话，可见所谈问题的重要、紧急，刻不容缓。但这却是一篇鬼话，有代号，有暗语，似乎是异常机密的情报，只有他们自己心领神会，外人是看不懂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江青自己和林彪。以前江青与林彪通话，都是一口一个“副主席”、“副统帅”，现在林彪大有失势可能，口气有点变了，很有点平起平坐的味道。其实他们过去干坏事，从来就是一起的，只有争夺权力时才分你我。

1970年9月6日下午8时

江青致叶群：“问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一下。如累了，就不去了，等回去（注：指回京）后再去看他。”

林彪复江青：“江青同志就不要

来了。叶群同志、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看你。”你来看我吗，不必了，我们（林彪集团的全体大将一个不漏）全上你那儿去，而且“马上”。

江青有什么好看？林彪、黄永胜私下都骂过这个“上海滩的婊子”。这个“看”是大有文章的。他们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是人们可以揣摩出，谈的是大事，是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一笔大交易。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江青间的通话，仍在继续。仍然是你保重，我保重，多注意身体，放宽心啊，等等，真是“肉麻当有趣”。

时间到了1971年的4月，他们之间的通话多起来。这是什么时候？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派人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旨在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4月15日开始，中央召开“批陈整风”会议，要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作检讨。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阵脚，使之陷于被动境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团一方面敷衍应付，作假检讨，迷惑人们耳目；一方面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林彪集团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是1971年3月在上海制定出来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再看林彪、江青间的通话，就可以真正认识阴谋家们尔虞我诈、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面目；也由此可以看到，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争夺最高权力上明争暗斗，相互利用，相互欺骗，但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共同与党和人民为敌，他们之间仍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惜我怜，互送秋波。

1971年4月14日

叶群致江青：“我们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林彪和我都很惦记江青

同志。特别当我想到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教育时，我就更加想念她。我一定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1971年4月19日晚

叶群致江青：“报告江青同志一下，我们回来了，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给我打招呼最早，我想去看看江青同志。”

1971年4月20日晨

江青复叶群：“请叶群同志来。”

1971年4月29日晨

叶群致江青：“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

1971年5月2日

江青致叶群：“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

叶群复江青：“林彪同志欢迎江青同志来。”

1971年5月14日

叶群致江青：“林彪同志叫我约着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你们应该有觉悟。我们回北京以前，他们（注：指黄、吴等）看过江青同志，林彪同志说，不行，还要去。”

江青复叶群：“我很欢迎你们来！”

1971年5月17日

叶群致江青：“我把我们三位（指叶、黄、吴）去看江青同志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了，他听了很高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

1971年5月18日下午

叶群致江青：“我采了两束花，林彪同志要了一束；林彪同志和我

送给江青同志一束，问候江青同志。”

江青复叶群：“感谢。”

世界上的事物，真是无奇不有。三个政治局委员（其中一个总参谋长、一个是空军司令、一个林办主任）“奉命”去和另一个政治局委员去“谈心”，是如此地毕恭毕敬，很有点朝山拜佛的味道。而且谈心回来还要“报告”，一次谈心不行，“还要去”，可见“谈心”的重要性，可见“谈心”也是阴谋家们手中的一步大棋。他（她）们之间卿卿我我何等亲密，其实是各怀鬼胎，应了那句俗话“面上一脸笑，脚下使绊子”。

“谈心”的结果，大约是皆大欢喜，于是有了“献花”。采了“两束花”，不是一束，也不是三束，一束献林彪，一束献江青，别人是没有份的，只此二束。林彪、江青是干阴谋勾当的，善于搞小动作，彼此心明，不点自通。两束花，出自叶群之手、林彪之口，大有深意：领袖者，唯你、我二人也。这大约是潜台词。不然何其郑重如是？

事情进展到6月，又有了新花样。

1971年6月9日

江青致林彪：“主席说林副主席学习最好。我想给你照一张学习毛选的免冠像，命题叫‘孜孜不倦’。请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到我住处来。”

1971年6月11日

叶群致江青：“林彪同志的照片收到了。林彪同志说照的非常好。”

江青复叶群：“我已打电话给《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都刊登。”

据江青给林彪照相时在场的人说，林彪护秃头，不愿照免冠相，还是江青给他摘去帽子的，并随手塞了一本毛选给他。江青煞有介事地折腾好久才照完。林彪说：“谢谢”。

这就是当年那张到处刊载、张贴的林彪单人像的来历。

1971年6月13日

叶群致江青：“照相的问题，我向法宪同志讲了，他们（注：点了一人的名，可说的并非一人）说对他们鼓舞很大。以江青同志身体为重，请江青同志保重。”

1971年6月22日

叶群致江青：“《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用林彪同志照片问题，我报告林彪同志了，林彪同志说还是用看毛选的好。”

江青复叶群：“两画报都用看毛选的。”

1971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都刊登了林彪学毛选的照片。据后来毛远新交待，“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毛远新曾向江青问起过给林彪照相的事，江青说：“那是主席派我去作团结工作的。”毛远新又问主席，毛主席说：“别听她那一套，没有那回事。”

事情发展到1971年的9月。毛泽东在南方巡视，分别召集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集团焦急地四出打探消息，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匆忙赶来的林立果研究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和面临的形势，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他们决定对从南方巡视回京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进而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政变手令，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赶回北京进行具体部署。

可就在林彪下达政变命令的同时，他们同在北京的江青还在通话。

1971年9月8日

叶群致江青：“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派人给江青同志送去了西瓜。”

江青复叶群：“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就是胜利。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地那样的锻炼。请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放心。”

9月8日，距离林彪谋杀、政变阴谋破败，仓皇出逃的9月13日只有5天。叶群的电话，显然是在为他们穷凶极恶的政变阴谋打掩护，或者是试探。江青的那一番语无伦次的言语，却怎么也弄不清她说的是啥。是要她自己坚持下去呢，还是要林彪坚持下去呢？闻鸡起舞，是说她要与人民斗争到底呢，还是要林彪提高警觉呢？“放心”，是江青和林彪通话中最常见的话，那是一种彼此默契的语言，这个节骨眼上，放什么心呢？

江青和林彪、叶群两年零八个月的通话记录到此中断。可还没有完：当林彪集团谋杀阴谋受挫，南逃广东阴谋败露，走投无路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已抵达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凌晨不顾地面拦阻、机组缺员，登上256专机，仓皇外逃，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这时江青在干什么？9月12日下午，江青带着林彪送来的四个西瓜，到颐和园去了。就在慈禧太后遗臭万年的地方，她把颐和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这时，离林彪外逃葬身不到10个小时，江青是在为林彪招魂呐。

林彪集团破败以后，江青集团收集林彪集团的残余势力，表现了更大的疯狂性、破坏性，直到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责任编辑 方实）

他16岁开始植树,20年来与大山为伴,与森林为伍,共行走22万公里山路,可围绕地球赤道5圈还多。他们夫妇俩共植树50万株,为国家创造价值1620万元,而他们俩人的年收入却仅仅只有1600元。为了造林,5岁的爱子被毒蛇咬死,他们发誓要把荒山秃岭全种上树。若干年后,满目青山翠绿,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纪念。

献青春舍爱子 绿了山岭的孙俊福

● 宝 鑫

1960年春季,正是植树的日子,黑龙江农垦牡丹江管理局宁安农场又诞生了一个北大荒的后代——孙俊福。1976年10月,初中毕业后才16岁的小俊福,和二十余个伙伴来到宁安农场长丰林场当了一名植树工人。

孙俊福每天一大早就踏着遍山的露水,走两个多小时才到达植树地点,还没干活就累得精疲力尽了。火辣辣的太阳晒着,喝的是控山水,吃的是凉饭菜。山林里草爬子、瞎蠓、蚊子、小咬特别多,连叮带咬,脸上身上常常青一块、红一块,疼痛难忍。胳膊、腿上都是树枝刮破的血口子,再裹一身总是湿漉漉的衣裤,一干就是十余个小时。等到披着月色回到家,身子骨就像散了架……

生命轮回。老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临终时握着俊福的手重复着:“我们当年只是开荒建场,没有在山上的栽更多的树。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俊福噙着泪点着头。

一件平凡的工作,一旦在心中变得神圣起来,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发出璀璨的光芒。几年的功夫,小俊福成了造林好手。在1979—1982年间,他比一般工人多植树十万余株,是全场植树最多的一个,且成活率高达89%以上。“树种多了,山就不荒了,岭就不秃了,木

材就不缺了,子孙后代就不受穷了。”这就是孙俊福的终生追求。

孙俊福和妻子刘春玲是1983年相识的。1984年4月28日,俩人行行李一搬,甚至连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就幸福地结合了。

春玲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爽朗的女人,她和丈夫日夜劳作、相濡以沫。这么多年来,俊福吃过的苦,她一点也没少吃。

春玲和俊福一样疯了般干活,休息时,席地而坐,大葱蘸大酱,啃可能爬上蚂蚁的凉馒头,喝有小虫的泡子水。打林带,满手是刺,每天脚板都让露水泡得白白的,走了形。

1986年农场实行造林承包,条件是3年林木成活率、保存率验收合格后,给每亩造林费15元。干这么苦累的活,收入这么少,二十余名植树工人“挖门子”、“找关系”,纷纷离去。俊福和春玲商量:造林这艰苦的活总得有人干呀!于是,他们承包了离家最远、条件最差的张广才岭上的千亩荒山。

张广才岭的植树地点离家十五余公里,别说是山路,就是柏油公路也得走两三个小时,何况他们要踩着草棵子,钻着树隙……

为了节省走路时间和减少劳累,夫妻俩一商量,用3天时间在山里搭了简易窝棚,支上锅



孙俊福、刘春玲在山上劳作

灶，车上不去，便把行李、粮食、树苗、工具背上山，在大山里安了家，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那里没有山泉，吃水就全靠下雨时积存在小水泡子里的雨水，遇到旱季，水泡子仅剩下一点点红色的浑水底子，上面浮着一些令人肉麻的小虫，只好用苇子管一点点吸着喝。既不遮风又不挡雨的窝棚里没有电，没有灯，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也没有可以说话的第3个人。现代人拥有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并且窝棚里时常有毒蛇出没，尤其是暗夜，那闪着磷光的蛇眼和伸缩喷吐的信子让人魂飞魄散，有时候它们还会钻进人的被窝。《工人日报》的一位记者戏称他们的家是大山深处的“鲁滨逊家庭”。

山里的蛇多，有腹蛇、青蛇、土球子蛇、野鸡脖子蛇、黄花松蛇、乌松蛇、冰蛇等等。窝棚是土房子，爱招蛇、招老鼠，简直可以说是“蛇窟”和“鼠窝”。窝棚四周是蛇，土墙上四周是蛇洞和鼠洞，棚顶的茅草内无时无刻都有蛇探头探脑，做饭时蛇上锅台，夜里从棚顶掉下来是常事。为防止蛇掉下来，他们用塑料布兜在棚顶，但塑料布兜里的蛇一晚上劈里叭拉掉个不停，还一条条地来回游荡着，睡着觉，蛇就钻进

了被窝，冰凉冰凉的贴着肉；惊醒之后，不敢乱动，只好一点一点将身子挪出被窝，再将蛇打死。到鸡窝里取鸡蛋，得先用小棍把蛇敲打走之后，才敢伸手取鸡蛋。窝棚里的老鼠多得成灾，吱吱叫个不停，常常在半夜把他们的耳朵、脚趾和脑门咬破。每天睡觉之前，他们都要把米袋枕在头下……半夜，老鼠就上了锅台，爬到锅里跑来跑去，你叫我嚎，把锅当成了“运动场”……

就这样，俊福和春玲与天斗，与地斗，与野兽斗，每年植树100余亩，用青春和汗水绿化着大山。

张广才岭不能忘记，北大荒不能忘记：1989年，俊福和春玲5岁的大儿子林林被毒蛇咬后，就永远地留在了绿色的森林里。

大山不负有情人，1991年11月27日，俊福、春玲又喜得贵子，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给孩子取名叫“继林”，意思是让孩子长大以后“继续造林”。

春季两腿清露，秋季一肩寒霜，二十载春华秋实，七千余个日日夜夜，俊福和春玲把张广才岭、老爷岭交汇处的十余座荒山和条条裸露的沟壑都披上绿装，都栽上了樟子松、落叶松、红皮云杉，有的已达碗口粗。

有人为他们算过这样一笔帐：俊福20年来共行走22万公里山路，可围绕地球赤道5圈还多。而他们共栽植各种树木50万株，并且经林业部门验收，他们所种树木的成活率、保存率均居黑龙江农垦局林业承包户之首。按每株每年增值1元计算，他们已为国家增值1620万元，而他们20年仅仅拿3.2万元报酬，平均每年只有1600元。

孙俊福先后被授予“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黑龙江省垦区十杰青年”、“全国垦区青年种植能手”等光荣称号，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全国十佳优秀工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责任编辑 刘文)

为老人营造“金色乐园”

——上海敬老院纪实

● 世 耕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国家投资兴建的上海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座敬老院。两幢奶黄色六层高楼的中间，是一方花木扶疏的庭园。进门不远处伫立着一尊柱寿杖，捧寿桃，喜笑吟吟的老寿星雕像，迎接着前来“落户”的老人。

这所敬老院占地10亩，已接纳了250位住院老人。他们平均年龄83岁，最老的已经98岁。老人们在这里过着有规律的集体生活。三餐定时，有荤有素，愿意自己做菜的，每层楼面都有小厨房供他们烹调掌勺。清晨，教师带领大家进行适度锻炼。院方定期为他们举办娱乐游览活动。院内有图书室、康复室、礼堂，供老人们读书、活动、欣赏文艺演出、观看电影。许多老人还根据各自爱好和特长，参加培育花卉、书法绘画、美工设计等活动。6楼特设安养部，供虔诚的佛教信徒安居，他们还可以在佛堂诵经拜佛。

在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老人中，宋炳机、吕惠明是一对年逾古稀的

老夫妻，因为膝下无儿无女，1988年就在福利院里租了一个宽敞的房间，把家具搬来，在这里度起了欢乐的晚年。生活得有滋有味。在一次上海“小荧星艺术团”与寿星的联欢会上，老俩口无意中还认了一位过继的孙子。这位天真活泼又聪明伶俐的小演员，逢年过节经常由妈妈陪同来福利院看望亲爱的爷爷和奶奶。去年下半年，宋炳机突然患病去世。院里干部在安慰老太太的同时，同意她雇了一名保姆来陪伴。今年3月20日，老人愉快地度过了她的76岁生日。

在福利院的“小医院”里有20张病床，医疗设施齐全。一般的老年常见病、多发病不出门便可得到治疗。重病患者及时送往就近挂钩的大医院。一些有经验的医学专家还定期来院接受咨询和为老人看病。退休教师邹剑珠，曾患脑溢血症，入院时几近瘫痪，长期卧床。医护人员用小小银针使她奇迹般地站了起来。通过长期的功能训练，老人已能扶着栏杆慢慢地上下楼梯。

位于上海近郊嘉定汽车城的安亭敬老院，是上海市新建并获得先

进称号的敬老院。5年前，安亭镇政府投资200万元，在汽车城西部盖起了这所拥有多种现代化设施的敬老院。目前已收养48位老人。

安亭敬老院环境幽美，各个房间由长廊串联又互不干扰，做到雨天不湿鞋、日照不挡影；老人不只食宿分设，生活区与后勤生产区分开，特殊护理也与正常护理分开。这是从有益于老人身心健康出发精心设计的。院内外郁郁葱葱，绿化面积达4200平方米，几乎月月盛开鲜花，四季常青。踏进敬老院，让人感到一片勃勃生机。

国家兴办的敬老院、福利院毕竟有限，多数老人喜欢就近入院。因此街道、里弄的敬老院备受青睐。

上海的街道、里弄敬老院原来多数规模小而简陋。近几年，各区政府加大向街道放权力度，积极规划、开展旧区改造，创造文明小区；并且把扩大敬老院规模、改善敬老院设施作为关心群众生活，加强社区文明建设的一项实实在在的措施来

抓。仅1996年一年，各街道办事处就投入4000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改造后的街道敬老院，使用面积达到10000多平方米，床位700多张，相当于1982年到1992年街道敬老院床位的总和。

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上海市生育人口连续几年出现负增长。如今，孩子少了，老人多了。为适应新情况，有些街道、里弄对幼儿园、托儿所作了调整，腾出部分闲置的园、所改为敬老院。

经过扩建的枫林街道敬老院闹中取静，四周景色宜人，院内装点讲究。卧室宽敞明亮，洗浴、洗衣都很方便，还有供休闲与锻炼身体的健身房。

地处市中心商业闹区的打浦街道晚晴苑老人休养村，是上海市拓宽老人事业的先进单位。原来占地只有100平方米，为了增加空间，向下挖地三尺，朝上搭搭放放，借天借地，面积扩大到300平方米，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他们想出新点子，设立一所“日间护理中心”，解决了部分老人的困难，也开拓了社区服务的范围。

“日间护理中心”好比孩子的“日托”。凡离家较近，住宿条件较好，本人身体状况尚可，又能自己行走的老人，每天早来晚归，年龄过大又坚决要求“日托”的由专人接送。

吴凤山是上海公交公司的驾驶员，1974年退休，同孙子、孙媳妇住在一起，房屋条件不错。白天，孙子小夫妻俩上班，曾孙上学，老人独自守家倍感寂寥。经朋友介绍，三年前进了“护理中心”。每日清晨7时30分步行“上班”，傍晚5时左右“下班”。星期假日也不例外。一日三餐不用自己操心，脏衣服换下来有人帮助洗晒干净。他每月退休工资500多元，付了饭费、护理费还有一半左右零花。

吴凤山青年时代当过票友，又喜欢拨弄乐器，兴致来时拉开嗓门



南市区南京东路街道敬老院开幕

唱一段马派“借东风”。

如今吴凤山已85岁了，吃得好，睡得香，居然连续三年连感冒也没有患过。

有一位姓王的港商，因商务忙，7年前不得不把父亲送到漕河泾镇九龙敬老院。开始他心存疑虑：“果真像居民所说的那样好吗？”有一次，儿子回上海来看望父亲，并说要带他去香港玩。老人回答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去香港怕不习惯了。”

老年痴呆症，同心、脑血管疾病与恶性肿瘤是引起老年人致残、致死的三大疾病。患有痴呆症的老人，需要特殊的医疗和生活安排。淮海中路街道办事处在近郊七宝镇建立了一所老人护理院，设有床位45张，收养生活无法自理、家属也难以照管的痴呆老人。他们收费较低，老人在这里得到精心的照料。

老西门街道开办的一个老年护理部，则专门收养肢体瘫痪的老人。现在有21位病人在这里休养治疗。这些老人中，有的半身不遂，吐语不清；有的大小便失禁，卧床动弹不得；有的甚至身上长了褥疮。护理人员以一颗火热的爱心，温暖了这些久病的老人。

86岁的蔡瑞香原已半身瘫痪，又患有严重肺气肿病，臀部还生了褥疮。一年多来，她在医师与护理员悉心治疗与调养下，不仅治愈了褥疮，而且已能自己拿筷子和碗吃饭。

对有些不愿离家或一时进不了敬老院而年事又高的孤寡老人，上海不少街道敬老院兼设“家庭敬老室”。在普陀区，各街道办事处这样的敬老室就有149户。敬老室老人的日常生活服务全由包护组承担，一年四季送饭送菜上门，还定期为老人打扫卫生，代购生活用品。医务人员也随时登门为老人检查、治疗疾病，使老人们得到像在敬老院一样的照料，同样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心。

三

“春风托老所”是兼有“全托”和“日托”的敬老院。专职服务人员不过9人。服务员唐桂英以所当家，白天侍候老人，晚上睡在所里照应老人，粗活细活样样干。有的老人病了，她半夜起来喂药。春节，唐桂英的子女要母亲回家团聚。但她放心不下所里的老人，坚持与老人一起欢度佳节。



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敬老院的老人在练功

也是在这个托老所里，有位90多岁的老人患病，子女因工作忙无法相侍左右，服务员精心护理直至老人咽气，又热情帮助家属料理后事。

有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感谢服务员每天为他上门服务，几年如一日，特地赠诗一首：“人间处处有真情，一片桑榆喜晚晴。孤老不孤独盛世，春风温暖老人心。”

安亭镇敬老院环境美，服务人员的心灵更美。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有位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症的孤老职工，退休后长期由工厂雇人照料。进敬老院后，女服务员朱玲宝全心全意护理他，日以继夜，体贴关怀，整整一年没有发生骨折，直到老人病故。老人徐台生行动不便，又长期患有腹泻症，一天大便七八次，虽经治疗，但疗效不明显。服务员潘金荣替他洗尿布，勤换、勤洗、勤擦身。13年来老人一直住在敬老院，今年已经92岁高龄了。

几乎每个敬老院周围都形成一个包括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的社会服务网络，奏响了一曲社区互助互济的交响乐。

南市区董家渡街道扩建敬老院，既缺地又缺资金。街道办事处负

责人想到附近地段医院的联合病房有不少空闲床位，又有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经过同医院协商，双方合作开办了一所有40张床位的敬老院。资金不够，地段医院200多名职工参加无息集资和募捐近20万元，给予支持，南市区民政局和附近的上海高压油泵厂、上海皮鞋厂也出资相助，使这座敬老院终于办成。

徐汇区斜土街道敬老院的老人卧室，以前只有电风扇，盛夏酷暑老人额头上汗珠直冒，热得难受。经过街道办事处和敬老院多方努力，街道工贸公司主动送来8台空调器，给每个房间安装一台；沪南供电所所长和党、团总支部书记带领一批党、团员技工来院安装电线、增加电容量，并且免收施工费。

街道办事处主任和敬老院所长为解决空调问题，东奔西跑，头上汗珠涔涔，但看到老人们在盛夏个个平安没有一人中暑，心里却是无比的愉悦。

今年年初，上海市由市老龄协会等25个单位共同发起“每人捐赠一本书”支持敬老院的活动中，得到社会各方面热烈响应。第一批就有上百个单位和个人捐赠了一万多册图书，为敬老院的老人提供了丰富的

精神食粮。

在社会给老人捐赠精神食粮的活动中也不乏动人的故事。今年元宵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敬老院的10位孤老收到一份意外的新年礼物：三份报纸的全年订单。这份礼物使老人们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她们共有的“儿子”聂承政的一份孝心。

聂承政做老人们的“儿子”已有3个年头。原来是他一个人经常到敬老院来为老人服务，后来他当上七一运输公司的车队长，又带动车队的20多位青年同事加入这一行列，有空就往敬老院跑。今年春节前，小聂在敬老院修地板的时候，得知某单位今年不再给老人们订报了。小聂将这情况告诉公司领导。公司决定给孤老们订阅三份日报和晚报，还让小聂转告老人们：这三份报纸天天送到，永不间断，将一直陪伴着他们。

四

上海是中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大城市。6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7.4%，平均每年增长1.25%。这不仅反映了老年人口增长之快，城市老龄化速度来势之猛，



嘉定区新成路街道党政领导在探望敬老院的老人
(曾志耕摄)

也给社会托老、养老这一老年社会福利事业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据上海民政部门调查,全市200多万花甲以上老人中,约有30万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其中约半数生活不能自理或基本不能自理;另外还有五六万名老年痴呆症患者。这些老人虽然一部分家庭有条件和能力提供护理,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家庭难挑“上班”、“敬老”两副担子,需要社会提供帮助。估计处于这种境况的老人在20万上下,他们渴望去敬老院,而目前市、区敬老院却人满为患,登记等待入院的人数超过敬老院床位几倍甚至十倍。因此,进一步大力发展敬老院,刻不容缓。这是一项“雪中送炭”的社会福利保障事业,是一项有利于社会稳定、团结和进步的“凝聚力工程”。

除了各级政府兴办敬老院这一主渠道外,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台同胞、爱国侨胞也积极参与老年社会福利事业,有些热心人士把这作为一项慈善事业鼎力支持。昆山正亚工贸公司的一位企业家,慷慨解囊,以数百万元巨款,在上海市郊嘉定区华亭镇购买了土地,目前工程队已进入工地,开始建造一所有2000

个床位、设施与设备先进的敬老院。建成后不仅是上海而且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办福利院。

但是,从上海的情况看,发展敬老院、福利院也存在不少困难。

一是敬老院经费短缺,入院老人拖欠费用相当普遍。有的老人长期重病,原单位无力承担医药费,使原来经济拮据的敬老院加重了困难。由于收费低,收益少,部分敬老院只能勉强维持,谈不上发展后劲。以普陀区的敬老院为例,一年开支约114万元,政府拨款50万元,自收护理费25万元,缺口39万元。经济上捉襟见肘,一些该办的事也办不成。

二是场地难觅,无法扩建、新建。人口密集的静安区至今没有一所区政府办的社会福利院,区有关部门有意建院,但在本区难找“插针”之地。上海西南有一个新村居民小区,数年前便想办一个街道敬老院,然而在新村内就是找不到建院地块。

三是服务人员待遇微薄,外流增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单纯要求她们作无私奉献。长此以往,敬老院里只能靠“年轻的老人”照顾年

老的老人。但兴办现代化的、服务一流的敬老院,没有一支年轻、有朝气的行政管理和护理人员显然是不行的。

看来,从政策上和具体措施上进一步支持社会护老、托老这一福利事业为老人营造“金色乐园”,是国家和全社会都需要重视的问题。相信随着存在问题的逐步解决,这一宏伟事业的前途将更加宽广。

(责任编辑 林 跃)

本社迁移社址 敬告读者

本社现址文津街7号(北京图书馆分馆)房屋维修,自8月1日起,本社将迁至新址——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柏林寺院内办公。

邮编:100007

电话:64031144 转炎黄春秋杂志社(请注意1997年7月20日后启用)

驻华使馆的中国卫士



● 陈淀国

日本《中国巨龙》周刊3月19日载《奇特的中国武警部队》一文中说：

“在中国武警部队中，有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别部队。这就是担负使馆安全警卫任务的外使支队。”

“自1960年以来，世界各国驻外使馆共发生凶杀、骚扰、爆炸、火烧等事件2000多起。而世界各国驻北京的使馆区却显得安全而宁静，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外使支队……”

从首都天安门，沿着宽阔笔直的东长安街，向东过建国门立交桥，朝北拐去，就到了被称为“国中之国”、“浓缩世界”的外国驻华使馆区。

这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如同美丽迷人的大花园；这里，安祥宁静，友好和睦，胜似民族众多的大家庭。

走近这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使馆区，你会发现，每个庭院，每座大

门，每堵围墙，都有一片温馨、庄重的“橄榄绿”，都有气质不凡、风度翩翩的武警战士守卫。

他们，顶严寒，冒酷暑，迎朝霞，送夕阳，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守卫在这里。为了各国朋友的安全，为了各国朋友的幸福，用青春、用汗水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友谊之歌、奉献之歌。

我代表中国

在外使支队这个光荣群体里，每一名干部，每一名士兵，都装着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代表中国！”

这5个字，沉甸甸，光闪闪，是他们使命的誓言。

他们总是像雕塑一般，端端正正、规规矩矩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丝不苟，认真执著，对周围环境，对进出人员，对来往车辆，甚至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了如指掌。他们坚定的信念是：确保绝对安全。

支队领导记得：20年前，“五一”前夕的一个中午，在前苏联驻华大使馆正门前，李登贵全神贯注地在执行勤务，他发现一男青年的手提旅行袋内，窜出缕缕白烟，正向使馆跑过来。

“站住，不许进！”

这位训练有素的四川大汉，箭一般跑了上去，紧紧搂住罪恶分子双臂，用力去夺藏有爆炸物的旅行袋，不管穷凶极恶的歹徒叫喊：“炸死你”“连尸首都找不到”的威胁恫吓，李登贵就是不松手，直到最后“轰隆”一声巨响……

外使支队官兵，不仅有着李登贵那样崇高的牺牲、奉献精神，而且个个具备很强的政治头脑，很高的政策水平，正像周恩来总理称赞他们那样，“既是哨兵，又是外交官。”

那年夏天，正在某国哨位上执勤的高宝贵，很有礼貌地把3位外交官让了进去。不料，在他们身后，还尾随着一名中国青年。他，留着一头卷毛发，东望西望，企图乘机“越

境”，小高见后，毫不迟疑，三步两步跨过，伸开双臂将他搂住。那人紧紧抓住铁栏杆不放，并放开嗓门嚎叫不止：

“快救人哪！”

“武警动武了！”

“我要到你们‘天堂之国’去！”

……

听到呼叫的那三位外交官重又折回，不问青红皂白，硬要拉“卷毛”进去。学过擒拿格斗的高宝贵，功夫很不错，使出混身气力往外拖。双方僵持不下，惹恼了外交官，挥拳将小高打得鼻孔出血。其实，他们三个洋人加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真恨不得来个“以牙还牙”，打得他们连滚带爬，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强压怒火，没有还手，以防事态扩大，他招呼邻近哨位战士，赶来助战，三下五除二，立刻把“卷毛”扣押起来。事后，由中国外交部出面，通过外交途径对其野蛮无理行径提出严重抗议。

春节那天，全城沉浸在一片节日欢乐之中，当时尚未做出“禁放”规定，某国使馆人员，带着他们的孩子，也在尽兴地燃放烟花、爆竹，还不时地将“麻雷子”、“二踢脚”等扔向马路，不但纸屑到处飞溅，还给来往行人造成威胁，有的甚至打在哨兵身上。他们的恶作剧，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有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拥过来非要对他们“教训教训”不可。这时，哨兵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一面主动上前向栏杆外的人群，进行热情、耐心的劝阻，一面义正辞严地对洋人这种无理取闹的侵权行为，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拿起电话，向上级做了汇报，通过外交手段，使这不愉快的闹剧，得到圆满解决。

夏天，李榕军刚刚上哨，便有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她，三十来岁，一头金发，蓝T恤衫，超短裙，离挺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警官先生，我是×国人，要进这里的使馆办事。”女士操着不那么流利的英语，主动搭话。

不知是直感还是印象，李榕军总觉得对方那笑容，那神态，尤其是那无法掩饰的紧张的、做作的表情，产生了怀疑，便故意装做不懂英语，比划着让她出示有效证件。

“哎呀呀，对不起，全忘带来。”

“听不懂你的话，你会讲汉语吗？”李榕军稍稍思索，猛然问道。

“NO！NO！”这位女士，着急地马上回答。

“既然不会汉语，怎么听懂了我的汉语？”

“这……这……”

这位从天津赶来的“外国女郎”，几分钟内就“裁”到这普普通通的“小武警”手里，她被“请”进了值班室……

一个北风呼啸的清晨，宁静的使馆区刚刚醒来，正在哨位上的杨军，突然见领事先生喜形于色地从使馆大楼匆匆走来，用汉语兴奋地告诉杨军：

“海湾战争打起来了！”

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战争刚刚爆发，还未听到国内报道。

杨军，就是在这个哨位上，曾经因为抓获企图闯界的在逃犯而立二等功的芜湖老兵，此刻沉着冷静，头脑清醒，凭着平时的学习，凭着多年的经验，凭着我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友好国际原则，胸有成竹地告诉他：

“发动战争，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这位走南闯北的武官，听到这样外交辞令般的回答，望着跟前这个似乎还带着稚气的年轻卫士，连连头点称赞。

跨越国籍的友情

警卫战士们从春到夏，从秋到

冬，以其无可挑剔的服务，增进了了解，赢得了信赖，成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籍的知心朋友。

这里是西亚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随着一声门响，大使先生不知是换换空气，还是对这罕见的雪景发生了兴趣，走出室外兴致勃勃地观赏着，遥望着。无意中，哨位上的陈军，闯进了他的眼帘：头上，顶着雪；身上，堆着雪；两只脚被厚厚积雪盖住，他却精神饱满地守候在岗台上，那么专注，那么认真。

大使先生被眼前陈军的形象吸引了，打动了，他走过，指着岗亭，亲切问道：

“怎么不站在里边？”

“雪天，看不清，那样更会影响视线。”

“这么冷，受得了吗？”

“谢谢大使先生，习惯了，没事。”

大使先生没再多问，默默地地点头，便匆匆返回楼内。不大工夫，他又来到陈军身边，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深情地递了过来：

“为了我们，你辛苦了！”

“不，这是我们的职责。”

这何只是一杯咖啡呀？里边溶着多少信赖，多少赞誉，多少中阿两国人民的真情啊！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夜里，大使先生都要送上一杯浓浓的热咖啡。直到离任，仍念念不忘那个雪天给他留下的美好记忆，并主动提出和日夜为他们站岗放哨的中国卫士合影留念，带回祖国。

这年的3月28日，脱去冬装的北京，正是春光明媚，那天上午，某驻华使馆的大门旁，增添了一道“风景”：一对火红耀眼的大喜字，端端正正地贴在两侧。院内，还不时传出欢快悦耳的乐曲，吸引了不少马路上的过客。

钟声响过10下，一对热情洋溢、黑皮肤的青年男女，穿着十分漂亮、潇洒的结婚礼服，伴着莫扎特

《费加罗的婚礼》轻快旋律，缓缓走出。

但，出乎意料，新郎新娘却没有走向前来祝贺的人群，而是径直来到大门口，操着不大流利的汉语，不住地说：“谢谢，中国警官，一流的！”同时，新娘把手中的鲜花，新郎把托盘里的喜糖，一起捧给了正在执勤的谢红兵。

小谢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手脚无措。不知是该谢绝，还是该收下。可心里却像刚刚掘开的温泉般，暖融融，热乎乎，更加感到自己岗位的光荣、自豪。

来自天南海北一百几十个国家的外交官和他们的眷属们，之所以对这些普普通通的武警战士，如此热情，如此亲近，正是他们长时期用一片片真诚的心换来的。

这是一封远涉重洋，从加拿大渥太华寄到我国外交部门的信，上面写道：

我在贵国使馆区，不慎丢了皮包，内有价值上万的照相器材，一条项链和700多美元，还有一张30万日元的信用卡。使馆区执行公务的一位警官，捡到后交还给我。我想送他一点谢礼，但他怎么也不收。问他姓名他也不说。这位令人钦佩的中国警官有颗比金子更美好的心……

在外使支队，像这样拾金不昧、拾物不昧的感人事迹，实在太多了。小到一条钥匙链、一把指甲钳，大到一台摄像机、一部移动电话……

去年4月的一天，某国使馆专员史密斯夫妇，带着他们两个小儿子杰克和约翰，到不远的亮马河畔散步。

不料，就在杰克哥俩伸手采摘一朵小花时，一脚踏空，身子前倾，手拉手双双滑进河中，挣扎着哭叫起来。

刚好，正在巡逻的三大队哨兵温鹏程、陈红兵闻声赶过来，见此情景，连警服都没顾得脱，“叮咚”“叮

咚”同时跳进河中，奋力向正在下沉的孩子游去，两个人，一手托一个，终于把他们救出水面，送到岸上，又帮助进行处理。当史密斯夫妇见到自己心爱的小儿子死里逃生，重又回到身边时，犹如一场恶梦初醒，又惊又喜，夫妇俩向支队送来了一面锦旗。

不和谐的音符

在这个浓缩世界，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时不时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在使馆区，不只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外交官从哨兵跟前走过时，装作不留神的样子，把钱包掉在地上。尽管战士叫了又叫，仍然无所“察觉”地朝院外走去，过了一阵之后，这位先生重又折回，出乎意料钱包仍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礼貌的哨兵，这才主动帮他拾起……

这样的“测验”结果，对于这些金钱至上的洋人们，称赞的同时，更有几分“不可理解”。

3月20日，下午3时，新兵杨永森上哨不久。该使馆的一辆豪华轿车从外面驶来，不料在他跟前缓缓停下。商务参赞走下车后，主动热情打招呼：

“我非常喜欢中国士兵。”

“谢谢。”

“为了我们，你辛苦了。”

“没什么，应该做的。”

说着，他从手里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说是一点“谢意”，硬塞给了小杨。

这个仅有三十几元月薪津贴的河南籍农村战士，此刻，面对如此丰厚的礼金，丝毫没有动心，还不住提醒自己：“这钱，一分也不能收！有损国格、尊严的事，坚决不能做！”便推推搡搡，追到车旁，从窗子丢了进去。就在这一刹那，他无意中猛然发现，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一位金发女

郎，擎着照相机，却一无所获。

留在小小哨位 的辉煌春秋

就拿敬礼、验证来说吧，这是每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动作。可是在这里，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战士们不但给它注入了新的内涵，而且给它赋予了深层意义。

按照通常国际惯例，代表一个国家的使馆卫士，只给过往的大使、武官等及挂有国旗的车辆致礼，其他外交人员，却不能享受这一礼遇。该敬礼的，没有敬，就是失误，就会让人挑剔。不该敬的，敬了，费力不讨好，也会让人讥笑。

验证，也是如此。看似平常，其实很复杂。在这小小哨位，能够接触到的有效证件就有30多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用途。这就要求哨兵，必须在短短几秒钟内，做出准确判断：什么人、什么情况，应持什么证件；有什么人该验证；什么人必须验证……该验的未验，不该验的验了，都会酿成不良后果。

那是个星期日的上午，一位华裔副领事走马上任，由于是假日，有关资料尚未送达。一丝不苟的哨兵，把他当成了中国公民，查验了证件，造成误会。尽管发觉后，当即向使馆做了解释、表示了歉意，结果没有多久，我国驻该国大使的夫人，仍被借故拦在使馆门外4个小时……

所以说，使馆门前小小哨位，万国旗下，没有“小事”可言，动辙就是“国际影响”。

任务要求每个上岗战士，都应该成为“使馆通”、“世界通”。一中队的孙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入伍前的“山伢子”，过去连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都从未见过。可是二年后的今天，却成了响当当的“难不倒”。在不久前的一次执勤知识擂台赛上，大显身手。当你亮出红黄绿

三种颜色的条板，按照不同顺序摆放，他会立即告诉你，那分别是几内亚、马里、埃塞俄比亚的国旗。首都分别在科纳克里、巴马科、亚的斯亚贝巴。和我国建交时间分别是：1959年10月、1960年10月、1970年11月……

孙雷从小好学上进，这一百几十个国家的国旗、国徽、国花、首都、地理、人口、风俗、信仰、建交时间、车牌号码、人员状况等等，全都有条不紊地“装”进了脑子里。

他，荣立了三等功，脚下这个小小哨位，一直被总队评为“红旗哨位”。

每一个小小哨位，都是一部多彩人生的光辉史册。迎日出，送晚霞，风风雨雨，年年岁岁，记载着平凡，记载着单调，同时更记载着一个个有志青年，留在这里的感人肺腑的诗篇。

黎明，沉睡的大地还没完全苏醒，和往常一样，使馆门前前来办理出国签证的人，早已排成了长蛇阵。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是探亲，有的是打工，有的是经商，有的是考察。可是，每次能如愿的却寥寥无几。多少年的积蓄，多少年的企盼，就待最后这一“关”了。

于是，托关系，找后门，不惜重金交换，不顾少女廉耻……就成了热望早日圆梦出国人的“捷径”。

“你好，中国朋友！”

“你早，武官先生！”

热情好客的武官，每逢从门前走过，总是主动同周到服务的哨兵打招呼。班长王春富，已在这里整整度过了三个春秋。

不料，这一习以为常的小小举动，却被排在外面的一位戴着眼镜的姑娘，看得清清楚楚。她，如获至宝似的，悄悄凑到王班长身边，人不知鬼不觉地递上一个信封，亲热地讲道：

“看来，你同使馆特别熟，行个方便，通融一下，我已排了二个星期

了，这是一点心意，请收下。”

这种情况，王春富遇得多了。仔细打量一番，那装束，那神情，不像是“那种人”，只是出国心切，等得不耐烦，才做出这样选择。在断然谢绝的同时，说服教育了事。

大个子战士王立平，今天有点走神，整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本来，他那个头标准，形象也“帅”，一向是上“正门哨”的角色。不料，一次擒拿格斗训练中，嘴唇划了道长口子，伤愈后留下了一条明显的疤痕。从那，就只在这里站“围墙哨”了。

眼看就要告别部队离开使馆区，当领导一次次问起还有什么希望、要求时，王立平含着热泪，把藏

在心底深处许久的请求提了出来：

“再让我站一次正门哨吧？”

此刻，迎着朝阳，浴着晨风，满怀欣喜、激情的老兵王立平，依然站在他那熟悉的哨位上，两眼闪动着坚定自豪的目光，举起臂膀，面向前方，代表伟大的共和国，敬上最后一个军礼！

也是在这即将离别的日子，与中国哨兵朝夕相处三载的某使馆一秘和夫人一道，来到正在执勤的战士蒋立军眼前，语重心长地说：

“中国朋友，我任期已满，就要回国，特向你们表示诚挚谢意！”

说罢，向着哨兵，向着哨位，深深地鞠了一躬……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

● 满素洁



著名社会学家 吴文藻

寂寞经年 终被人识

1996年11月19日，我应邀参加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会。尽管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中央民族大学的礼堂却挤满了人。若不是第一排留着记者席，恐怕我也得跟那些学生和远道赶来的教师们站着旁听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宁可站在过道上，也要参加一位在12年前就去世的老人纪念会呢？

为了方便读者的记忆，让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介绍吴文藻吧。他是著名作家冰心的丈夫。我这样介绍吴文藻，并不是想借冰心耀眼的光环为吴文藻的形象涂上一抹亮色，而是想说明冰心在作家群中受人爱戴而吴文藻在社会学界也同样受人景仰。我把他们并列提出的原因是想说明他们的光辉同样耀眼，只不过他们像处于两个不同瞬间的太阳，一个在云层里面，一个在云层外面，而吴先生就是在云层里面的

那颗太阳，不轻易露面，但仍然饱含着令人眩目的霞光。

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纪念会，有关该到场的人都到了，冰心却由于住院未能到会，她委托二女儿吴青代她发言。冰心的发言稿说：“今天大家在这里聚会纪念文藻诞辰95周年，我感到十分欣慰，特别使我高兴的是30年代就和文藻和我一起共事的老朋友雷洁琼，以及他的老学生，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都能参加这个会。他们都是这些学科在中国历经沧桑的见证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当今社会得以发展和壮大。今天大家在这里开会，缅怀和表彰文藻对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也就是对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取得成果的庆贺。”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也在会上发了言。1931年秋，雷洁琼应吴文藻之邀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当时吴文藻是系主任。1937年，

抗战爆发，雷洁琼辞职去了江西从事抗战工作。她说：“我在吴先生亲自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吴先生的学识渊博，品格高尚，使我对他非常景仰。”

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同志说：“我是抱着非常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参加这个会。作为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一个人，我从实践中体会到，吴文藻先生对中国的社会学、对中国的民族学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我想对中国社会学来说，吴文藻先生是奠基人之一，作为民族学来说，他是奠基人。”

1985年春，吴文藻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然接受了第二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审稿工作，奋不顾身地把4篇几十万字的学生论文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完，还写下了非常详细的评语和修改意见。

就是这次过度的劳累一下子摧垮了吴文藻，他在病榻上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历程便扔下85岁的冰心驾鹤西去了。吴文藻去世后，新华社发了他逝世的讣告。冰心收到了国内外发来的170多封唁电和唁信。

周培源这样写道：“文藻同志和我在清华学校同窗多年，他虽高我一级，但彼此情同手足，他是我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长期忽视，直到今天才受到尊重。正需要他时，他又溘然长逝。哲人其萎，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千家驹说：“我和文藻先生接触不多，但对先生对社会学的贡献，一向是景仰的，同时对文藻先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也一直是愤愤不平的。文藻先生遗嘱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使我没有表示哀思的机会。”

袁鹰说：“文藻先生笔耕一生，对学术界建树卓著，晚年屡遭颠沛，而报国之心不减，是我们后辈的楷

模。”

读完这些唁电和唁信，冰心进一步发现吴文藻有这么多熟悉他、理解他事业的人。尽管跟吴先生生活了56年，但冰心不敢说她对丈夫事业的理解能有他的同行和学生透彻。冰心感慨道：“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摆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

不仅冰心不太了解丈夫默默从事的是这样对国家民族发展有益的事情，而且他的儿女们大都对父亲几十年的所作所为知之不多。大女儿吴冰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和他的事业。”只是长子吴平对父亲的事业还有些了解。一天，吴文藻问吴平：“宗生（吴平原名），你学建筑的时候，没想到你应该学我们社会学？”当时吴平不太理解，吴文藻接着说：“建筑学本身就是环境科学，建筑物要有人在里面活动，所以你要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

这次谈话给了吴平极大的启发。吴平举例说，在设计宾馆时，他首先要搞清宾馆与客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知道客房应该摆哪？卫生间摆哪？餐厅摆哪？卡拉OK歌舞厅摆哪？爷俩的谈话发生在“文革”结束后的一天，而中国对建筑学是环境科学的提法出现在80年代早期。这次谈话不仅使吴平认识到父亲是个旁学也很精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意识到父亲所研究的社会学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作用。

浓浓的社会学情结

吴文藻曾在1982年写过一篇自传。在这篇自传里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女吴平、吴冰、吴青只字未提。恐怕出于无法回避的原因，他提到

了自己的婚姻状况，但只用了三两句话介绍他和冰心的相识和结合，而通篇谈的都是他的社会学情结。

1901年，吴文藻出生于江苏江阴县夏港镇。1923年，吴文藻完成清华学堂的学业后赴美留学，入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默学院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学习；1925年夏获该校学士学位，同年秋天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1926年以一篇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论文获得硕士学位；1929夏又获哥校的博士学位，同时还获哥校近10年来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

按理说，吴文藻完全可以选择热门赚钱的专业以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可他却偏偏选择了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的社会学。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给18岁的吴文藻思想上以极大的震动，使他不断思考着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国未来的出路等问题，因此，赴美留学的时候他的心中早已拟好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蓝图。他要研究中国的现状，以期从落后愚昧中找到一条通往光明之路，他想通过社会学实现自己心中的救国理想。

吴文藻刚回国时，中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还处于模仿照抄阶段，大学里开设的这些课程基本上用的都是外国教材，讲的都是外国事情，没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即使是中国教员，也用洋文讲解这些课程。这种情况使吴文藻忧心忡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社会学、民族学怎么能行？

因此当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派他担任“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的教学工作时，他首先对这三本教材进行了改革，用中文进行了编写，并在课堂上用汉语进行讲解，打破了以前用英文讲解的惯例。

费孝通在纪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大会上，就提到吴文藻的这个改革。他说他1930年

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系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吴先生能用本国普通话讲西洋社会思想史很不容易，因为西洋社会史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得多。

教学改革后，吴文藻并没有止步不前，他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成为中国持有此主张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始而由外国人由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因此他要找到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学，并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研究。

而这种有效的理论框架就是英国功能学派理论，它是吴文藻回国后经过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思考、比较确定下来的。费孝通说：“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直至今日看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费孝通的话概括出吴文藻的主张对今日社会学及其姊妹学科的研究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其实，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也一直在沿袭吴文藻过去为改革社会学所提出的“中国化”之路，因此，费孝通又说：“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感激吴文藻老师为我们大家开创出这一条改革社会学，使其能适应不断在发展中的新中国的道路。”在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上，费孝通尤其强调要从吴文藻老师所指出的路子上去解决、充实和提高社会学内容的问题。

吴文藻回国后没过上几年舒心

研究的日子，动荡不安的社会影响了他的诸种科研设想的实施。尽管“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他把科研、教学阵地从北京搬到了云南，但他的“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导师制”的构想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却无可奈何地搁浅了。

1938年，费孝通从伦敦返回祖国。在吴文藻的支持下，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附近设立一个研究工作站，使费孝通得以继续进行实地农村调查，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1940年，吴文藻离开云南去重庆，着手支持李安宅和林耀华在成都的燕大分校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和开展研究工作的据点。正如费孝通所说的那样：“昆明和成都两地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应当说是吴老师为改造当时的社会学在抗战时期取得的初步成果。”

1946年，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约吴文藻担任该团外交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吴文藻的主要职责是一方面了解美军总部对日管制的政策和措施执行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战后重建的情况及形势。1950年，吴文藻向代表团团长提出辞职，历经艰险后才得以在1951年秋带领全家回到祖国的怀抱。

吴文藻在自传里对1938年到1951年这段生活做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自己在此期间没写多少文章，没有多少成果。然而，当吴文藻返回祖国，以满腔热情投入他的社会学研究时，他又被错划为右派，靠边站了。直到1979年，吴文藻的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可那时他已近80岁的高龄，他的科研黄金时光已成昨日黄花。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吴先生并不服老，他把可能利用的时间全都利用起来。在自传中，他写道：

“由于多年来我国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因此，80年代初各种学术研究一恢复，他就著书立说，阐述他的社会学观点。在参加重建社会学座谈会之前，他亲自撰写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稿，明确提出要建立为祖国四化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和民族学体系的主张，谈了他多年想谈而没能谈的问题。

他在国外的学生和朋友给他寄来了各种有关社会学的书籍和杂志，吴文藻不顾自己患有白内障疾和有心脏病的身體，也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拼命地阅读和摘录了大量资料，他又在助手的协助下写下了《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新进化论》等有分量的论文，受到学术界推崇。尽管他很久未出国门，但对社会学的世界动态却了如指掌，令同行惊诧不已。

吴平说，那时父亲更是很少过问家事了，他在家话很少。吴文藻真正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他很少应答家人的话，别人逗他，他只是笑一笑，象是反应迟钝似的。可是当他的学生来了，或跟人谈起他的社会学时，吴冰说他的眼睛就会变得 alert（有神）起来，说话也有了底气。

吴文藻一心想搞好中国的社会学，他自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但他难以像以前那样选派学生出国，所以他苦心攒了3万元，在他遗嘱中说明去世后捐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作为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奖学金，同时他还把珍藏了多年的几百册图书捐给了国家。

费孝通说：“吴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对



吴文藻、冰心夫妇（前排左一、二），费孝通（后排左二）

于我们的安排，的确是像家里长辈一样尽心。”

对吴文藻来说，事业第一，家庭第二。他把家里的一切都推给了冰心，因此，冰心那柔弱的肩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吴文藻甚至节假日也到办公室工作。有一天，民族大学广播说老教授吴文藻礼拜天还勤奋工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应该向他看齐。吴文藻听到后很不安，他赶忙跟学校讲不要表扬他。他说：“我家里拥挤，我这样工作是几十年的习惯，我愿意到办公室；另外，我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如果你们广播我星期天到办公室工作就是给中青年教师带来压力。他们家务多，负担重，不能跟我比。”

然而，对于自己的学生，吴文藻的用心要比对自己的孩子多得多。费孝通说：“吴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对于我们的安排，的确是像家里的长辈一样尽心。”他对诸如派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择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

安排。

吴文藻较早送出国的是李安宅同学，他先派李安宅到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跟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学习，后又到美国东部的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派林耀华到美国一流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把费孝通引荐给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功能学派大师马凌诺斯基当学生；送黄迪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把瞿同祖和冯家升推荐给著名学者魏福特等。

吴文藻从不怕学生超过自己而淹没了自己，也从没因为学生比他多出科研成果而感到不安或没面子。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怎样让他心爱的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吴冰说他非常钦佩父亲这一点，当他发现国内的学术条件以及自己的能力都不足以给那些学生以长足的发展时，他就送他们出国，吴冰认为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有他父这样宽广的胸怀。林耀华在纪念会上说：“我是吴先生的老学生，吴先生一生为社会学、民族学，特别为中国民族学事

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写出了许多著作，特别是对学生的栽培教诲方面，无论是二三十年代对我们老一代还是直到八十年代对后起之秀们的培养教育，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吴文藻送出去的学生回国后，大都成了民族学和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费孝通用功能分析法把他的“江村经济”资料写成了《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在国内外都有很高评价。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为此书写了长篇“前言”，说“此书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工作和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书呆子、交际花、宝塔诗

人们对吴文藻和冰心能够结成伴侣而且始终相爱不渝甚感诧异，因为他们是那样截然不同两种性格的人。吴青说父亲重理性思维，为事客观公道，而母亲重感性思维，富于想象，易感情用事。

冰心19岁就已成名。1923年在去美国的客轮上，人们都不断地

恭维早负盛名的冰心的才气。惟有吴文藻对冰心的才气全然不加理会，反而列举了几本冰心未曾读过的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而且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如果到美国不多读一些书，那就算是白来了。吴文藻这些苦口良言深深刺痛、警醒了冰心的心，但也是这些富有个性的诤言使吴文藻在冰心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手后，冰心收到许多友人的来信，别人的信冰心都用波斯顿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明信片回复，只对吴文藻写了一封信。拿吴文藻的话来说，从此两人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1926年，冰心获得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文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回到燕京大学教书。1929年夏天，吴文藻和冰心喜结连理。冰心在美国读书时曾照了一两张照片寄回国内，慰藉父母的思念之情。1930年，冰心母亲过世后，吴文藻就从冰心父亲手里要来一张冰心的照片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冰心开玩笑似地问她这是一件摆设还是每天看一眼呢，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然而，当冰心把自己的照片撤出换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时，吴文藻因一门心思钻研学问，一连几天都浑然不知。当被告知，他还责怪冰心，说何必开这种玩笑。至于吴文藻把丁香树当成是香丁树，上商店买点心萨其玛说成买“马”，把双丝葛的面料说成是羽毛纱的笑话更是不断。冰心曾把这些笑话编成宝塔诗用来逗乐。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因为吴文藻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所以冰心说原来是清华教育的他。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看到这首宝塔诗后，笑着填了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吴文藻就是因为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事业上，才在生活上屡做糊涂事，正如冰心在纪念吴文藻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我深深体会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

吴文藻虽然生活上马马虎虎，但工作上却十二分的认真。就是“文革”中在中央民族学院厕所时他也未改认真的态度。他把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男厕所小便斗底下和蹲坑上的各种锈迹他都不放过。刷干净后，他告诉造反派：“我刷完了。”造反派说：“刷完就刷完了吧。”吴文藻接着说：“是不是看一看？”造反派一听就来气了，这么脏的地方也让我看，马上说：“不用看了。以后早上刷3遍，晚上刷3遍。”认真的结果是加重处罚。

吴文藻“文革”时受到批判还因为造反派认为他是社会学的鼻祖，因此首先必须把他打倒。吴文藻对造反派说：“学术是让批判的，但是你要在看过我的文章后才能批判我。”造反派说你这是对抗。吴文藻仍不紧不慢地说：“这样吧，我把我的文章名字写给你，哪年出版在哪发表都有记载，你看完后再批判我，我接受你的批判。”造反派说你侮辱我，于是加重对老头的处罚。

最让吴文藻高兴不已的，是他和冰心在“文革”最艰苦的日子里两人能在一起，互相照应，互相关心。在湖北沙洋民族学院干校的时候，两人一起去劳动，一起种棉花，一起摘棉花。后来又因为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两人又一起被调回中央民族学院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下半部分。当时费孝通、邝平章等人与吴文藻他们共同组成了编译室。尽管吴文藻在国外留学多年，但翻译起来还是一丝不苟，精雕细琢，字斟句酌，因此

进度要慢，冰心是急性子，译得很快，但有些马虎，有些地方没有吴文藻来得精确。这段时间，编译室不仅译完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和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尼克松来中国时对毛泽东那么熟悉他的《六次危机》深感惊讶。他哪知道中国有那么多高水平的学者。

子女眼中的父亲

对于在家里唯一能够以男性的角度与父亲进行对话的吴平来说，父亲的很多事情都耐人寻味，值得回忆。他说他小时候因为淘气，因为学业不用功，没少挨父亲的打，尤其别人干不成的事他都想试一试，不撞南墙不回头，老捅娄子。吴文藻急了就打他，可他只会揪耳朵。做事极有规律的吴文藻也就总揪一边。后来有人看到就告诉他，不要老揪一边，否则就会一边大一边小。

说到挨打，吴平说他不恨他父亲，因为挨打印象没有父亲帮助他的印象深。在昆明时，吴平因患牙病，每周要看一次牙医，而且走的都是山路。吴文藻那时连个自行车都不会骑，却每周骑着毛驴带着吴平去看病，说到这吴平眼睛已经潮湿了。

吴平从五个方面总结了父亲的父亲：（1）执教严谨；（2）学识渊博；（3）处事认真；（4）为人宽厚；（5）生活简朴。同时他还列举不少这些方面的例子。吴平对父亲的学识和人品是极为敬重的，他说，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默默耕耘的治学者。他不是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而是根本没有这个念头，因此也可以说父亲淡泊名利。

吴文藻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吴焕若在镇里与人合开小米店，生活很清苦。吴文藻考上清华学堂还是同宗吴漱英代他筹了旅费，他才来

到了北平。了解吴文藻的人都知道他积攒3万元作为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奖学金多么不容易。吴文藻靠工资生活,没有什么稿费。平日节衣缩食,尽量减少开支而积攒成这笔钱。

兄妹三人都提到父亲经常用旧挂历纸作论文卡片,稿纸从来都是两面用。百货大楼他从来没去过。所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由吴平亲自买来。他一顶帽子能戴十几年,一件衣服能穿十几年。一次吴青给他洗衬衫,洗完后就那么一抖,衣服的后身就一分为二了。

吴文藻去世后也没给儿女们留下什么遗产,给唯一的儿子吴平留下了的也不过是一些旧衣服,而且不少是补过的。如今,吴平还保存着父亲这些遗物,他把父亲的衣服穿在里面以体验父亲的存在,寄托对父亲的哀思。

吴冰(北外博士生导师)跟记者多次谈起父亲,每次都是眼含泪水,声音不时哽咽。她说父亲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用功,非常认真的人,他一门心思在学问上,对自己的事情很少动脑筋去考虑,对有关自己利益的事情也反应不敏感,从不把自己放在他人面前,他也绝不说人坏话,也不对人评头品足或与人一争长短,为人极为宽厚,而且无论做什么事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什么而改变,对人从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力争对所有人都公平,不偏爱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吴文藻的这一点,全家人有目共睹,包括儿媳陈凌霞和家里的小阿姨对老人公平待人处事都非常

敬重。

吴冰小的时候特别害怕问父亲问题,一般有问题都是问妈妈,因为要是问父亲,事情就麻烦多了,他首先会批评你问题提得不对,角度不对,也不科学,然后再详详细细娓娓道来,可你那时已经没有耐心了;有时问母亲,尽管问题提得不是很清楚,但母亲都会做出极快的反应并告诉你答案。但吴冰说等她工作后,才体会到父亲详细讲解的好处。在讲文学时,吴冰经常涉及到一些哲学、历史、政治等问题,父亲追根溯源的解释给她讲课帮了不少忙。吴青说甚至母亲在写文章遇到这类问题时,都是跟父亲商量,向他请教并由他把关。

吴文藻看书认真并喜欢在上面做些批注,吴冰说这是父亲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他在看书你就会看到他拿着一支红笔。有一年夏天外出避暑,得知小说《暴风骤雨》获了文学奖,从不喜欢凑热闹的吴文藻居然也捧起一本看起来。吴冰注意到,父亲就是看这样一本非专业书也是非常认真,拿着一支红笔不时划着。一次,吴冰发现上幼儿园的小儿子也拿着一支笔在报纸上划着,她好奇地问儿子这是在干什么,他说是学爷爷看报。

然而,就是这么认真的父亲,对自己的生活却缺乏必要的认真。吴青苦笑说,Daddy(老爸)连无线电都开不好。每次他们都是把他要的频道调好,第二天早晨他一打开就是了。如果你听了收音机不把频道调回去,等他找不着时他就会生气。吴青说父亲很少想到要鼓捣这些玩艺,可母亲就不同了。怀有一颗童心

的冰心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心,什么东西都要拆开看一看。一次,她把一个小闹钟拆了。当她饶有兴趣地看完钟里面的全部结构,想再还原时却装不上了。

吴青说尽管父亲对他们兄妹三人的关心没有对他的学生那样细致,但晚年的父亲还是非常关心家里的第三代,很喜欢隔辈人。一次外孙陈刚患病要到积水潭医院,吴文藻也忙着跟过去,急着问吴青怎么样,要不要紧。

吴文藻时时刻刻都替别人着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如此。他在遗嘱中就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亲属不要请假来京,并嘱咐儿女们不要因为他而影响他们的工作。当时吴冰是北外英语系的副主任,要到办公室值班。父亲去世后那几天,同事们都劝她回去,但吴冰还是坚持来值班。1985年9月24日清晨当吴文藻去世的消息传到家时,吴青(北外英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正要去上课,尽管悲痛万分,她还是坚持上完了6节课。即使给父亲送别时,吴冰和吴青也是选她们都没有课的时间。吴冰说,如果父亲知道因为他的事情而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他会心不安的。说到这,吴冰已泪如雨下。

了解吴文藻和冰心的人都知道两个人尽管性格不同却相濡以沫走到一起的原因,那就是两个人都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者,都热爱中华民族;都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对生活都没有过高要求,粗茶淡饭即可;但为祖国的事业却不惜一切,燃尽自己最后一份光和热。

(责任编辑 鲁人)

我所知道的 爱新觉罗·溥任

● 曹玉玲



1978年我调任西城区厂桥小学校长期间，金友之就是厂桥小学的教师。

金友之，又名爱新觉罗·溥任。1918年出生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醇亲王府（今宋庆龄的北京故居）。光绪皇帝是他的亲伯父，醇亲王载沣是他的生父，溥仪（宣统皇帝）是他的大哥，溥杰是他的二哥。

金老师告诉我，他从出生到1951年他父亲醇亲王载沣去世，一直同他父亲住在一起。载沣是在辛亥革命后，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后退居府邸的。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来北京时，特地到醇王府访问，并对他父亲知时达务，加以勉励。

北京市市长彭真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载沣没有参加过敌伪活动，醇亲王府全部住房不要采取没收的办法，可按私人住房出售给国家，作为国家准备成立的“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用房。至于溥任家族的住房，同样按国家规定的市价售给他所需住房。（现中央卫生部机关住房，系原醇王府正院；现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故居，系原醇王府西花园，并列为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9年溥仪被特赦回到北京，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爱新觉罗家族在京成

员，包括载涛（溥任的叔父）、溥仪、溥任及其姐妹等共十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你登基当宣统皇帝的时候不满三岁，还不懂事，对国家的盛衰起不了作用，不能让你负责。但你确实是清朝的，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张勋复辟时，你刚读书，也可以不负责任。但是，后来的情况就不同了，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你已经二十多岁了，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你是要负责的。”接着总理又问溥仪，你现在身体还好，回京后想做什么事？溥仪说，我感谢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我想当个大夫，给人民看病，报答人民对我的宽恕。总理说：你会看病吗？溥仪答：我在抚顺服刑时，给病人量过血压，还看过点药书，懂点中药。总理说：你光有这样一点本事去治病是要治死人的，不能当大夫。这时，总理面向大家以商量的口气说：溥仪是否可以先到北京植物园参加些轻松的体力劳动，锻炼一下后，可到文史馆去工作，先写写自己的回忆录，把在抚顺时写的东西整理一下，你们兄弟也可以帮个忙，改一改嘛。大家对总理的意见非常赞成，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就是按照总理的嘱咐写成的。

溥杰于1960年12月被特赦回到北京后，她的日本妻子嵯峨浩表示要来北京定居，与溥杰团聚。对这件事，家族成员中有不同的意见。1961年2月12日，是旧历春节的前夕，周总理又邀请爱新觉罗家族到中南海西华厅作客，并共进晚餐。大家落座后，总理和邓大姐关切地问起每个人的生活情况，总理把话头转向金友之，问溥杰的住房找好了吗？金友之回答：“护国寺的那所房子是留给溥杰的，前一段租给地毯厂，现已腾出来了。”总理问：有多少间？答：21间。总理又转向溥仪和溥杰：“你们哥俩一起住可以吗？”溥杰表示赞成。随后，总理对大家说：“今天请大家来，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一事，溥杰出来了，是不是请他的妻子嵯峨浩回中国，让他们夫妻团聚。你们有什么想法？”溥仪当即表示：不同意嵯峨浩回来，说：“嵯峨浩是日本贵族，她与溥杰结合是日本军人搞的阴谋。现中日两国尚未建交，我对她不放心。”而金友之当时想到的是：总理为嵯峨浩来华定居，煞费苦心，认为大哥溥仪太不通情达理。金友之立即表示：总理关心二哥溥杰一家团聚，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我同意二嫂嵯峨浩回国定居。金友之的表态得到载涛和几个姐妹的同意，纷纷表示请嵯

峨浩回国，溥杰也露出了心中的喜悦。周总理见大多数人表示同意，很高兴地说：“我们的政府同意嵯峨浩的请求，可以批准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她回到中国也可以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起到桥梁的作用。”时间快到晚8点了，总理和邓大姐亲自招呼大家共进晚餐，吃的是饺子。总理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这个当总理的请你们吃除夕饭，能拿出来的不过就是这点东西。不过困难是暂时的，挺过这个时期，我们就会好过一些了。”

1961年6月初，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嵯峨浩带着次女婿生，在她母亲陪同下回到了中国。6月10日，总理特意又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了爱新觉罗家族成员，欢迎嵯峨浩来华定居与溥杰团聚，并批准其母亲在中国久住，次女来去都可以。接见后并与全家合影留念。

1947年，29岁的金友之在什刹海后海北河沿创办竞业小学，招收学生200多人。1949年他将家中房屋出售后，便将竞业小学迁至后海

家庙，继续办学；1956年因私立学校由国家接管，他将竞业小学全部校产捐献给国家，自己先后到北京市立西板桥和厂桥小学当教师，直到1988年退休。退休后，他担任了北京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西城区政协委员；还兼任北京市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港澳侨联委员会委员等职。

金老师虽出身皇族贵胄，生活却异常简朴。到现在仍住在东城区一个破旧的、年久失修的四合院内。室内连一个会客室都没有，接待客人就在他的卧室兼书房的陋室内，他对社会、对国家的公益事业却是慷慨解囊的。从1949年到1988年，他多次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恭王府管理处、承德避暑山庄和北京大学，以及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和部门捐献很多珍贵的文物、图书和字画。1950年他动员全家认购国家胜利折实公债八千份（每份合旧币二万元）。1990年2月他将“爱新觉罗书画展”义卖款150万日元，交由溥杰捐赠给“亚运会工

程。”1991年又将义卖的书画款一万元捐献给坛营满、蒙族小学，同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他非常着急，找出自己收藏的几幅书画义卖，得款5000元人民币，立即全部送到“减灾十年委员会”。1994年在日本名古屋义卖了与兄弟合作的一副书画，得款50万日元，全部捐献给了“希望工程”。1996年在韩国义卖书画得款两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密云古北口满、回族小学作为“希望工程基金”。

金友之老师，今年已是79岁的高龄老人。身体结实，精神矍铄。画山水画成了他一生的癖嗜。他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受到好评。

金友之有五个子女（三男二女），三个当教师，而且都是大、中学校的骨干教师；一个当职员，一个当工人，都能干守职。子女回到家里都坚持参加家务劳动，金友之本人外出开会、访友、购物等都骑自行车。金老师有儿孙13人，精神充实，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责任编辑 刘文）



溥任的一家。溥仪（后排正中戴眼镜者）、溥任（溥仪前面，穿长袍马褂者）、戴洋（后排右起第三人）

在巴黎和会上 据理抗争的顾维钧

● 劳允兴



顾维钧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列强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议决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山东的一切权利。消息传至北京，群情激愤，由此掀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近代历史也从此展开新篇章。在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力挫日本代表，与美、英、法三国首脑进行抗辩等种种往事，值得回顾。

1918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

席代表启程赴欧，行前命驻美公使顾维钧迅赴巴黎。同时电告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德兼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比公使汪荣宝等到和会帮助。

驻美公使顾维钧，原是留美学生，1912年在美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与外交学博士学位，返国后任外交部参事。政府拟派他为驻美公使，但恐美国以他年轻、资历浅，不予同意，于是先任他为驻墨西哥公使，并给他一个特殊使命，赴伦敦观察欧战。

1916年12月，他向美国总统呈递国书，任驻美公使。在美期间，他在使馆内汇集资料，研究列强各国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思考借可能参加的国际会议废止这些条约，并为此专设小组委员会写出研究报告。在欧战即将结束前，顾维钧领导的小组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一再提交北京政府请求考虑。北京政府外交部对顾的研究报告及建议极为嘉许，特准在外交部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顾维钧的报告。这样顾维钧在奉命赴巴黎之前，已经构想有关中国直接利害的问题，尤其对山东问题更有深入的认识。

大家知道德国自1898年强迫

清政府租占胶州湾，并让德国在山东有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特权。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914年，日本看准德国在欧洲作战，无力东顾，派出二万日军自龙口登陆横穿山东半岛以达胶州，突袭青岛德军。青岛德军投降，日本就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控制胶济线，掠夺矿源，非法设民政署，收取关税等。

接着日本于次年1月向我国提出二十一条，其中第一号第（一）：“中国政府，答应日后日本政府，与德国政府，协定关于德国在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之处分，概行承认。”这也就是说，强迫我国在将来和会中，“概行承认”接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日本。此后又得到美法的认可。1917年1月，英驻日大使正式照会日本谓英国保证“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之领土权利”。日本也与法国就山东问题，取得相同的保证。是年11月2日，日本又与美国在华盛顿签订《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地位”。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卖国头子段祺瑞向日本接连借款，购买军火弹药等项，到1918年

9月，已借得27,986万日元。这一年的9月2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还与日本签订济顺（济南至顺德）、高徐（高密至徐州）两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2000万日元。到这时日本经过缜密布置，满以为将来召开和会之际，完全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是毫无问题了。但是顾维钧对这些问题，早有深刻的思考和研究。

顾氏认为，1917年美国参战后，我国亦随即对德宣战，从外交方面，以国际法保障国家领土及民族独立主权方面，特别是美国总统提出组立国际联盟的原则，可以击败日本，使山东权益归还中国。同时他也观察到欧洲列强都卷入世界战争后，只有美国在东亚与日本抗衡，日本独霸中国，势必影响美国利益，应该充分使用分化和争取的外交谋略，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帮助。

顾维钧在美常与威尔逊总统亲信顾问霍斯洽商有关外交问题。而早在顾氏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时，就以校报主笔身分造访过威尔逊，曾作广泛畅谈，给威氏留下印象，并建立友谊关系。威氏那时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这次顾氏赴法，行前要求亲谒美国总统威尔逊，并请示政府缮就一备忘录，陈述对和会的希望，中国应受平等待遇，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应受签约国家的尊重，尤其是废止有关二十一条的中日条约问题。国务卿蓝辛接见顾氏表示美政府极同情中国政府在备忘录中所述立场。嗣后威尔逊接见顾维钧要求中国对其组立国际联盟问题在和会中予以支持。

顾维钧于1918年12月4日自美乘船十天后到达巴黎。

1月27日，中国代表得到消息，将被邀请参加和会“巨头会议”即十人会议报告中国的立场和意见。

当时十人会议已经听取了日本代表必欲排斥中国的报告。由于美

总统威尔逊与蓝辛坚持不同意排斥中国的意见，所以十人会议才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出席。

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来到十人会议的地点。会场约可容三十人，法国总理克雷门梭位居会议中心主席位置，他是十人最高会议和五人最高会议的主席，右边有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及美国总统、国务卿，还有意大利总理及外交部长。其次是日本外相内田及石井。中国代表坐在主席的左边。在主席的对面，坐着日本代表，其中有牧野和西园寺，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

主席先请日本代表说明日本对山东问题的立场。牧野发言，他要求尊重日本和中国已签订的条约，提出山东问题已在条约中明文解决，还说日本在战时曾协助作战等。牧野的发言很简单，也很肤浅，并不能说服与会者。和会原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邀请中国代表在极短时间内到场发言，使之措手不及，造成对日本完全有利的局面。但是顾维钧洞察内情，巧施应变能力，会前即与蓝辛谈话，说和会邀请急促到会，没有时间翻阅案卷，细心研究，请求有时间准备，以便将中国对山东问题的立场报告十人会议。蓝辛倾向同情中国，立即保证答应尽力协助，使中国代表宽限二十四小时后发言。蓝辛说服了克雷门梭。在牧野说完后，克氏问中国代表是否已准备答复，还是需要时间准备答词。此时王正廷站起来说，中国代表团顾维钧将代表中国发言答复，但需时间准备。至此，克氏宣告休会，决定明天开会，听取中国代表发言。

翌日，1月28日上午11点，十人会议继续开会，主题是山东问题。克雷门梭邀请中国代表发言。顾维钧经王正廷介绍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充满自信和勇气，沉着地说：“我很高兴以中国代表的资格将中国问题提出于和平会议。我感觉我的责任重大，作代表四亿人口的发

言人，即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发言人。”在郑重表示此次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会应给以充分的重视之后，接下去顾维钧以有理有据的事实，优美流畅的英语，侃侃而谈。他没有用演讲稿，胸有成竹，层次清晰，使听者完全听懂并留下深刻印象。要点是：

“有关中国领土的完整构成。山东省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基于和会接受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完全有权利要求归还这片领土。……如果和会采取不同见解，将这片中国领土转让给任何其他国家，这从中国代表团看来无异以错就错。

“胶州和济南铁路所在的山东省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孔孟的诞生地，是中国人的神圣地方。

“就经济而言，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分。……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首都的捷径。……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地段。

“……山东人民为夺回胶州的军事行动，曾遭受痛苦牺牲，并被征募人工和给养。……

“……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和世界均有疏职责，如果我们……出售同胞与生俱来的权利，从而种下将来冲突的根源。……中国代表团信任会议……必须尊重顾及中国基本重要权益，即政治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它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这篇符合国际法，符合力抗强权，伸张正义，充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强烈感情的讲演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同仁即拍手称贺。接着威尔逊总统、蓝辛、英国的路易乔治、巴富尔都走过来同顾维钧、王正廷握手道贺。威氏赞扬说这是阐明中国



1919年巴黎和会会场

立场的最好演讲。主席对面的人士也纷纷走来同中国代表握手。这种热烈的气氛和前一天会场对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淡反应，恰成鲜明对照。

克雷门梭问中国代表能否在二、三天内，将刚才所说的种种用书面方式送交和会。顾维钧答称：中国代表团很愿意接受主席的要求，愿将整个山东问题详细说明及将中日两国签订的有关条约俱陈和会，但须向政府请求供给材料，电讯往返需要时间。最后克氏决定宽限一周，将顾的演讲词及条约等一并送交和会。

中国代表团离开会场时，不少在场的人，尤其是英、美人士，都称赞中国代表的演讲给他们的良好印象。十人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但各代表团的情报人员、新闻媒体，仍是很快传播了有关中国代表发言的消息。当天多家晚报转载中国代表发言，词严义正，英语流利。顾维钧一鸣惊人。国内反映强烈，北京政府、各省政府，特别山东省政府、学生及各民间团体贺电雪片似的送达中国

代表团的巴黎驻地。

然而下一步工作的推进是十分艰巨的。顾维钧立即着手先行拟定一个有关中日协定的单子，北京的顾问评定这个单子不够完全，王正廷、施肇基和顾维钧皆一致主张，凡是有关中日问题协定，无论秘密与否，均应附录。但在此时才发现，陆总长一行带来的文件，没有这些协定。随行所带的装文件资料大木箱遗失不见了。此大木箱内有关于此次赴会所需的满洲、山东、蒙古与西藏的最机要的文件。大家分析判断认为，这个大木箱装的尽是与日本有关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文件，必定是途经日本及横渡太平洋时，被日本间谍侦知偷去了。驻巴黎中国总领事费尽力气询问轮船管理人员，都没有下落。只好电请北京政府速示中日两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及互换照会的原文，但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根本就不愿将中日秘密协定全盘托出，公开其卖国的秘密。中国代表团巴黎驻地始终没有收到有关中日问题协定的全部资料，铁路、参战、借款等重要各项文件，只好付之

阙如了。一周紧张忙碌的限期已到，一般性的书面声明及有关协定文件均准备妥当，经代表们同意后，除送达十人会议外，也送给主要代表团及各友国各一份。

书面资料送出后，代表团内如释重负，可以松一口气了，大家预期十人会议要费去数星期讨论才能有决定意见。一般的舆论空气均有利中国，各种友好的宴请活动中也向中国代表传递乐观消息。代表团内似是被盲目的即将胜利在握的情绪所笼罩。而日本却加紧外交活动，威胁北京政府表明立场。

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向北京政府就中国代表团顾维钧的发言等提出抗议，谓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事前未与日本代表协商，即单方面向各国记者宣布有关山东问题中日密约可随时发表，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亲日派分子曹汝霖向日本驻华公使解释说“最初陆征祥赴欧之际，政府训令在和会提出的方案，只有废除治外法权、义和团赔款问题、撤退中国领土内的外国

军队及关税自主四项。青岛及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问题,是顾、王的擅自专断”。另一亲日派份子陆宗輿也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向小幡解释说:“巴黎和会上陆征祥未能确守去法国前所决定的方针,对顾、王二人失去节度”;徐本人对此“影响和日本的睦邻关系,深表遗憾和忧虑”。

北京政府卖国分子对日本的态度,无疑是对巴黎中国代表团釜底抽薪,使代表团,特别是顾维钧等人陷于不受政府支持的孤立地位,自然给日本进行外交活动以把柄。而巴黎和会由于美国威尔逊总统组立国际联盟遇到困难,在和会的地位、威望受到打击;英法因各自政治、经济利益及领土要求,不支持美国的主张;意大利也因领土争执退出协作;日本为山东问题,外相内田强硬宣称得不到满足将不签署和约。

其实巴黎和会只不过是列强的分赃会议,美英法只是拿中国的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绝不愿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样只有牺牲中国,满足日本。

3月中旬,中国代表团将叙述中国愿望要求的七件备忘录送交和会。

4月以后至下旬,山东问题就急转直下了。4月22日,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威尔逊、路易乔治、克雷门梭三国首脑愿接见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陆征祥、顾维钧依约来到美总统官邸。会谈开始克雷门梭请威尔逊代表他们三位说话,威氏说:“和会面临很多问题,遭遇不少困难,其中,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最高会议拟具的解决方案,在目前情形下是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方案,即日本将接收胶州租借地,及中

德两国条约中规定的一切权利。日本会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将保留一切经济权利,包括胶州、济南铁路。”

此时,陆征祥要顾维钧发言。顾直率地说:“中国代表对最高会议深感失望,解决方案是不公平的,这不仅令全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在亚洲种下未来的祸根。这对中国固然不利,对世界亦无益。……中国所要求的并不是日本的转让,而是直接的交还。”美国总统听完顾维钧的发言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鉴于美国的处境,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再不能有更好的了。”

接下去英国首相问中国代表:中国究竟希望和日本按二十一条和1918年9月中日协定的换文解决办法,还是希望按以上提出的方案解决办法?顾将英首相的话翻译给陆征祥总长之后,怒形于色地请求让他多讲几分钟。顾说:“强迫我们作此选择是不公平的,中国不能接受两种中的任何一种。西方国家不支持中国的立场,西方国家要注意,日本的野心在亚洲,任其占领富有战略意义的中国沿海部分,必得寸进尺,施展它在东亚建立其帝国的雄图,将欧美势力排斥于西太平洋之外,到那时你们恐将后悔莫及。1917年的英日、法日条约就山东问题取得的保证,已经不能适用于现在的情况。和平应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最高会议拟具的解决方案是基于1915年二十一条有关山东的条文和1918年9月的换文。而这是日本用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接受的,中日的换文只是该条约的后果。国际法公认的原则是在和平时期以战争威胁与强硬手段签订的条约是没有效力的”。

最后,顾要求一份书面的方案和十人会议讨论此方案的记录。至

此会议即告结束。

5月1日,英国外相巴尔福,将巴黎和会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议决之山东问题方案,正式通知中国代表的消息传来北京,群情激昂。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十三所学校学生三千人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旋即学生罢课,吁请全国各界联合一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接着全国各地学生及工商界罢学、罢工、罢市响应。在巴黎留法中国学生示威,学生会和侨团同胞数百人包围中国代表驻地,反对中国签约,要求中国代表团确切保证。

从6月24日起,北京外交部的电报雪片似飞来,也说国内人心激愤,反对签约,令陆氏相机应付。陆征祥住进圣克罗医院已多天了,中国代表团人员并没有全体参加最后决策的讨论,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三人立场最明确,就是拒签和约,最后还要竭力争取获得保留。大家知道,拒绝签约,弃绝世界和平会议,自陷孤立,是一种严重的行动。但是顾维钧也深信,中国对山东条款提出保留,完全失败后拒签和约,必能得到国内与全世界舆论的同情。他向陆征祥建议在闭会前设法发表一个宣言,陆照例认可同意。当顾维钧于6月28日早晨,向和会秘书长杜突斯特提出这一意见时,被他一口拒绝了。

顾维钧不仅彻底失望,且极感愤怒。一切折衷的办法都不能实现,最后只有断然拒绝参加和会的闭幕式,不签订和约了。

6月28日,巴黎和会闭幕会上,中国两位代表的席位空缺无人,但却让全世界看到伟大中国自强平等立于世界的决心和意愿。

(责任编辑 一 尘)

海伦·斯诺的中国情结

● 武际良

1997年9月21日是海伦·斯诺女士寿辰，又是她访问延安60周年。新年伊始，笔者正伏案撰写一篇向她祝贺的文字，突然，大洋彼岸传来噩耗，海伦女士于1997年1月11日下午4时溘然逝世。中国人民从此失去了这位一生为中美人民的友谊而奋斗的伟大朋友，令人万分悲痛。

历史的机缘，使海伦一踏上神州就同斯诺一见如故。她俩很快就结为伉俪。

30年代，海伦和斯诺是在远东最活跃的两两位西方记者。1932年，他们一起采访报道了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进攻的“一·二八”抗战，第一次目睹了中国人民不可侮。1935年，在北平，他们采访报道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海伦写出《1935—1936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长篇新闻。她满怀激情地写下歌颂“一二·九”运动的长诗《青春和那古老的中国》，赞美中国青年的爱国精神，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上，使世人听到中国青年的抗日救国呼声。

现场采访中，海伦每当看到国民党军警殴打、逮捕游行的爱国学生，她勇敢地跑到跟前拍照，迫使军警不敢恣意妄为。当看到军警把爱国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海伦怒不可遏，当场斥责警察说：“为什么这么残忍，你们是法西斯！”她还同斯诺到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学生，送上鲜花表示敬意。看到伤势严重的学生，她痛心地说：“中国人对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狠？！”

1936年春，北平国民党当局疯狂逮捕爱国学生。海伦和斯诺把“一二·九”运动骨干、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瑾掩护在自己家中十多天，后来又用小汽车亲自送陆瑾到前门站上火车，转移到上海去。

1972年，海伦重访中国会见“一二·九”的老朋友时，她表示希望今天的中国青年应该把“一二·九”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她还写信说：“我深深地热爱所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人”，“你们要高举火炬，到老

不变！”

海伦积极参与斯诺于1936年出版的《活的中国》英文本的编译工作。此书选入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老舍、巴金、张天翼、萧军、沙汀、杨刚、肖乾等左翼作家的作品，把中国的新文学介绍到西方。这本书，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社会起了重要作用。宋庆龄曾评价说，此书“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使长期以来被人冷漠地称为‘神秘不可测’的中国人民能为外界所了解”。

1936年秋，海伦去西安，试图进入陕北苏区与正在那里的斯诺一起采访，未能成功。在西安，她采访了东北军张学良将军，了解到他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意向。她写出《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谈话纪要，发表在伦敦《每日先驱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上，最早向国内外公众透露出要求国共团结抗日的呼声。

斯诺访问苏区成功归来，海伦夜以继日地帮助他整理资料，打印稿件，并对斯诺撰写《西行漫记》一书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

1937年4月下旬，海伦再次勇敢地奔赴陕北苏区。在西安，她受到“西安事变”后猖狂的国民党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一个漆黑的夜晚，海伦乔装打扮，把随身行李都扔在招待所，只把照相机、钢笔、记事本和斯诺交给她带给毛泽东的一大包珍贵的红军照片藏在大衣里面，爬出窗户，闯过国民党警察把守的大门，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应下逃出西安，先到云阳会见了彭德怀，然后转赴延安。

海伦到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到她下榻处看望，她从记事本里取出夹着的一张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递给毛泽东，并风趣的说：“这是我来见您的介绍信。”

毛泽东接过照片，眯起眼睛仔细端详，海伦又说：

“它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国民党,轰动了全世界!”

海伦在延安正值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召开,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各路红军将领云集宝塔山下,使她得以采访了1936年斯诺在保安未能见到的徐向前、罗炳辉、萧克、王震等数十人。后来,海伦说:“我的采访很成功,主要是由于朱德的帮助。他把那些红军将领一个一个地带到我的住处。他们都很年轻,同我这个年轻的美国女人谈话还有些害羞呢!”海伦还采访了蔡畅、贺子珍、康克清、刘群仙、陈慧清、丁玲等女革命家。她说:“在我和这些历史的人物晤谈4个月后,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品质,无论集体及个人均获得许多明确的、无限量的印象。”

海伦曾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赶赴云阳镇,去会见刘伯承、任弼时、邓小平。当她到达时,他们已率部队前往华北敌后前线,本打算追踪采访,此时局势紧张,斯诺来电报要她速返北平,而无缘相见。直到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海伦赶到华盛顿会见邓小平,把保存了40多年的介绍信交给他,被世人传为佳话。

海伦访问延安后,以报告文学形式写成《续西行漫记》,还根据她采访党和红军领导人写成的《红尘》(即《革命人物传》),使国内外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真实情况,吸引许多中国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影响许多国际进步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海伦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新西兰进步人士路易·艾黎等一些中外人士,发起开展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帮助在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内地建立某种工业,以发展经济力量,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得到宋庆龄的热烈赞同和支持。他们多方奔走,几经周折,国民党才表示同意支持“工合”计划,但筹办资金却迟迟不到位。为筹措经费,海伦和斯诺把他们自己的绝大部分积蓄捐献出来。他们在武汉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写信给在延安的毛泽东,立即得到响应和大力支持。

为使人们了解“工合”运动为在中国内地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支持长期抗战,并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必需品的宗旨,宣传“工合”的作用和意义,1938年5月,海伦写了一本《中国工业合作社》宣传手册。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请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理事长,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海伦担任了副理事长。接着,在香港又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海伦和斯诺都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他们受宋庆龄委托赴马尼拉筹组了菲律宾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该组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获得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的捐款达百万美元。这些捐款通过香港“工合”国际委员



海伦 1931 年在上海

会支援了陕北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地区的“工合”运动。

中国“工合”组织,到1942年上半年,已建立3000多个,拥有社员三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

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由于海伦同情中国革命,主张同新中国友好,而遭政治迫害达20年之久。她找不到工作,不能出国旅行,她的关于中国的书不能出版,文章无处发表。

从1949起,海伦同斯诺离婚后,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斯诺留给她的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小镇上的小农舍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她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作,先后写了40多部书,其中有12本是关于中国的书稿。

1971年,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消息传来,海伦无限欣喜。当新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她的老朋友黄华到纽约赴任时,海伦亲自去欢迎他。海伦还写了一篇祝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文章,在黄华到达美国那天,《纽约时报》发表了出来。

海伦女士这时已经65岁了。她迫不及待地要访问几十年梦魂萦系的新中国。但她生活贫困,经济拮据。为筹措去中国的旅费,她卖掉了一部分老式家具和当年从中国、日本、东南亚购置的几乎所有物件。在请黄华帮助她办理去中国的手续时,黄华提出愿意为她提供整个旅行的费用,但她坚持由自己出钱,谢绝了老朋友的盛情。



1937年海伦在陕北和红军战士在一起

1972年11月下旬,海伦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踏上了已解放二十多年的神州大地。在北京,朱德、邓颖超、康克清会见并宴请了她。周恩来总理国务繁忙,委托邓颖超接待海伦。

海伦去湖南访问,到长沙后,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派专门信使送给她的信。毛泽东在1973年1月3日的信中写道:“你的信和你写的《续西行漫记》一书都已收到。信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读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你将受到欢迎。”周恩来于1月7日的信中对她说:“在你这次访问期间,我没能会见你。你离开后,邓颖超同志向我谈起你时,我对此感到抱歉。我希望你下次来时仍能见我。”

在湖南,海伦追寻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事迹。海伦这次访问历时3个月,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拍摄了上千张照片。她写出了《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两本书。她以自己在旧中国近10年的经验和所积累的对中国的丰富知识,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新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对于新中国,海伦在《毛泽东的故乡》一书前言中

说:“我曾经多么希望美国的总统们及其他人,都能够谈一读《毛泽东的故乡》和《重返中国》这两本书,了解一下中国作为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国家,在其蓬勃发展阶段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成就。”

199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把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海伦。她在写给中国友人的信中充满诗意地写道:“我们可以寻找星球的结合点,也许是织女手中的丝线,跨越太平洋和天空,将东西方连接起来。”她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架设中美人民理解和友谊的桥梁而继续努力。

同年11月,中华文学基金会领导人张锲、金坚范同志赴美向海伦颁奖时,她拿出英文《中国日报》上刊登的一篇介绍她的文章,指着文章的标题《毕生热爱中国》,她说,“这不是一个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的结果。”

如今,海伦·斯诺女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她为中美人民的理解和友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永存的!安息吧!海伦。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陈依范一生在宣传中国

● 张彦



陈依范，又名 JACK CHEN，1908 年，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特里尼达的西班牙港市。父亲陈友仁（EUGENE CHEN）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的母亲阿加莎，是个黑白混血儿。因此，在外表上，陈依范完全是个外国人，他的母语是英文，而且从来就没有把中国话学好过。

他曾经是英国籍，后来又加入过美国籍。但是，他有一颗中国心。

早在 20 年代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为英文版的《人民论坛报》工作时，就经常以漫画尖锐地揭露背叛孙中山政策的政客与军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组织过世界范围的绘画展览，在中国、欧洲和美国展出中国画家们（包括他自己）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的作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于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敬佩和同情，他和许多著名的欧美画家一起捐献自己的作品，以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支援抗战。

二次大战时期，陈依范作为英国《亚洲杂志》和《雷诺新闻》的记者，曾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朱德这样一些人物，并作了不少画。他要求留下来参加抗战。毛泽东告诉他：你这样的人，回到西方去宣传中国的抗战，贡献会更大。果然，回去以后，他通过发行量达百万份的报纸杂志，以文章、绘画和漫画形式，向全世界全面而生动地介绍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

新中国诞生以后，陈依范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从此与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创建了《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等外文刊物，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本应享受外国专家的一切优厚待遇。但是，他一回来就主动将自己长期使用的英国护照上交周恩来总理，决心要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考虑到建国伊始的财政困难，他拒绝接受优厚待遇，坚决要和大家同甘共苦，一样住普通宿舍，乘公共汽车上班。他唯一要求的“特殊待遇”，是每周能有一天让他从事绘画创作。

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陈依范这样的特殊人物也未能幸免。开他的批判会时，还得请翻译帮忙。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他却从不低头，直到 1971 年，由于周总理的干预，他一家人才算从下放劳动的农村回到北京。这时，业已 63 岁的陈依范，应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大学的邀请，决定出国讲学。临行前冠华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深切关怀：“陈依范一生为中国人民的事业服务，不图名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任何时候想回来，我们都欢迎。”

那时，正值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夕。陈依范一到北美，到处请他演讲介绍中国情况。一些知名人士、国会议员、大企业家，纷纷找上门来与他讨论中国问题。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次访华之前，也特意派他的工作班子与陈依范接触，就某些关键事

务向他咨询。因此，也招来了美国 and 台湾的右翼势力对他的种种攻击，诬陷他是“毛泽东派来的间谍”。有的甚至造谣说：“陈依范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的冒名顶替”。对于这些攻击诬陷，陈依范曾以漫画家特有的幽默，大笔一挥，批注：“果真如此，那我现在的工资就太低了！”

侨居美国的陈依范，陆续出版了一本又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籍：《上乐村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内情》、《新疆的故事》，以及《新土地》的增订版，他组织过有关中国现代木刻、绘画、戏剧的展览会，并经常通过电视广播饶有风趣地介绍中国的发展与变化。晚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于对美国华人历史文化的研究。1980 年，他主持举办的、迄今关于美国华人历史发展最全面最完整的展览《美国华人——1785—1980》在旧金山开幕，并且连续在七大城市展出。紧接着，他的多年研究成果、一本历史巨著《美国华人》终于问世，出版后引起轰动。80 高龄以后，他又转向研究在美国的中国戏剧，并亲自主持“梨园在西方：美国华人戏剧表演中心”，致力于复兴传统戏剧并发展美国华人表演艺术，直到 1995 年 4 月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郑和十九世孙说郑和

● 吴跃农

郑和十九世孙郑勉之，解放初毕业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长期在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后任秘书长，现退休在家，他著有有关伊斯兰教文化论述多部。笔者最近访问郑勉之，寻绎到鲜人知的历史踪迹——郑和祖先的血脉谱系。

郑和是回族人，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史载，郑和的鼻祖就是伊斯兰先知创世人穆罕默德，也就是说，郑和是圣裔。郑和在中国的第一代祖先名叫所非尔，是穆罕默德五百年后的第二十六世孙，他是在宋神宗熙宁三年来我国的。当时，所非尔是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名城布哈拉的国王（今独联体境内），由于受邻国的侵扰，他率亲属、部下五千余人逃亡来到宋都汴京，受到宋神宗的优厚礼遇，被封为朝奉王。后来，辽、夏兵乱，他率部参加了宋王朝一系列的平乱战事，战功卓著，深得宋神宗的赏识。以后，尽管他自己国内侵扰平息了，他的大臣来迎他回国，但宋神宗坚留他“驻京保国”，由此，他开始在中国世代定居生息，是谓圣裔东传。

到了元朝，所非尔在中国生息沿续，出了一个元朝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赡思丁是穆罕默德的第三十一世孙，郑和的六世祖。“赛典赤”在阿拉伯语中，是贵族圣裔的意思。是时，元太祖忽必烈西征，赛典赤·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鹤迎降”，忽必

烈对这位圣裔的归附甚为欣悦，先后委任他任中央和地方十八个显要官职，他的第一个官职就是“咸阳总管”，所以，他死后被迫赠为“咸阳王”，他的后代也就被称为“咸阳世家”。

赛典赤·赡思丁生命的最后六年是在云南度过的，他的后代也就留在了云南。云南中书行省平章政事，是他第十八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在任虽短，政绩却斐然：他在昆明修建了第一座孔庙，并从四川、陕西等地聘来儒学教授，使蛮荒之民风渐开。当时，滇池洪水经常泛滥，百姓甚苦，他领导全省人民增凿宣泄口，建造分洪的松华坝水闸，又在下流开出6条人工河，设闸分水，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水利系统。这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云南是个多民族地区，一些土司叛服无常，中央政令的贯彻受到阻挠，特别是红河地带的一个大土司自恃兵强，公然武装叛乱。赛典赤亲率大军逼其寨城，围而不去，终于以诚挚的团结愿望促其醒悟。赛典赤赢得了人心，一年内就有“八十余州，籍四十万户”前来归顺。云南出现了在统一政令下的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团结局面。作为穆斯林，他在云南兴建过12座清真寺，至今昆明尚存南城寺和永宁寺。

回族人在与汉族的共同生活过程中，和睦相处，共创文明，他们也

接受了汉文化，开始取与汉族相似的姓名。“穆罕默德”在过去常被音译为“马哈麻”，因此，回族人表示对先知祖先的尊敬，基本上是以“马、哈、麻”三个字为姓，尤以“马”为最，形成了十个回族人中有九个姓“马”的特色，当然，也有取其它祖辈名字的音译汉字为姓的，如“刺速拉丁”之“速”、“丁”等等，也有随平常的汉族姓的。到郑和的祖父和父亲辈上，都不再用阿拉伯的姓名了，都姓了“马”，郑和其实叫马和，按照伊斯兰教的文化习俗，凡是去圣地麦加朝觐过的人，就不再称名，而是尊称为“哈只”，意为“巡礼人”。郑和的祖父、父亲都登山涉水去麦加朝觐过，所以，他俩都叫“马哈只”。郑和的父亲生有二子，郑和排行第二，郑和有一兄叫马文铭。

郑和由原来的马和改姓为郑和，是有一段故事的。郑和的童年，正是明灭元新旧交替的战火动乱时期，这也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明军在灭元的战争中，经常虏掠儿童阉割为内监，郑和正是这许多儿童中的一个。12岁时，郑和被朱元璋分发给他的第四个儿子、当时的燕王，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为内监。眉目清秀、聪明伶俐的郑和，深得朱棣的喜欢，尤其是郑和的好学不倦。郑和经常在侍候燕王及王妃之后，青灯黄卷伴深夜，广读兵书文史，特别是两域航海史记，使他心情激荡，如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汪大渊的

说君师合一

● 靳树鹏

1966年春，86岁高龄的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跋中写过君师合一事。毛泽东在致章先生信中谈到《柳文指要》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毛泽东措辞婉转，认为《柳文指要》不必改动就可以出版，章先生心暖之。几年后康生又专断地提出，须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后才能出版。得知康生的意见后章先生动了气，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的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可见章先生内心深处对“君师合一，出言为经”的立言无所谓褒贬，也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指出了这种现实。

君师合一的含意同儒家传统的圣王合一、政教合一是一致的。师至极就是圣，故有“至圣

先师孔子”之说。王者君临天下，更是谁都明白的。人们祭祀祖宗，在香烛供果的后面就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可知君和师早已上了千家万户的祖宗牌。

师与圣，是学问、理想和道德的化身，是精神领袖；君与王，则是现实政治的最高统治者。这二者能够合一吗？这二者合一究竟是幸事还是不幸？

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又是道德最完美、学识最渊博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成为君王，当然是苍生之幸，万民之福。但是，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要有理想的旗帜却不仅仅凭借这面旗帜，要有道德的成分又常常不讲道德。在政治角逐或政治统治中当然需要学识和智慧，但学识和智慧并不起绝对作用。

早就有人说过，“左传乃相斫书耳”。人类历史上不相斫的时候并不多，很难想象一个心慈

《岛夷志略》。郑和学而不厌，锲石成金，在宫内被誉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

朱元璋去世后，因皇太子已死，皇位传给了皇长太孙，即建文帝。朱棣等皇子那能心平气服，俯首称臣？于是，展开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豆箕相煎的皇位争夺战，历时三年，史称“靖难之役”，郑和因其足智多谋，使朱棣节节胜利，最后，由北而南，朱棣攻陷了京城南京，登上皇位，称号明成祖永乐皇帝。

朱棣即位第二年，封郑和为“内

宫监太监”，此位为内宫太监首领，主持宫室陵寝的建造以及宫廷用品的铸造和购买，并赐姓“郑”，原来的马和就成了郑和。马和改郑和，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按照当时朝廷忌讳，马不能登殿；二是朱棣当初在北京郊区郑村坝一役，对翦灭诸雄取得最后胜利至关重要，皇上以“郑”姓为纪念。

朱棣在赐郑和姓的第二年，就委任郑和为下西洋“正使”。由此郑和开始了他气势恢宏的航海生涯。

郑和在南京的后裔的家谱，一

直修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郑和后裔世代相袭着“会茶修谱”的习俗，每年正月里，家族聚拢会茶一次，各门将上年出生的婴儿名字、辈份报出，一一记录在册。

郑勉之祖是清贫的阿匄，他的父亲幼年曾随族中长辈参加过“会茶修谱”。

郑和的墓在南京牛首山，坐东朝西。1985年，南京人民政府出资重修过。每年的开斋节，郑勉之先生和许多回族朋友都要去祭扫。

（责任编辑 刘 文）

手软的人，一个满怀菩萨心肠的人，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成为君王。重力轻义几乎是政治斗争中的规律。韩非坦然承认“明君务力”，“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15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嘉维里写过一本《帝王术》，据说是400年来形成欧洲人思想的六部大著之一。喜欢的人说，这是“人类智慧在政治思想方面最精深的表现”。有人则说这是大盗的手册。罗素评论说：“他的政治哲学是科学的与得自经验的，以他本人的事业经验为基础。它所关心的是要规划出一些达到目标的手段，却不问这些目标之为善为恶……”这本《帝王术》，在我国至少有三种译本出版，书名均译为《君主论》或《君王论》。马嘉维里在书中写道：“一切武装了的先知都能够成功，而非武装的先知们则归于失败。”“因此，君王不应该有其他思想或其他目的，他只应该为战争艺术及其军队的组织与纪律操心，他也不应该拿别的事情来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因为战争艺术乃是他这个君临天下者所应学会的唯一艺术。”他还写道：“与人争雄，世间有两种方法：一种用法律，另一种凭暴力；第一种是人的方法，第二种是兽的方法；不过第一种方法时常觉得不足的，必须借助于第二种。”“既然君王不得不懂得如何行若野兽，那他就得效法狐狸与狮子。”可见“某些事看来是道德的，但其结果却致国君于败亡，另外一些事，看来是罪恶的，其结果却使他获得了较大的安全与幸福。”他认为“受人轻视，乃是为君王者所最不应蒙受的诸般耻辱之一”。韩非地下有知应该庆幸，他死后1600多年，在异国他乡竟有这样一个杰出的知音，把他的道理阐述得更为精辟透彻。

宋大儒朱熹就明确指出，圣王合一的理想只存在于三代之治。朱老夫子把圣王合一理想的实现推论在古老的夏、商、周是很聪明的，反驳者也找不出太多的证据来。他认为三代以后直至宋，没有出现圣王合一的局面，那么宋以后呢？大概也没有出现过。有人说，孔孟为圣不为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王不为圣，就有些道理了。君也好，王也好，任何最高政治统治者，

都离不开铁与血，而至圣先师一类人物，大都是不忍动刀兵、不忍见流血的。可见在历史发展中，君与师、圣与王是很难合一的。

所谓君师合一、圣王合一、政教合一，大体上都是君硬充师，王硬充圣，教服务于政，都是对师与圣的亵渎。称师与称圣不过是对君王的吹捧和包装，使其权力神圣化，道德化，岂有他哉。

中国儒家君师合一、圣王合一的理想大体上是个乌托邦。《淮南子·主术训》中的“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主张以法禁君。宋儒提倡“道统”，梦寐以求的是以“大儒”来“正君心”。以法禁君也好，以“大儒”来正君心也好，在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中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中国几千年来偏执于意识形态与最高统治权力合一，鲜有非君之论，总是把精神领袖的桂冠戴在君王头上，君王就可以“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管理和控制任何人的任何行动和思想，其结果是民族和国家伤痕累累。

如果我们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有道明君（毛泽东青年时的读书笔记写有“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大概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乾嘉盛世。其实被史书所美化的这些盛世，只是政治上的暂时稳定和经济上的暂时繁荣，专制政体则是一以贯之，成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健康发展的桎梏。浩繁的中国历史，关于政治体制的研究却毫无建树，而西方倒是取得了长足发展。把民主和监督机制引入政体，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监督制约最高统治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最高统治者，绝对不应该把最高统治权神圣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系于一人之身，是最要不得的，这个人纵是天之骄子也不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法治不要人治。纵看历史，横看全球，大大小小的君王数不胜数，可曾有过一个圣人？至多有几位被人们尊为英明罢了。思想之树常青，才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国际歌》唱得对：“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责任编辑 仲 文）

97 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在随州举行

97 炎帝神农生辰庆典

由湖北省政府主办，随州市政府承办的'97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于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相传炎帝神农生辰）在随州隆重举行。

今年的神农节是湖北省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配合'97中国旅游年活动而举办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以及来自美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和北京、天津、安徽、江西、广西、湖南等十多个代表团，参加了炎帝神农生辰庆典活动，并向始祖敬献了花篮。

在庆典仪式上，随州市市长蒋昌忠恭读了颂文。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庄炎林，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石川，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峻峰、省旅游局局长游先胜、随州市委书记李文烈为炎帝神农大宗祠设计图揭幕。

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大强、省长助理江泓、省人大副秘书长周治陶出席了神农节开幕式。

（樊友刚 供稿）

题图：炎帝神农生辰庆典在神农故里随州历山镇举行

1. 右起：庄炎林、李文烈、江泓、王峻峰
2. 左起：李大强、周治陶、石川、蒋昌忠、鲁諝
3. 群众队伍抬着炎帝神农画像进入会场

炎黄春秋



1964年，罗瑞卿（左）在训练场金北与李向陽交谈



吴文藻、冰心夫妇1984年在北京合影

罗瑞卿与大比武

李立三、陈毅40年的围棋情

贺龙警卫连长回忆

南昌起义受挫经过

冰心的丈夫 社会学家吴文藻

郑和19世孙说郑和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订阅价：4.00元 零售价：5.00元